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玫瑛 先生



睡美人覺醒：
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研究生：董健玲 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董健玲 君

所提之論文 睡美人覺醒-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賴作亭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郭洞芸

吳以英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9年5月20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 系(所)

組 98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睡美人覺醒：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吳文瑛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董健玲 (親筆正楷)

學號：1596016 (務必填寫)

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5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8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睡美人覺醒：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指導教授： 吳玫瑛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董健玲

簽名：董健玲 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08 日

謝誌

難以置信，終於將論文完成了！曾經以為論文不可能寫完；曾經以為將寫出所上有史以來最薄的一本論文，但在眾多鼓勵與加油聲中，搖搖擺擺也走到終點。

回想起這三年來的點點滴滴，心中滿溢幸福之感。感謝兒文所的張老師、楊老師、杜老師、阿寶老師，引領大家深入兒文的殿堂領會它的奧妙與樂趣。謝謝郭老師對我們源源不絕的關懷，打造 96 暑班充滿歡笑與熱情的記憶。謝謝游老師在動畫課精彩的示範，啟發我的靈感，找到那根串起一顆顆珍珠的主軸線，使論文更聚焦完整。謝謝維菁老師溫柔提醒加強理論間的連結，讓論文結構更加平衡。最感謝吳老師的鼓勵與肯定，讓卡在論文石縫而焦慮、憂鬱的我，終有勇氣多一點堅持，突破自我的限制走過生命的幽谷。

謝謝最可愛的 96 暑班同學們，讓我見識生命的各種可能性；謝謝吳家班姊妹情深，在每一個寫論文的日期溫馨同行。謝謝清泉、淑琴的協助，提供豐富的參考書籍。謝謝親愛的美竹，在論文的莫拉克颱風狂掃內心的那一段日子，丟下自己的論文陪著我上山下海，藉台東的自然美景，療癒不安的靈魂。

感謝慈愛的婆婆做為我最堅強的後盾，給予空間與時間的無限自由，支持我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調完成夢想。感謝摯愛的外子乃銘，在我求學期間除了一手包辦所有的家務，看顧兩個寶貝女兒，更以無比的耐心接納我焦躁的情緒。沒有他，這篇論文不可能完成。

讀過兒文所之後，獲得最美的發現：原來我是最幸福的女人。感謝所有關心過我的每一個人。

健玲敬誌於九十九六月

睡美人覺醒：析論《變身》中的女性主體

作者：董健玲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援引傅柯的權力、論述及艾瑞葛來的女性主體與母女關係等理論，探討瑪格麗特·梅罕小說《變身》中女性主體的消失與重構。傅科認為主體是論述的產物，形塑個體對身體、心理及經驗的解讀，但仍是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論述提供某種主體性形式的同時，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提供論述中受制的主體抵抗的機會。艾瑞葛來指出父權文化以母性功能定義女人，卻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性，使女人僅能做為支撐陽剛主體的沈默物質基礎，因此女性應重新探索母女關係與建立女性系譜，使女性認同有所依歸。

研究發現女性內化主流父權論述，在父權文化的規訓及凝視下逐漸被物化與客體化，成為以男性凝視目光審度自己的囚犯，不但與自身身體、情感疏離，母職的再生產及母性的迷思更導致母女關係的破裂，使女人世代皆受母職的束縛，削減母親做為女人的行動力，也截斷女兒成為女性的潛能，自我空間為家庭所挪用，不斷陷進父權體制下再生產工具的循環。女性主體在陽具中心主義話語的建構下，喪失對生命的自主權。

女性主體的重構源自女性系譜的傳承與倒置性話語的啟發，重新肯定女人為社會與欲望主體，具有無限潛能。在回溯童年的時光之旅後，女性意識幡然覺醒，領悟過往為父權論述箝制，形塑自我犧牲、奉獻的女性／母性主體性，進而修復母女關係，更藉由認同女性護育的力量，協助男性接納對自身陰陽並存的特質，也開拓自身寬廣多元的主體認同。

關鍵詞：主體、凝視、論述、母職

**The enlightenment of *Sleeping Beauty*—An analysis of
feminine subject in *The Changeover: A Supernatural
Romance***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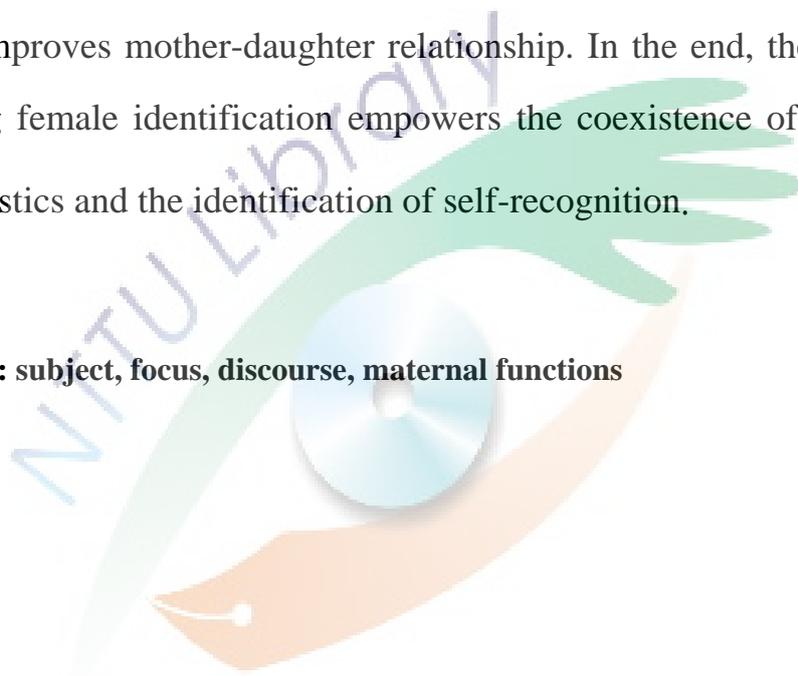
Tracing the theories of power and discourse discussed in Michel Foucault as well as feminine role an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portrayed in Luce Irigara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disappear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ne subject in Margaret Mahy's *The Changeover: A Supernatural Romance*. Michel Foucault suggested subject is produced in discourse. While enouncing body, psychological situations and experiences, a subject does feel and think. Discourses formalize subjects and are themselves the bearers of various subject-positions. Luce Irigaray shows how patriarchal culture defines women with maternal functions, and yet oppresses feminine identiti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making women the support of masculine subjects. Women, therefore, should propel them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by re-discovering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ing feminine genealogy for self-identification.

Researches show women are objectified and subjectivised by rules in patriarchal culture, which in turns focus themselves as self-prisoners from masculine perspective. The dissociation of their bodies and emotions recurs mothering and maternal functions, as well as furthers the destructions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which reduces feminine activities of mothers and represses feminine potentials of daughter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e discourses, feminine subjects lose the self-control of their lif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ne subjects comes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feminine genealog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positioned discourses. Women are therefore propelled to re-recognize themselves as subjects of the society with unlimited desires. Tracing back to childhood attempts to wake woman's consciousness, unveils the dominance of patriarchy, shapes the self-sacrifice and devotion of feminine or maternal subjects, as well as improve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end, the power of protecting female identification empowers the coexistence of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lf-recognition.

Key words: subject, focus, discourse, maternal functions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女性的枷鎖.....	1
第二節 反抗的力量.....	6
第三節 故事與魔法師.....	9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語言與主體（性）.....	11
第二節 話語與權力.....	15
第三節 規訓與身體.....	20
第四節 女性主體與認同.....	23
第五節 重建女性系譜.....	29
第參章 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主體	
第一節 消失的女性容顏.....	39
第二節 女體的困境.....	46
第三節 母職的枷鎖.....	55
第肆章 女性主體的重建	
第一節 她們的故事.....	67
第二節 女性意識的覺醒.....	78
第三節 變身與對抗.....	87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女性的客體化.....	97
第二節 回歸女性自我.....	102
第三節 女性多元新主體.....	106
註解.....	110
參考書目.....	112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女性的枷鎖

2008年8月7日聯合報有一則「遴選校長，歧視女性，教部敗訴」的新聞吸引研究者的目光：住在台北的前台灣科技大學副校長陳金蓮女士，九十五年參加宜蘭大學校長遴選時，遴選委員輪番問她：「妳到宜蘭，家庭怎麼辦？」中山大學校長張宗仁則問：「女性的募款能力是不是比較差？」評選結束後，教育部圈派江彰吉出任宜蘭大學校長。陳金蓮認為遴選過程充滿性別歧視，控告教育部與張宗仁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她勝訴。判決指出，依教育部規定，募款能力並非必要考量項目；但張宗仁卻將「募款能力」與「性別」連結，且只對陳金蓮提問，未對另兩名男候選人問相同問題，顯然有差別待遇。法官特別舉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為證，證明女性也有很好的募款能力；而張宗仁、教育部必須連帶賠償陳金蓮精神及名譽損失兩百萬元，登報道歉一天，並且在教育部官方網頁刊登公告、道歉函一個月。

看完新聞，研究者不禁懷疑台灣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停留在那個階段？在這些學術態度嚴謹的男性知識份子心中，是否認為現代女性應該且必須是犧牲奉獻的「家中天使」？從男性遴選委員僅對陳金蓮提出家庭與募款問題，或許正暴露二十一世紀台灣男性潛藏而穩固的父權意識：女人不該離開家庭，因為女人的天職是無私無我的推動搖籃、整個家庭，沒有她，家事誰來做？兒女誰來照顧？女人除了養兒育女的能力受到肯定與讚揚，在公領域的表現與能力必不如男人。換言之，女人最被讚揚及許可的角色是母親，然而社會「對母職的褒揚，卻抹去了女性的身分與屬性的特殊性，將女性等同於母親，意味著女性只能以其生殖能力而存在，生育與養育就是女性一生的目標。除了母親以外，女性做一個女人的權利被剝奪了」(林松燕 30)。「他」們對女性職責的看法，與十九世紀的羅斯金(John

Ruskin) 在〈女王的花園〉(“Of Queen’s Gardens”) 中發表的「男人的『職責』(即特權)是『公共性質的』(戰爭、金錢、政治、學問),而女人的『職責』(指責任)是『私人性質的』(如家庭責任)」(轉引自米利特 152) 的古老話語並無分別,顯示父權社會思想仍根深蒂固,即使女性主義者努力奮戰超過了一百年,在此觀念上並未看見令人振奮的進步,說明女性地位的改變多麼是緩慢而不易。

再從大眾傳媒觀察,也發現今日女性難以跳脫刻板印象,形象常被嚴重扭曲、物化,影響所及,使大大小小的閱聽人心中,對女性存有不實幻想。簡瑛瑛以美國華德·狄斯奈(Walt Disney)企業發行的動畫如《白雪公主》(*Snow White*)、《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為例,指出片中的女主角總遭刻畫成被動、昏睡、等待救援與為愛犧牲的純情女性形象,迭遭女性主義者批判抗議(120)。而一九九五年發行的《風中奇緣》(*Pocahontas*) 卡通動畫,雖開始標榜原住民「女英雄」及所謂大自然「母性」文化(108),表面上似乎形塑一個正面、真實的女性形象;但實際上:

狄斯奈的波卡形象是從西方商業企業界的角度著眼,強調印地安公主的賣點,為的是迎合白人、中產階級、青少年及成人觀眾,因而大加炒作過去白人所創造出來的傳說、形象,並加以浪漫化、性感化以減輕白人觀眾的罪惡感以及心理負擔。(111)

在此片中,原住民女性的觀點被消音與漠視,依舊呈現男性希望看見的女性形象。文化工業挾其強大力量將女性形象做為商品符號(109),以肯定女性之名,行資本體系大規模行殖民女性之實。這些物化女性的卡通動畫在文化工業的操弄下不斷重播,日復一日深深嵌入兒童的心靈,成為他/她們性別角色模仿的對象,使其自然而然內化父權社會的價值。男童理所當然扮演王子、英雄,女童想像自己是等待王子救援的美麗、柔弱公主。

又如每日在台灣上映,女性角色擁有誇張三圍、穿著誘人服飾的日本卡通,及無數以女體吸引視聽人目光的廣告,也顯示女性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以性化與物化的形象呈現,足證今日社會實未放棄對女性的操控與壓制。

電視和電影中的女性呈現這樣令人憂心的形象，文學文本中的女性也未若想像中的更貼近現代女性的真貌。尤其是兒童幼年時期所閱讀的童話、民間故事經常出現虛構的女性，使兒童從早期閱讀經驗中接受不真實的銘印。齊普斯（Jack Zipes）嘗於《童話·兒童·文化產業》（*Fairy Tales, Children,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中指出：經典模式的童話故事，像是貝洛、格林、安徒生或是當代的經典通俗迪士尼電影，都具有強化父權社會與消費文化產業的傾向（26），更教人擔憂的是，童話故事就像「自然歷史」一般迂迴的滲入兒童的生活（124）；倘若兒童從小開始自然而然的將父權價值內化，長大成人後的兩性能否察覺幽微而深埋的父權意識型態，並加以質問女性的真名？

以兒童經常閱讀的《格林童話》為例，巫婆永遠是貪婪、恐怖的象徵，在故事中下場悲慘，常被處以殘忍的酷刑。然而邪惡「女巫」的出現其實是基督教逐漸掌握整個歐洲文化的轉型過程下，作為主要論述者的男性摹塑出的女性負面典型（黃靖芬 3）。換言之，「女巫」的負面論述¹（discourse）與形象乃在政治意圖下形成。然而兒童並不瞭解這些歷史，也不清楚塑造這些女性形象背後的意識形態與牽涉其中的兩性之間權力關係，卻不加懷疑的接受，令人不得不擔心身處各種強勢媒介傳播影響力下的兒童，理所當然的將女性視為自我犧牲的母親，或是做為男性慾望的客體，或是瘋狂恐怖的嗜人女巫。

無論是真實世界中的女性或再現於社會的女性形象，皆是為滿足男性的理想與需要，而被包裝成賢妻良母、睡美人、傾國妖姬或惡毒女巫。誠如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所言，女人總是配合男性英勇的演出幻化各種面目，「被包裹在合適的皮囊之內，但是，卻非我們自己的皮囊。退守至專有名詞中，卻反遭其害。既非妳的，亦非我的。我們什麼也沒有。我們改換名字，猶如男人交換我們。猶如男人使用我們，把我們用盡榨乾」（《此性非一》 269），為男人而存在卻失去自我。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對女性存在的虛無也提出類似觀察：「多少世紀以來，女人只做了一面鏡子，有一種幻異而美妙的作用，將男子的影像加倍放大。如果沒有這種妙手，也許大地上仍

是一片曠地與叢林，根本也許就沒有人類那些光榮的戰蹟」（67）。從此角度來看，即使女人的地位已提昇，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我們仍舊生存在女性利益被迫附屬於男性之下的父權社會²，屈從於父權權力之下。

然而，這一切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達成的？為什麼千千萬萬的女人心甘情願耗費金錢、精力，甚至忍受痛苦追求美麗，成為男人欲望的客體？為什麼世世代代的女人，不斷走進家庭這個無形的監牢成為妻子、母親，甚至內化賢妻良母的女性神話，成為犧牲奉獻、支撐男性存在的美妙鏡子？維登（Chris Weedon）認為後結構主義觀點對女性為何安於妻、母的角色提供相當好的解釋架構。從後結構主義觀點來說，人類一出生便處於語言並受其塑造，語言提供不同話語位置與兩性特質模式，影響我們詮釋自身的經驗與所有知識，建構了自我與個體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影響個人意識及潛意識的思想、情感及對自身的感知，及瞭解個人與世界關係的方式（38）。如同西蘇（Hélène Cixous）所言：「一旦我們存在，便生存於語言之中。語言向我們說話，宣講其法則，它給予家庭模式，給予婚姻模式，甚至在說出一個句子，肯定實在的意思、對實在置疑，一個本體論，我們已為男性的欲望所掌握」（“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45）。

主體性由主體位置所構成，個人從認同的主體位置構成對自身的感知，根據特定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及解讀我們的經驗，因此是社會與文化的產物，一種話語（discourse）的結果，經常遭遇衝突、矛盾、處於過程中並不斷改變（維登 39）。早在我們學習語言之前便已存在於法律、政治體系、教會、學校、家庭、教育制度和媒體等社會機構與社會實踐中的特定話語，經由表意的過程建構「我」，言說的主體實則依賴早已存在的話語位置，且被迫採取話語所設置的立場（巴克 234）。

巴特（Roland Barthes）在《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指出權力無處不在，它以意識形態的樣貌滲進國家、階級、集團，甚至潛入家庭和私人關係裡（188-89）。權力隱藏在話語之中，並緊密攀附在語言結構裡；語言結構是一種分類現象，而所有的分類都是壓制性的。因此，語言結構就是「一種普遍化

的支配力量」(190)，本身即包含一種無可避免的異化關係。更確切的說，語言「為權力服務」(190)。

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中、西方，關於女性的話語都來自於男性，女性成為話語所構成的知識對象，進而被剝奪替自身發言、詮釋自我意義的權力。失去語言的女性僅能「以男人的聲音講話或是保持緘默」(黃華 17)。孟悅、戴錦華也認為，女性聲音在歷史上被壓抑、消音的處境，使得「大部分女性除了在規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現，以強制的語言說話外，根本無從浮出歷史地平線」(26)。女人的身心在父權話語的包圍下，不自覺的被形塑成符合男性需求的樣貌與情感，她的欲望與需求未曾得到表述。艾瑞葛來在《基要文選》(暫譯：*Key Writings*)的序言直指整個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遺忘女性以及相關的自然、女神痕跡的歷史(vii)，女性在歷史上從未曾以她原有可能的姿態出場。

如此說來，倘若女人的主體(性)早已「被語言與象徵系統所模塑，被管理機制與物質環境所制約，被集體記憶以及文化儀式反覆增強」³，被迫接受附屬於男性的不平等地位；那麼，女性掙脫束縛身心的權力網絡的契機何在？「她們」爭取自由的力量將從何來？

第二節 反抗的力量

傅科 (Michel Foucault) 曾說：「沒有不存在反抗的權力關係；反抗是更為真實且更有效的，因為它們正是在權力運作之處所形成的」(轉引自史帕哥 30)。因此，女性若想抵抗隱藏在語言下的權力觸手，就必須以語言反擊。誠如巴特所言，唯一能從語言內部抗拒語言結構內隱匿的性別權力，就是文本 (texte)、寫作的實踐 (191)。維特格對此也提出類似的見解，認為藉由創造新的文本、話語，提供女性對語言的批判性觀點，拆解關於女人的神話，將使語言不僅是壓抑女性的方式，也可以是反抗的媒介，更是觀念澄清和推論性的創新工具 (瓊斯 80-1)。

自女權運動風起雲湧，女性主義思潮傳播世界各地之後，許多女性作家的性別意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開始關注女人他者的社會處境，不願繼續在無意識中接受父權社會分派的角色，延續被宰制的命運，揚升以寫作重新定義及創造女性話語，反抗社會結構裡不平等性別權力的意志。

美國著名當代女詩人芮曲 (Adrienne Rich) 在《謊言、秘密與沈默》(暫譯：*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提倡以寫作挑戰父權體制，大膽書寫出女性自身的經驗與生命故事，以女性的角度重新定義女性，因為「沒有任何事物神聖至不可侵犯，不允許我們的想像力加以顛覆或大膽的為其重新命名」(43)；透過寫作這種再命名的行動，方能修正、顛覆父權體系下女性不實存在的神話。而回溯女性的歷史，積極探詢女性在世上生存的真相，瞭解女性遭遇過何種控制，反女性的暴力曾如何運作；在各種時空、文化下的女性，曾經如何握有權利、重要資源與領導才能，及在壓迫與不平等的狀況下，女性曾擁有何種力量 (*Blood, Bread, and Poetry* 149)，更是建立女性自我認同的重要工作。當我們深入瞭解並分析女性曾「如何」在各種歷史、文化文本中被表述，以何種身形樣貌生活，講述哪些父權社會期望聽到的語言，才能進而打破沈默，浮出歷史地表：

在藝術和文學、社會科學中，在我們接受的所有關於世界的描述裡，傾

聽和觀察那沈默的、缺席的、未說出的、未符碼化的——在那兒，我們將發現有關女人的真實知識。藉由打破沈默，命名自我，發掘隱匿者，使我們自己在場，我們開始定義引起我們共鳴、確認我們存在的現實。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245)

西蘇則認為女人應粉碎社會強加於女性身上的枷鎖，擺脫嚴密的監視，用身體寫作表達出四通八達、貫穿全身的豐富含意，讓陳舊固著的母語以多種語言發出迴響，重新將女性嵌入世界與歷史，重新賦予女性這個空洞能指新意。在著名的〈美杜莎的笑聲〉一文中，西蘇談到女性書寫的意義與力量：

幾乎一切關於女性的東西還有待於婦女來寫：關於她們的性特徵，即它無盡的變動著的錯綜複雜性，關於她們的性愛，她們身體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區域的突然騷動。不是關於命運，而是關於某種內驅力的奇遇，關於旅行、跋涉，關於突然的和逐漸的覺醒，關於對一個曾經是畏怯繼而將是率直坦白的領域的發現。(94)

文學做為揭示文化中的性別偏見，反對父權價值觀的潛在場域，在性別不平等根源的探究，與中止婦女壓迫的文化改造工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荷24）；而文學做為一個模塑主體的話語場域，具有改變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可能，使得許多女作家從不同方向著手創造新話語，為女性發聲。對此，林松燕也曾提出這樣的問題：「到底女性主義文本應致力於描述父權制度下女性現有的狀況，或女性境況改變之後的理想狀態，還是文本提供了女性應該如何改變的方法呢？」（10）。

紐西蘭極富盛名的兒童文學作家瑪格麗特·梅罕（Margaret Mahy）所寫的《變身》（*The Changeover : A Supernatural Romance*）則兼具上述各家之長；她未若其他女性主義童話一般直接挑戰、激盪讀者的觀念（Adam Berkin 250），而是巧妙引導讀者覺察童話及其潛藏的性別刻板印象如何運作（247）。顛覆原有童話的內容；如沃克（Barbara G. Walker）著名的《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s*），即改編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超越父權意識下女性以美麗與犧牲等

待男人賜予幸福的模式，顛覆父權話語所提供的女性主體位置；除此之外，梅罕更運用羅曼史慣有的包裝手法，帶領讀者批判羅曼史如何以隱藏的父權文化符碼，掩護性別權力的運作。在充滿魔幻寫實風格的《變身》中，她細膩刻劃女性在現代社會遭逢的困境，再藉由穿梭現在與過去時空的內在旅程，透過進出意識與潛意識心靈狀態，從父權論述底下沈默的裂縫引發覺醒，摹繪女性境況改變後，藉由打破沈默、命名自我的理想狀態，提供女性改變的方法。

梅罕特殊的書寫手法，引起研究者的強烈興趣，擬以《變身》為研究文本，援引傅科的權力與主體觀點，及艾瑞葛來的母女關係、女性主體理論，探究文本中的女性主體的消失與重構。傅科認為主體是論述的產物，形塑個體對身體、心理及經驗的解讀，但仍是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論述提供某種主體性形式的同時，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提供論述中受制的主體抵抗的機會。艾瑞葛來則指出父權文化以母性功能定義女人，卻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性，使女人僅能做為支撐陽剛主體的沈默物質基礎，因此女性應重新探索母女關係，建立女性系譜，使女性認同有所依歸。依循傅科與艾瑞葛來的思考脈絡，研究者意欲探究文本中的女性主體如何在父權話語的規訓、凝視下消失，成為男性欲望客體或淪為支撐男性認同的鏡像？文本如何顛覆傳統羅曼史形塑女性特質的父權意識形態？又如何創造與形塑怎樣的女性新論述／主體？

因此，本論文分為五章，第壹章陳述本研究之動機與問題、研究方法與作家文本介紹。第二章援引傅科、艾瑞葛來的主體理論耙梳主體的消解與重塑。第三章探討女性主體在父權規訓及全景敞視機制下物化與客體化的過程。第四章探討母女關係的轉變對女性意識覺醒及女性主體再造的影響。第五章則進行結論的闡釋。

第三節 故事與魔法師

一、作家介紹

杭特 (Peter Hunt) 曾讚譽：如果有任何作家的作品能打破「兒童文學禁不起嚴肅的評論檢視」(89) 的古老批評格言，此人非瑪格麗特·梅罕莫屬。他認為梅罕的作品極富影射性，交織複雜性層次，逐漸被嚴肅的文學評論者視為挑戰 (90)。梅罕生於一九三六年，父親愛好閱讀，常為孩子念冒險與刺激故事，對她影響深厚，使其日後寫作風格充滿豐富奇特的想像力⁴。梅罕於一九五八年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後，便一直擔任圖書館管理工作，並持續不斷寫作。她的第一本書《草地上的獅子》(A Lion in the Meadow) 於1969年出版，至今仍不斷再版。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分別以《魔法師的接班人》(The Hunting) 與《變身》(The Changeover)，兩度獲得英國卡內基兒童文學獎(the Carnegie Medal)。其他作品也贏得許多不同獎項，並陸續翻譯成十五種語言，使她成為當今紐西蘭，甚至是英語系國家最有實力的作家之一。她的創作形式多樣，包括兒童圖畫書、青少年小說、詩歌和劇本；同時，也是個傑出的散文家、評論家和思想家。二〇〇六年獲頒兒童文學領域最高國際榮譽的國際安徒生大獎 (Th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s)，肯定她對兒童文學長久以來的貢獻。

梅罕的作品擅於在現實中巧妙融合超自然元素，故事中的角色與場景雖符合人們真實世界經驗，卻常穿插如鬼魂、魔法、時光旅行、形體移動等奇幻元素 (Alison Waller 42)，充滿奇幻寫實 (fantastic realism) 風格 (21)。梅罕的故事經常蘊藏豐富的想像力，從幾個典型的書名如《象奶》(Elephant Milk)、《綠耳朵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Green Ear)、《海怪的乳酪》(Hippopotamus Cheese)、《櫻桃樹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the Cherry Tree)，即顯現幻想是梅罕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羅瓊安 1)。

梅罕雖位居紐西蘭，但其作品根源於歐洲的文學傳統，因此其寫作靈感與故

事架構多取自歐洲民間故事、傳說⁵，也常以童話及神話豐富作品的隱喻與象徵。例如在《變身》(*The Changeover: A Supernatural Romance*)一開頭，梅罕即以「薑餅快跑，被狐狸吃掉」(18)，隱喻傑可的生命力將被伯瑞丘攫取；蘿拉進入變身的歷程也令人聯想到希臘神話裡泊瑟芬、狄蜜特母女的故事，象徵蘿拉與母親關係的圓滿；睡美人(*Sleeping Beauty*)的意象更貫穿整個文本，指涉蘿拉的女性意識與性覺醒。

二、文本介紹

《變身》(*The Changeover*)⁶敘述十四歲的平凡少女蘿拉與弟弟傑可、在書店工作的單身母親凱特相依為命。平時在放學後，總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分攤母親的辛勞。蘿拉正值身心混亂、性覺醒的青春期的，又逢母親結識新男友，對母親陷入熱戀感到不安，安定、熟悉的日常生活面臨崩解。一日，蘿拉與傑可回家途中，進入惡靈卡莫狄·伯瑞丘所開設的骨董店，渾身散發腐敗薄荷糖漿味的伯瑞丘，慫恿傑可讓他在手上蓋個印章，不料卡莫狄竟以此法吸取傑可的生命能量，致使傑可迅速陷入沈睡，生命力急遽消失、不成人形。送入醫院後，醫師對傑可的病束手無策，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傑可。深愛弟弟的蘿拉心急如焚，鼓起勇氣尋求高年級級長索倫森·卡里斯利(囉唆)——蘿拉敏感的察覺「他」是個「巫婆」——的協助，確認伯瑞丘是個以他人精力與生命為食的惡靈，擊敗他的唯一方法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回蓋一個印記在卡莫狄手上。因此，蘿拉必須成為女巫，以擁有自己的印記。在卡里斯利巫婆家族成員合力協助下，蘿拉經歷一場如夢境般的「變身」，通過種種試煉喚起內在力量，經由女性意識的覺醒成為充滿潛能與勇氣的巫婆，改變她與原來世界的關聯，建立起新的女性主體與自我認同。最後，憑著智慧與勇氣，蘿拉成功擊退伯瑞丘，挽回傑可的生命；同時接受父母親的離異與父母情感新歸宿，療癒內心因父親離家而形成的創傷；也引領索倫森·卡里斯利走出黑暗的高塔。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維登認為後結構主義的語言、話語領域、主體性的理論解釋現存權力關係並識別改變的領域與策略(47)，提供女性主義分析性別權力運作與抵抗的良好架構。後結構主義巨擘傅科(Michel Foucault)在《性意識史》(*The History of Sex*)中闡明權力的論述，將主體的形構置於語言、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網絡中，揭示話語及權力在形構個別主體的意識與潛意識、身體與情感所扮演的角色；主體雖是在話語實踐中被社會建構而成，但仍以一個能思考、感覺的主體與社會代理人而存在，並能從相互矛盾的主體位置與實踐的衝突中，產生抵抗與變革，同時亦是能影響話語關係的主體(維登 148)。在《規訓與懲罰》裡，傅科進一步剖析話語與權力的緊密結合如何對個人進行規訓及宰制，提供分析加諸於女性身體與心理的權力模式，本研究將引以為析論女性主體在現實社會破碎、客體化的基礎。

伊瑞葛來論述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降，在同一邏輯下否認女人具有主體性，將她們排除在象徵秩序之外；除了從精神分析觀點批判陽具中心美學如何排除「女性—陰性」，並將「母性—陰性」做為支撐父權陽性經濟的來源與基礎(林松燕 10)；更構思以積極正面的陰性身體詩學建立女性話語，重構女性主體的新方向，有助於本文從潛意識及母女關係的層面理解女性主體重建的可能。

第一節 語言與主體(性)

傅科、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後結構主義者從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獲得重大啟發，並由此入手自不同方向消解了人的主體。因此，從索緒爾的理論切入有助於瞭解傅科的語言觀點。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由符號鏈組成的抽象體系組成，可分成語言(language)、言語(parole)兩部分。語

言指在言說與書寫前，即已存在一約定俗成的語言固定結構，使意義是固定的。言語則是特定情況下個別說話者的個別行為。每一個符號乃由一個能指（signifier）（聲音或書寫形象）和所指（signified）（觀念或意義）所組成。能指與所指之間並無自然的聯繫，完全是以任意、武斷的方式連結，意義並不是能指和所指本質相呼應的結果；能指並不真實反映所指的本質（史都瑞 110）。每一個符號的意義藉由與其他語言鏈中所有符號的差異而產生，因此符號的意義是關係的（relational）而非有本質固有。女性主義者從此理論所獲得的啟示是：「女性」的意義或「女性的」特質，並非被「一自然的世界所固定並且反映於『女性』這個詞語之中，而是在語言之內被社會產生出來的，它是複數的並受制於改變」（維登 28）。當我們將語言理解成互相競爭的話語及試圖為世界賦予意義的方式，且不同的方式代表不同社會權力組織的利益，便突顯出語言不僅是「社會的」，更是政治鬥爭的場域，而「女性」此一能指的意義，無疑是父權社會權力與利益競逐定義的首要對象。

後結構主義雖採用上述索緒爾的原則，卻質疑索緒爾將「意義置位於言語系統本身之中，但卻視意義為單一而『固定的』（fixed）理論（維登 29），因它無法解釋意義的多數與變化，甚至互相衝突。例如，「女性」此一符徵為何隨著時代變遷而具有多變、矛盾的意義？德希達延伸、極端化「符號依其在差異系統的位置而產生意義」的原則，創造了延異（différance）一字——即延宕與差異——來描述符號的分裂特性；意義總是不斷的延遲，從未完全呈現，總是同時在且不在（史都瑞 132）。德希達在《書寫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中論道：「能指對能指無止盡的指涉……使得所指的意義沒有終止……所以總是一再表意」（25）。對德希達而言，固定的能指與所指並不存在，唯有彼此之間的差異方能識別，它們並受制於無止盡的延遲過程，意義視話語的背景情境而暫時被固定，所以我們總是在語言無窮衍生意義的層層疊障中迂迴，無法透視事物的本質。用德希達的話來說，「女性」此一意符的意義是聖潔母親或邪惡女巫，端賴它被置放於何種特定背景的話語情境、社會文化而定，並總是不斷被重構與再詮釋。

大體上說來，傅科同意德希達對語言功能的質疑，尤其反對將語言視作能將事物本來面貌完整傳達的透明媒介。語言作為傳遞訊息與知識、甚至可說建構人類文明的媒介，其重要性無以倫比。然而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準確完整的表達所指涉的事物卻有待深究。語言如同萬物一般晦暗難明，不應被高舉至神聖的地位；然而從中世紀以來，人類誤認語言具有透明表徵能力，企圖以語言的排比尋求事物間的秩序與真理，此舉無異緣木求魚。人類對歷史文化的詮釋可以說是建立在以語言作為表象工具的基礎上，依不同時代語言象徵意義的嬗變而異，形成特定的歷史觀、知識觀，甚至於對「人」的定義⁷。

對傅科而言，表面上是人製造文本，實際上人不過是重組當代既有知識、論述與真理政權（蘇永明 174）。與傳統人文主義將人視為自給自足的主體，擁有固定、獨特本質的觀點相左，傅科不認為人具有先驗的意識能主導論述，反而要訴諸論述實踐來解釋。人僅僅是語言的載體，卻誤認自己是語言的主人、意義的源頭，對自身受到語言型塑渾然不知。在《事物的秩序》（暫譯，*The Order of Things*）中傅科說：「人們使用他們無法掌握的文字來表達思想，使用的表達形式都已具有歷史的維度，然而他們並未察覺，依然相信自己所用的語詞僅是自己的僕人，沒有料到自己是在遵循語言規則的要求」（297）。伊果頓（Terry Eagleton）也指出「意義既非個人經驗，也非神聖制訂的東西、它是某種共有的顯義體系的產物。……語言先於個人存在，它遠非個人的產物，個人才是語言的產物」（136）。

個人是主體性衝突競爭的場域；以女性為例，她同時身處鼓勵個人成為獨立自主、自我實現的自由個體，與為盡職、慈愛母親的話語中。現代社會雖鼓勵女性走出家庭成就自身事業，期望女性工作時與男性一樣全力以赴，但對女性母職的期待依舊，使職業婦女在母親與工作之間不斷遭遇內在衝突與矛盾。

芮曲指出，父權社會未經思索的認定一個「天生」的母親是沒有其他身份的人，能夠整天與孩子相處，依他們的步調而活，母親在家庭中與世隔絕是理所當然。然而社會頌揚母親角色的無私無我、自我犧牲，並鼓勵從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得到自我實現，常使女性沮喪的認為自己是個不稱職的母親。芮曲在她的日記

中打破父權社會的母親神話，真實表達出女性被囚禁在母親角色的痛苦心聲：

我的孩子帶給我迄今所知最強烈的，一種矛盾不堪的痛苦：一方面怨懟、憎恨、脾氣暴躁，一方面感到幸福、滿足、溫柔，兩方面要命的來回交替。有時候我對這些無辜的小東西的想法，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無私無情的怪物。他們的聲音刺激我的神經，他們永遠需要照顧，尤其是需要人用簡單而耐性的態度來對待，令我絕望於自己的失敗，也絕望於我注定要扮演一個無法勝任的角色。（〈憤怒與溫柔〉133）

在過往的歲月，眾多擁有各種才能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處於這個吞噬女性的母親神話中，僅能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事，扮演相似的角色，將天分埋沒在柴米油鹽與奶瓶尿布間。

然而，「當任何個體構築一項陳述時，都可以填滿一個特定的主體位置，而且同一個體也可以佔據著無數不同的位置」（巴克 235），因此個體擁有不同的主體性形式，在每一次思考或言說時不斷被話語重構；主體位置變動的可能性，為主體性的改變帶來無限契機。當社會期待的母親角色與女性重視自我實現的理想相互衝突時，雖使女性對自身多種社會角色及女性特質的理解相互矛盾，但也唯有處於此種矛盾衝突的情境，女性才能更有意識的察覺自身是語言的產物，並非擁有某種與生俱來的本質使她成為女人，以及不同主體性之間的矛盾根源，才能引發不同政治選擇的契機，使主體性產生變動的可能，進而調整原有的主體位置。

第二節 話語與權力

根據傅科的觀點，話語是構成知識的方式，也是思考及產生意義的方式，更是構成它企圖管控的那些主體的身體本質、潛意識及意識心理與情感活動的要素；身體、思想與情感也唯有在話語的實踐中才具有意義。經由權力關係網絡下的社會機構，話語構成個人的身體與心理（維登 128）。在《性意識史》中，傅科認為我們應該將權力理解為：

眾多力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那個領域……而且它們構成自己的有機體；那使它們在不斷的鬥爭與對抗中改變它們、加強它們、掉換它們位置的規律；諸多力的關係之間存在的那些使其形成系列或系統的相互依賴的點，或相反，使它們彼此獨立的差距與矛盾；它們賴以發揮的作用的戰略，其一般意圖或制度形式，體現在國家機器、法律陳述和社會聯盟之中。（79-80）

與視權力為實體的傳統權力觀相反，在傅科看來，權力不是一種制度、結構，不是特定人士擁有的勢力，也不是某種可以獲取、分享的東西，而是存在於社會中的「複雜的戰略形勢」（《性意識史》80），是彼此聯繫、對立的力量關係總和，包括這些不同力量抗爭、轉化的過程，是一種處於不穩定、動態的關係網絡（黃華 54）。更確切的來說，有權力就有反抗，但反抗並非外在於權力：

權力關係只有依據眾多的抵抗點才能存在，這些抵抗點在權力關係中起著對手、靶子、支撐和突擊點作用。在權力網中，這些抵抗點無所不在……反抗是另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面。因此，它們同樣呈不規則的分佈狀態，反抗的點、結、源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分佈或疏或密，有時明確的喚起一些團體或個人，刺激身體的某些點，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及某些類型的行為。（《性意識史》82-3）

在傳統權力概念中，權力代表禁止、鎮壓，而傅科的權力觀點與眾不同，他

認為權力不僅僅顯現否定、破壞等負面特徵，更具有生產性的面向。特別是在權力涉入知識與真理的建構過程，最能顯現出權力實踐的多元化與創造性：

我們不應該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它進行「排斥」、「壓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生產。（《規訓與懲罰》192）

因此，對傅科來說並不存在所謂客觀、中立的知識，它們為相互競爭的特定利益所爭奪、定義。貫穿於權力與知識的發展變化和矛盾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與其可能的領域（26）。知識論述的形成與傳播受制於特定的社會權力網絡，權力網絡的建構與運作依賴知識論述的形構與擴散，兩者之間相互滲透、協調，使現代人在建構自身成為主體的同時，也成為傳播知識的從屬性因素，知識與權力運作的對象。

傅科在《性意識史》中以性意識機制的建立，論述權力與知識相互滲透與勾結的關係，揭發知識在權力的要求下，如何製造與性有關的言說。從十八世紀初開始，性意識藉由四種以「性」為核心的知識／權力特殊機制而發展，每一種都是訓練技術與調節手段結合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將女性身體歇斯底里化。女性身體被捕捉成為具有某種「科學」地位的話語知識對象，以現代科學的角度從三個層次分析，使女性身體變成僅是子宮並且是「神經質」的：

首先，女性的肉體被當作充滿性意識的肉體來分析，並被賦予優點和缺點；而後，在女性肉體內在的病理學作用下，女性肉體被納入醫學實踐領域；最終，女性肉體被置於與社會機體（女性肉體必須保證社會機體有規律的繁衍），與家庭（女性肉體必須是家庭基本的、功能性的組成部分）及孩子（女性肉體不但生產後代，而且必須在整個教育後代的過程中，在生物——道德方面對它們負責）的有機聯繫之中。母親及她的反面形象——「神經質的女人」構成了這種歇斯底里化的最明顯的形式。（89）

醫學對女性的身體和性進行歇斯底里化研究的目的，並非為探究女性身體的真理或促進女性的健康，而是以「婦女應該對她們孩子的健康、對家庭結構的穩固和社會未來負責」（《性意識史》125）的名義進行，藉由將女性客體化，賦予各種得以穩固父權社會的詮釋。權力與知識通過對女性性意識的部署，將女性歇斯底里化，確保資產階級的利益與需要，也確保統治階級精力充沛、健康長壽（105），達成對女性生命的政治安排。因此當女性被期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並非單純基於生理事實的性別分工，更是權力結構運作下，對女性所下的註解及文化實踐的結果。而家庭吸收自古典主義時代以來的教育、軍隊、醫學、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模式而被「規訓」，成為考慮個人正常與不正常的最佳起點。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正是透過家庭的種種規訓，傳播兩性行為規範的知識；傳授操持公、私領域技能，使兩性各司其職，使「家庭一逕都是女人受壓迫的最重要場所」（伊瑞葛來《此性非一》186）。

傅科的觀點指出父權社會如何藉由權力生產女性身體性質的話語，將女性的身體本質定義為適合再生產，「自然」應當肩負生兒育女的責任，並建構女性的特質與角色規範，以壓制女性並將其從公領域排除，來維護男性的特定利益，意即以科學研究之名行社會控制之實。因此，性意識機制實起源於統治階級對增強自身體質、傳宗接代與享受生命的關注，在經過改造後，被做為經濟控制與政治壓迫的手段應用到其他階級，做為肉體享樂、言說、真實與權力的新策略就此產生（《性意識史》105）。透過話語，權力與性的知識、身體概念緊密連結，而這些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界定性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權力影響「知識」定義何謂「合宜的」性與行為（史密斯 30）。

以羅曼史來說，做為一種提供兩性構想性別關係與兩性特質的話語，它設定兩性特質的規範，提供理解性別關係的方式。維登指出，不同時代羅曼史中的女性，雖然在肉體吸引力的標準不一，但女性角色的女性特質卻相當穩定，揭示它們維持並複製兩性關係的某些基本假設，從而凸顯父權再現女性特質的一致性（121）。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對羅曼史的分析更進一步指出，許多女主角

總是被描寫成等待邀約、親吻、回應男性情慾的被動姿態，較少出現主動的行為，在她們的愛情世界，等待與被動是一種合宜的女性特質；而男性通常扮演性與情欲的主導者。羅曼史將兩性的性慾特質劃分成主動與被動，並不斷強化男性天生即容易性衝動，積極主動並富侵略性，而女性較缺乏性慾或被動消極的概念（鍾佩怡 17-8）。羅曼史做為一種傳遞、複製特定兩性特質的論述，再現主流文化有關性的價值、規範、認同、知識，再次呼應了精神分析對兩性特質的建構，使得在語言系統中原本具有不確定的兩性特質意義，「因為陽具的崇拜指涉而被定型；文化本身也成了『父系法則』（law of the father）的具體實踐」（康乃爾《性／別》105），再度強化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性別結構，使得父權系統中性別配置的符號關係更加穩固。因此，在種種權力關係網絡包圍下，女性主體的生理、心理與情感層面，經由家庭、文化與社會機構等社會實踐，被建構成符合男性利益的客體。

然而話語是一系列的環節，並不具連貫而統一的穩定策略。話語雖是「權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礙和阻力，是它的反抗點及對立的戰略形成的出發點」（傅科《性意識史》87）。話語雖負載並生產、加強權力，但同時也削弱、暴露權力，使其變得脆弱並阻礙權力的實施，使抵抗的產生成為可能。話語提供某種主體性形式的同時，它的組織亦包藏著其他的主體位置及倒置的可能性，而「倒置的話語」（reverse discourse）能提供話語中受制的主體為自己發言的機會，以獲得自身合法地位的權利（維登 129）。在《性意識史》中，傅科以同性戀話語為例，說明話語如何提供反抗的基點：

十九世紀，在精神病學、法學及文學中出現的一系列關於各種類型同性戀、性倒置、雞姦、「雌雄同體」的言說顯然使社會加強了對這一「邪惡」領域的檢查與控制；然而，與此同時，作為對此的「補償」，形成了一種新的言說：同性戀開始使用那些人們用來將它逐出醫學領域的詞彙與概念進行自我介紹，要求獲得合法地位「權利」。（87）

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女性話語一直處在主流話語的邊緣、被壓抑位置，唯有取

回自身的話語權，才有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而「倒置的話語」能挑戰主流話語的意義與權力，是生產顛覆父權的抵抗性話語的第一階段（維登 130）。優勢的話語通常以法律或醫學、教育、宗教等社會實踐或社會組織為其基礎。而女性主義的話語缺乏社會權力，無法藉社會機構實現知識敘述，但只要能處於流通與散佈的狀態，從個別主體的層次上提供話語空間，產生異於父權社會定義的他種知識與話語，就能讓女性有機會拒斥父權社會提供的優勢主體位置。一旦接受這種抵抗話語的女性增加，女性的社會權力也能隨之逐漸增加（131-33）。



第三節 規訓與身體

根據傅科的觀點，現代權力主要從十八世紀晚期的規訓制度發展而來，各種微型技術廣泛為醫生、監獄、教師所運用，逐漸擴展遍布整個社會機體後，形成所謂規訓的社會。傅科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了許多新的微型策略和實踐，以說明權力的微觀物理學。他將規訓視為一種權力類型、行使權力的軌道，包括一系列手段、技巧、程序、應用層次、目標（214）。它是一種身體技術學，以人體為目標，但並未將人體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能夠被分析的許多細部，能從運動、姿勢、態度、速度等機制對其施加微妙的強制（137）。

傅科認為身體無法逃脫權力關係的網絡，它始終為眾多力的關係所支配、規訓。在權力與知識相生系統中，權力於知識形式的掩護之下，悄然形成對身體的種種規訓機制，使社會個體內化監管自身的技術，無時不刻自我審視、評價自己，無所不在的權力將社會個體納入監控、懲罰的網絡中。此種駕馭身體的技術學，經常由零星的片段而非連續系統的話語所組成，具有多種樣貌的操作形式，透過複雜多面的調度、計謀、技術、運作，使身體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和活動之中的關係網絡，其謀略的綜合效應造就馴服的身體，並使個體的行為、概念趨向一致（《規訓與懲罰》25）。

在《規訓與懲罰》中，傅科以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的概念說明權力無所不在的規訓機制。此類建築中間是座有一大圈窗戶的瞭望塔樓，四周則為環型建築。環形建築內有許多小囚室，每座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囚室皆有兩個窗戶，裡面的窗戶與塔的窗戶相對，外面的窗戶使光線能照亮整個囚室。利用光線與角度，位於瞭望塔的監視人員能將整個環形建築一覽無遺，使囚犯的一舉一動逃不過監視者的審視，因而規範自己的行為。瞭望塔藉由百葉窗與交叉垂直分割的隔板，隱藏監督者的存在。因此，囚犯在環形邊緣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而監視者在中心瞭望塔，能觀看一切，卻不會被觀看。被

囚禁者無時不刻目睹中心瞭望塔的巨大身軀，但在任何時刻都不確定自己是否遭到窺探，這種建築方式正體現了邊沁所提出的：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原則。這樣的安排在囚犯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201）。即使權力的行動斷斷續續，其效力仍持久不衰。囚犯將被權力局勢（power situation）所制約，成為權力局勢的載體，在權力關係中同時扮演囚犯與監督者兩種角色，並內化後者的監控力量，它能使權力在任何時刻進行干預，在不適宜的念頭與行為出現前，啟動自我控管的機制，自動承擔起權力壓制的責任，時時刻刻對自我進行監督，「造成精神對精神的權力」（205），使自身成為監控者執行監督的媒介，從而成為征服自己的本原，成為規訓機制的一部份。如此一來，權力達到自動化、非個人化的效果，讓「虛構的關係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202），存於內心的監控機制將使人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更重要的是，這種囚犯與監督者不對稱、不平衡的差異機制，使不論以何種身份、動機進入瞭望塔中的人都能產生同樣的權力效用。這種獨立於運用者的權力關係機制，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平面、光線、關注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規訓與懲罰》201）。這種能夠促使自我監督的結構，不但能降低行使權力的成本，又能大幅提高效能，不斷擴散至學校、工廠、醫院等各種社會領域，遍布於整個社會每個角落及看似細小的末端，形成規訓社會。

以全景敞視凝視機制來分析運作於女性身上的權力，最能勾勒出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所受的規訓壓力。黃華在《權力，身體與自我》中指出，現代社會流行的豐胸、塑身等各式各樣改變身體的行動，即使存在各色風險甚至危害健康，愛美的女性仍趨之若鶩，不惜耗費鉅資以求擁有符合標準的身材樣貌。表面上看來，這些行為似乎源出婦女自發性的選擇，實際上是將父權社會的凝視目光內化成自身標準的結果：「這些對女性身體舉止的種種規範並非以強加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權力的內在化使之自動地施加于自身」（70）。女性如同生活在圓形監獄中的

囚犯，男性對女性無所不在的凝視，使女性內化男性灼灼目光於日常生活的自我監視，自動遵守父權社會對女性行為的規範。

在《變身》中，當蘿拉為了解救傑可而不得不於黑夜中前往卡里斯利家尋求協助時，兩個月前社區中有位老太太在自宅遭劫殺，及平凡笨拙的珍妮絲·寇羅被強暴的事件令她如驚弓之鳥；即使是一個從街道上走近的不知名男人，無論他的身份、動機，在黑暗的夜裡任何一位男性都使她感到恐懼，究竟應該走在光亮或是黑暗的矛盾抉擇，正顯示男性凝視對女性所產生的規訓力量與心理壓力：「要時時提高警覺。她小心翼翼，沿著路燈照亮的光圈邊緣行進，拿不定主意究竟該走在暴露自己的行蹤，卻同時能看見別人的亮處，或者冒著被埋伏暴徒襲擊的危險，隱身黑暗」（梅罕 93）。誠如高榮禧所言，男性無遠弗屆的凝視機制不單染指女性的肉體，甚至滲透至女性的精神層面，對女性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79）。

當父權社會權力的觸手深深的探入每個女性的身心，憑藉各種鋪天蓋地的微型技術進行綿密的控制時，女性如何從性物與聖母的定位逃逸，重新女性建立主體，開創自己的空間，抵抗的策略與可能性為何？

第四節 女性主體與認同

話語通過社會機構與實踐等不同形式形塑個人，使人成為話語的主體。主體性的話語構成、控制個體的身心及情緒，使其與話語內特定主體位置認同。主體性模式的獲得「涉及了主體位置的意識或潛意識的記憶之累積，以及涵蓋於它們之中的心理及情感結構」（維登 133），透過法律、政治、教育等權力機制，終其一生不斷重複。精神分析從兩性差異的基礎發展出的主體性認同理論，對於構成主體的潛意識層面有著深刻的探討，相當有助於女性主義從此角度省思女性性別主體的形成。本節將探討女性生理與心理在精神分析下顯現何種面目？女性主體在歷史文化語境下經由社會建構，又呈現何種樣貌？女人的身影如何從象徵秩序中超越，豐盈空白的歷史書頁，建立新的女性主體與認同？沉默的聲音將如何浮出地表，使男性的(his)歷史(story)獨白劃下句點？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從他治療十九世紀晚期中產階級婦女歇斯底里症的成果，發展出以壓抑為根基的性別認同理論，指出性別差異乃產生主體認同的關鍵。它提供了一個關於意識、語言與意義的理論，提供理解女性和男性性質的架構，回答是什麼構成了主體性？我們如何獲得性別主體性？兩性如何內化特定規範與價值（維登 51）？引起許多關注「性」與「主體性」之女性主義者的重視。

佛洛伊德將性本能的發展化分成五個階段，兩歲半到六歲之間的陽具期是性別主體形成的關鍵時期。幼兒在此時必須經歷伊底帕斯情結的產生與消解，不過兩性的過程並不相同。對小男孩來說，他

從很小的時候就把情感投注到母親身上……小男孩對待父親的方式則是將自己認同於他。有一段時間，這兩層關係分別進展，直到有一天小男孩對母親的性欲望變得更強烈，並且發現他的父親阻撓著這些願望的實現，由此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此後他跟父親的認同便蒙上一層敵意

的色彩，而轉變為想要擺脫他，取代他在母親身旁的位置的願望。（*The ego and the id* 26-7）

佛洛伊德認為小男孩從很早時期便有手淫的行為，成人以恐嚇威脅等各種方式禁止，引起他的閹割焦慮。當小男孩發現異性沒有陰莖時，閹割情結發揮壓抑的作用，使他「經歷一陣恐怖的情緒風暴，迫使他相信閹割威脅確有其事。這種情形將決定小男孩終其一生對女性的反應——他將會懷著恐懼，或勝利者的蔑視看待這慘遭殘害的生物」（“*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6-7）。與此同時，由於擔憂失去陰莖，男孩放棄對母親的慾望轉而認同父親，將父親的嚴厲與權威內化到自我（the ego），形成超我（the super-ego）的核心，接收父親所代表的亂倫禁制令（《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553）。通過閹割焦慮的男孩學會控制本能衝動，完成良心與道德、法律的建立，以擁有陽具的優勢在文化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因此，具有陽剛、主動特質的「正常男人」應具有比女性更強的意識，更堅固的自我與超我，擅於運用現實原則（the reality principle）主動出擊，能改變外在環境以獲得享樂原則（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實現或滿足本我的願望。（轉引自劉毓秀 143-44）。

至於小女孩的伊底帕斯之旅則與男孩不同，女孩先出現閹割情結才發展出伊底帕斯情結。佛洛伊德在〈性別之間解剖學差異的心理結果〉（暫譯：“*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一文論述女孩對缺乏陽具的回應，並假定女性對此一器官的慾望。「她在瞬間即下判斷、做決定。她見過它，並知道她沒有它，且想要擁有它」（17）。佛洛伊德認為兩性似乎是以同樣的方式經歷力必多發展的早期階段。就侵略性此一特質而論，雖然有人預期小女孩在施虐肛欲期的表現顯得較男性為弱，但事實並非如此；小女孩其實就是個小男人。與男孩相同，女孩第一個愛戀的對象也是女性，然而她要成為「正常女人」卻必須改變她的快感區域與慾望對象（《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542-43）。在她進入陽具期後是以自慰陰莖的等同物——陰蒂來獲得快感。但她發現男孩的陰莖比自己的陰蒂更大、更醒目，便陷入陰莖歆羨

(penis envy)，並認定所有的女人都比男人低劣。小男孩優越的性器官傷害了她，因此她放棄自慰低劣陰蒂的活動，拒絕對母親的愛，同時壓抑一大部分性慾（551）。出於對陽具的渴望，女孩將慾望轉向父親，希望能從父親身上得到她所欠缺之物——陽具，或生下有陽具的嬰兒（552）。

至此，女孩快感區從主動性的陰蒂移至被動的陰道，從愛母親與女人，轉成愛父親與男人的性慾受壓抑的正常女人。然而由於閹割已是既成事實，閹割恐懼對女孩無法發揮作用，使其缺乏克服伊底帕斯情結的動機，僅能構成微弱的超我，無法獲得堅強及獨立的性格（《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554），因此女人「在正義感與急公好義的表現未若男人，且對事物的判斷也較易受一己好惡影響」（“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9），陰柔、被動的「正常女人」掌控現實原則的能力較男性不足，心靈能量較難向外發出，傾向內抑至心靈甚至身體，形成受虐的癖性（轉引自劉毓秀 144）。

佛洛伊德以「陽具至上」的生物論決定兩性身心特質優劣的說法，忽略特定社會文化對此一現象的影響，引起眾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艾瑞葛來在《女性她者的內視鏡》（暫譯：*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指出佛洛伊德的性差異理論奠基於「視覺中心論」，以眼睛決定何為真理：「看不到就被等同為沒有——沒有存在，就沒有真理」（48）。對佛洛伊德而言，兩性擁有一樣的性感帶，並扮演相同的角色，女性性欲即為基此男性特質為參數而衍生出來的概念（艾瑞葛來《此性非一》27）。在同一性邏輯下，菲勒斯（phallus）⁸是獨一的參照點，男性被高舉成唯一的主體，欠缺陰莖或僅擁有拙劣贗品的女人，不過是男性主體的種種變異，否認女人作為性別或認知主體的可能。女人的性欲也以男性欲望為標準，依其與男人快感的相同、相反、或互補而被分門別類（林松燕 21-2）。如陰蒂是小一號的陰莖，具主動指向客體的功能；陰道則是陽具的補充物，「有洞口的封套，一如劍鞘將陰莖包裹在內加以摩擦」（《此性非一》27），是男性器官最佳的寄居地。陰蒂主動故屬「男性特質」，陰道被動則屬「陰性特質」，兩者

恆呈二元對立關係，而由主動往被動方向發展，乃「正常」女性所必經之路，未能將欲望模式從陰蒂成功轉換到陰道的女孩，成為具有男性情結的女人。艾瑞葛來認為佛洛伊德定義女性性慾的方式，正暴露出一種習焉不察的觀念：「**任一科學真理以及論述邏輯均暗藏性別無差異的預設立場**」（原文黑體 90），他「並未看見兩個性別」（《此性非一》90），忽略女性可能擁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他曾把陰性特質當作陰性特質思考過的話，他或許會發現自己從他陽具式的燈塔位置掉下來，落入黑暗大陸的混沌中」（莫 162）。

艾瑞葛來認為佛洛伊德描述了社會實際上的狀態，即菲勒斯中心體系以陽具來定位女性的事實，他既沒有憑空創造女人的性欲，也沒有發明男人的性欲。作為「科學（男）人」，他不過是描述了現實社會中被壓抑的女性特質的黑暗面。真正的問題在於未能深究歷史因素如何影響他所處理的資料，僅就女性的個別史來詮釋她們的痛苦、病徵與不滿，視為女性特質的真相並歸為常態，並未質疑女性呈現之狀態與社會文化的關聯，最終仍將女性「重新歸順於父親的主流論述之下，亦即父親的律法，同時讓女人的需求噤聲」（《此性非一》91）。

承繼佛洛伊德的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則在《文選》（Ecrits）中以（後）結構主義理論重新解讀佛洛伊德，發展出鏡像階段與象徵秩序等理論，進一步從語言、象徵秩序的運作解釋陽具所代表的社會與文化權力優勢，揭開潛意識運作的語言法則，解釋主體的認同與差異（劉毓秀 145）。拉岡將嬰兒發展早期主客體不分，缺乏明確自我中心的存有狀態稱為想像態（the imaginary），相當於前伊底帕斯期（pre-oedipusphase）。此時嬰兒覺得與世界沒有明顯的分際，與母親的身體處於共生（symbiotic）關係。由於嬰兒的神經系統尚未完全成熟，無法任意控制與協調肢體，具破碎的身體感。直到約六個月大時，嬰兒進入鏡像階段（mirror stage），開始自我（ego）建構的過程。鏡中反射的身體影像隱藏嬰兒的不協調，使他誤認自己即為鏡中映射出的完整形象，發展出想像的能動性與整體同一感，產生自戀式的認同，從中誤識自己。然而實際上這個透過客體或他人反射回來的「我」是一個「誤識」的自我：

鏡像階段是一幕戲劇，其內在動力迅速地從缺乏轉向預期，主體陷入空間同一性的誘惑中，這幕戲劇為它製造出一整套幻想，從破碎的身體形象一直到我們稱之為被矯正過的、完整的外形——直到最後主體戴上了異化認同的盔甲，這幕戲劇的嚴密結構，將塑造出所有主體的未來心理發展。（王國方、郭本禹 141）

隨著嬰兒成長，他繼續與各種客體進行此類想像態的認同，逐步建立自我。拉岡認為，「自我不過是此一自戀的過程，因此，我們是在世界中尋找可以認同的東西，藉以支撐一個虛構的單一自我之感」（伊果頓 207）。

到了伊底帕斯期，父親的介入打破兒童對母子共同體的二元想像，也壓抑視母親為欲望客體的幻想。此時正值兒童語言發展之期，是學習與他人建立關聯，理解人類經驗與語言、意義的重要時期，意即進入拉岡所謂「象徵秩序」的時期。在象徵世界中，父親介入母子關係的父權位置恰與語言介入了想像中的母子共生一致，因此「象徵秩序毫無疑問的就是父權社會秩序」（Zoonen 32）。象徵秩序也就是父的律法(the law of the father)，體現在對亂倫的禁制、陽具力量的肯定與閹割威脅。「陽具」使兩性進入象徵界，兒童唯有將對母親的原初欲望驅入心靈深層的無意識，承認父親所象徵的禁忌與律法，才能在象徵秩序中擁有一席之地與說話的位置（王國方、郭本禹 151）。

根據拉岡的理論，主體是從獲得語言的過程中形成的。我們一誕生到這個世界，即開始不斷學習以自身所存在的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表達自我、思考與感受。語意、語法結構與既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所結合而成的各種特定話語，框架了我們對環境的理解及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及對情感的體驗。與此同時，語言也規範出性別差異，同時確認了男性的權力（Zoone 46）。

在以陽具為優位能指的父權社會，男人能以其陰莖能在象徵秩序之內取得權力與控制的位置；然而，對女孩而言，卻是進入一個無「女性」立足之地與發言空間的社會秩序。在父權的象徵秩序中，並不存在能對應女性獨特經驗與情感的字詞，使得女性難以傳承特殊的經驗與歷史。在沒有屬於自己的語言可供她們表

達自己的象徵秩序中，女性這個性別可謂不存在；女性不但在身體方面被男性視為缺少陰莖的「非男人」，一種匱缺的存有，同時也只能使用陽性語言訴說自己的欲望（Zoone 46-7），從而在身體與語言上遭到雙重閹割。「不全存在」的女人僅能以匱缺、偽裝、認同男性位置，及依附與男性的關係參與男性欲望的流通，如傳承父之律法的母親，否則沒有到達象徵秩序建立真實主體的途徑（維登 64）。因為「女人進入的價值體系實非她的，而在其之中女人也只能被包裝在他人，也就是男人的需求／慾望／幻想之中，女人才得以『現身』或通行」（伊瑞葛來《此性非一》176）。換言之，女性只能依據「男性的想像」與慾望，依照他們認可的既定腳本，扮演他們欲求的角色，而屬於女性的想像則深深沈入父權體系的幽暗地底。

伊瑞葛來沈痛的言道，當所有屬於女性的各種想像世界遭到拒絕、驅逐，女人僅能以破碎、零散的方式體驗她自身的處境時，女性「就此被置於主流意識型態甚少構築的邊緣地帶，被斥為廢物或過多之物，被（男性的）『主體』用來反映自身、複製自身所用的鏡子所遺棄」（《此性非一》35）。在《女性她者的內視鏡》中伊瑞葛來檢視主體的概念，指出過去所有關於主體的理論，都被「陽性」佔據，否認女人有主體性。女性被排除在外，以保證窺視主體所面臨的客體有穩定的組成基礎。倘若女人有想像力，（觀想的）客體便失去穩定性，受到打擾的男性主體又如何能安立其上？因而女性總是男性思想大師論述中的盲點，無法浮現於再現系統（莫 164）。

因此，伊瑞葛來強調女性應在文化中「尋求透過女人自己的身體、自己獨特的欲望模式，來建立一個觀照到女人這一性的性別話語與語言」（唐荷 146），以翻轉女性被放逐於象徵秩序之外的境遇。也就是說女性唯有發展自己的形構學，方有可能在社會與象徵的層次上，重新構築另一奠基於女性想像之上，使女性的身體與慾望以積極正面方式再現的空間（林松燕 27）。

第五節 重建女性系譜

在《此性非一》中，艾瑞葛來直指出女人的欲望與男人分屬不同的體制，「女人欲望的體制不僅打亂計畫的線性發展，摧毀欲望的目標——對象物，分散對單一快感的凝聚端點，還破壞了對單一論述的忠誠」(35)。女人沒有獨一的性器官？她至少有兩個！甚至更多！女人所擁有的性器官多少遍及全身，她的任何部位都能得到快感：

女人的自體快感跟男人就大不相同。……早在尚未區分主動、被動之前，女人即已開始自我愛撫了。女人總是不停的「愛撫她自己」，而且沒有任何人能阻擋她這麼做，因為她的生殖器官原本就是由兩片陰唇所組成，兩相持續碰觸彼此。(28)

這兩片唇，有時結合為一，有時一分为二。可以是裡也可以是外，能積極也能被動，「具有『未決定』(undecidable)的特性，它巧妙脫離了二元對立，也避開了陰核陰道的男性同一對比邏輯」(林松燕 23-4)。艾瑞葛來運用「雙唇」的意象，其目的並非描述或指涉女性的真實性慾或本質，而是「挑戰與對抗陽具形構的再現，顯示現有陽性固體形構的僵化、不足與荒謬」(24)，闡釋女性性慾的多元、曖昧、流體與踰越的特性，自主自足、不依賴男性，獨立於菲勒斯中心之外，以自我定義的多樣性，展示女性性慾形態跳脫象徵體系的另一種可能，及對陽具去中心化的企圖(23-5)。這種可能性使女人不再淪為男人自我投射的平面鏡，而能積極拓展作為女人自身而存在，女性主體得以體現。

男性想像下女性快感侷限在陰蒂／陰道模式的有限選擇，不但否定了女性性慾形態的特殊性，也導致對陰性特質的曲解及女性認同的困難(楊鴻雁 6)。艾瑞葛來以女性形構學代替解剖學，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女人，對女性身體、欲望與特質與提出新的想像與解釋，讓原本被認為低劣、污穢、黑暗、恐怖的女性身體與性慾，得以積極正面的再現(林松燕 24)。

伊瑞葛來認為女性的再現「完完全全都是根據男性特質的參數為藍本，亦即根據獨尊陽具的秩序而定」（《此性非一》89），因此女性需從獨尊陽具的律法所不及的外界加以反攻，打亂再現的秩序並修正，但非取而代之，否則不過是再度陷入父權邏輯之中。因此伊瑞葛來提醒：

假使女人的目標僅止於顛倒事物的秩序，甚至還以為這樣做大有可為，歷史勢將在長此以往之後重演，又回歸到同一性：亦即又回歸到陽具統治。這麼一來，無論是女人的性、女人的想像，甚至連女人的語言也全都沒有（她們的）可容身之處。（39）

伊瑞葛來一再強調她的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套女性成為主體或客體的理論，而是質疑理論架構本身，迫使它放棄自以為可以生產關於女性真理的假設，更重要的是「在論述中反覆／詮釋女性何以會被定義為欠缺、不足，或被貶為主體的仿冒品及其反面的形象，指出就此邏輯而言，在女性這方面，仍然有可能享有**顛覆性的溢出**」（《此性非一》101，原文黑體）。事實上，她拒絕定義所謂「女性及女性特質」，提出女人應該「是」什麼或「成為」什麼；因為此舉無異重蹈男性代替女性發言的覆轍，不過是改變發話者的性別，而未挑戰與改變整個價值系統與發音位置，再度將女性驅入沈默的危境。

然而她的觀點仍引來眾多女性主義者的抨擊，莫（Toril Moi）強烈抨擊伊瑞葛來試圖為女人建立一套關於陰性特質、大膽呈現女人欲望的理論，勢必重蹈同一邏輯的覆轍，她質疑伊瑞葛來「未考慮父權權力的歷史和經濟特殊面，以及父權在意識形態和物質上的矛盾，使得她自己對女人一樣提出她宣稱必須避免的形上定義。……任何企圖定義『女人』的努力註定都會落入本質主義」（179）。

林松燕則認為伊瑞葛來以女性身體和欲望做為性別壓抑的論證基礎，以女人的「身體」做為人類第一勞動力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探討性別差異下對女性的社會剝削。就此意義而言，伊瑞葛來實比馬克思更為「物質主義」的關切社會剝削的物質條件，提供「馬克思主義『階級剝削』理論的後設基礎，補充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前提』」（34）。

蓋洛普⁹ (Jane Gallop) 在《通過身體思考》(*Thanking Through the Body*) 中也指出，伊瑞葛來女性形構學中的身體並非指涉性 (referential) 而是一種比喻性 (figurative)、詩學 (poetic) 的身體，是對女性身體意義與再現的生成和創造。她認為，如果對女性身體的再創造可以脫離陽具形構的邏輯，建構一種非陽具形態的性欲，身體詩學的實踐，將是最有效的政治 (155)。

然而要達成使女性主體在僅承認男性主體的文化中，以其自身特殊性及正面形式現身，建立尊重性別差異的社會秩序此一目的，伊瑞葛來認為關鍵為在象徵域中重新探索母女關係與建立女性系譜。她質疑在精神分析中被壓抑、邊緣化的母女關係：「如果說孩童與母親的前伊底帕斯關係是黑暗大陸，那麼母女關係更是黑暗大陸中的黑暗大陸，社會秩序中最隱晦的區域」(轉引自 Grosz 120)。早自伊底帕斯情結開始，母女的關係即被切斷，女人被迫跟原初的欲望、快感完全斷絕連結，被輸至另一個體制中，從此再也找不到自己(《此性非一》175)。因此「女兒們永遠找不到一個母親的替代物，除非是佔據她的位置，不斷經由吞噬母親、取代母親的位置而成為母親」(Grosz 123)，成為以父的律法與姓名為依歸，男人之間交換經濟的商品，為爭奪男人對自己的依賴和佔有而彼此妒恨與殘殺。

伊瑞葛來強調母女關係的重要，是女人與女人及女人與她自己關係的基礎，此一關係缺乏在宗教、法律、儀式、制度等象徵秩序再現的空間，導致女人與自己之間關係的混亂不安，讓女人往往自動執行自我與彼此間的各種壓迫 (Whitford 79)，也引發精神分析所顯示的種種女性病態：「歇斯底里不就是反映在女人跟母親、跟她自己以及跟其他女人之間的關係嗎？那些女人的最早期欲望，被壓抑為靜默無聲。」(《此性非一》179) 在缺乏語言與再現體系的情況下，女性只能以偽裝或身心症來發出她的聲音。父權體制以陽具為優位能指，藉著閹割情結進入心靈、語言及人倫，建立男性文化與象徵體系，從根源上斷絕女人與母親原初的聯結：

女兒意識到母親已被閹割這件事會使她跟母親的關係更形複雜，因為，

根據佛洛伊德，女兒原本所愛的是有陽具的母親。對小女孩而言，母親的貶值是跟著她自己的性器官的貶值而來。如此一來，（正如佛洛伊德說的）「對她而言，跟（已然喪失的原初）客體之間的關係並不單純，它受制於愛恨並存的衝突。它無法進入意識。」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指出，「潛意識」及其中女兒跟母親和她自己的性器官之間充滿衝突的關係。並沒有任何語言或再現系統可以取代或代理。（*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68）

女人所能獲得唯一的語言就是陽性語言，卻是一種無法表達其想法及特殊感覺的語言，帶給女人極深切的失落感。

根據佛洛伊德及拉岡，女孩從戀母到戀父的過程，以認同被閹母親的性別位置，做為伊底帕斯情結之旅的終點。然而不論是前伊底帕斯期的「陽具母親」（phallic mother）或柔弱無能的「被閹割的母親」（castrated mother），皆代表對象徵秩序的臣服，否定完滿自足女性主體的存在，都沒能為女孩提供女性認同的基礎（Grosz 119）。前者將女人「非性化」，女人是為家庭犧牲的偉大母親，為丈夫兒女而存在，沒有自我主體。後者則將女性陽具化（phallicize），成為陽具般可欲，她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女人化身溫柔美麗的可人兒，必須透過男人的佔有與依賴，才能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也同樣是沒有主體的（周華山 228）。

就伊瑞葛來的觀點，家庭中原應有兩種性別典型讓男孩、女孩分別認同，然而在父權體系中，並不存在所謂女性，孩子見到的不過是一種性別的兩種變體，她/他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兩種性別的差異（Grosz 120）。在父權社會中，父親首先被視作男性，他的成就與榮耀建立在文化的生產、文明的建造上，他的社會位置與性別角色遠重於他在家庭中扮演的父親角色，能有無限寬廣的發展方向。相反的，母親僅僅被當作母親。父權文化單方面以母性功能來定義女人，強調女人作為母親生養兒女的職責，頌揚無私無我的犧牲精神，凸顯母親角色的偉大，卻壓抑她的女性身分與社會屬性（楊鴻雁 7）。將女人等同於母親，對母女雙方都造成嚴重的危害，它「削減了母親作為一個女人的行動能力，同時也意味著對女

兒的放逐」(Grosz 122)。對母親來說，她被剝奪自我定義及自主的權利，做為性欲主體的事實亦被否定。女人只能以生殖能力立足於父系社會，養兒育女是她生命最崇高的目標。母親的角色將永遠限制女人的活動範圍、思維模式和情感反應。即使她有社會角色，亦不過是母性角色的延伸，或考量家庭利益而不得不為的犧牲(楊鴻雁 7)。母親世代代守護父系名字的傳承，身體成為支撐、豎立父系社會的沈默底層，喪失做為女性的形象與機會，嚴重削弱她社會物質與經濟發展的可能，斷絕她的社會位置與女性認同(Grosz 121)。因此，在女兒尋求性別認同的成長過程中，只能在陽具化的全能母親與被閹割的、無力的母親之間進行選擇(120)，她無法在母親身上找到那個作為性欲主體的女人，無法接觸到與母性並列的女性，從而截斷女兒作為女性的潛能(122-23)。

由於父系文化將女人當作父權社會再生產和循環的工具，拒絕承認女人不止是母親也是女性，使女性無法在象徵秩序中佔有一席之地。她能給予子女的只有食物與關愛，身體與精神的滋養，卻無法給他們象徵性的社會地位，諸如語言、法律及交換——陽具(Grosz 121)。母親只能將其愛灌注於兒女身上，不是付出太多就是太少。對女兒來說，此類模式可能繼續規訓女兒，成為另一個缺乏個體性的父權代理人。就如依瑞葛來所說：「假使我們持續一起訴說著同樣的語言，我們不啻就是在複製相同的歷史」(《此性非一》269)，意即母女的傳承要極力避免複製父權體系的價值，以免女兒依循傳統價值與模式，迷失於父權社會所建立的性別迷宮中，找不到認同女性身份的典範，而難以脫逃被化約為子宮的悲慘命運。因此，伊瑞葛來認為女人需要一種語言，讓女人可以在女人之間以女人的身份說話，為女性「他者」提供容身之處(《此性非一》178)；需要在「女人之間創造出一套象徵，使女人可以相愛」(Whitford 81)，通過追溯女性系譜，重新界定女兒跟母親，女兒跟生命之源的聯結與喪失；也就是重寫母女關係，將被深埋在父系文化之下的女性歷史重新帶進象徵體系，使女性認同有所依歸：

將小女孩與她的母親之間的關係象徵化，這允許母親們既是一位母親，同時也是一位女性；因此女性不需要永遠為了她們獨一無二的職責相互

競爭，也能藉此構成她們自己與母親之間的差異，如此一來，女性就不至於被化約到僅存母性功能。(88-9)

在〈當我們的雙唇一起說話〉一文中，伊瑞葛來宣告另一種母女關係，她以「我／你，我們」，母女雙重身分說話，打破母女的二元對立、分離。在此處，「我們」並未「將一個身分吸納或融入另一個身分，而是讓兩者融合，不留剩餘，也不使任何一方受損。她們分享彼此的語言與歡樂」(Grosz 126)。女人之間應該採取一種積極的主體與主體的關係，而不是作為一個男人(父親)與另一個男人(丈夫)交換的客體。為了將母親及女兒自己視為女性，母親必須放棄足以扼殺她成為女人可能性的母性，女兒則必須放棄視母親為全能陽具母親，能滿足兒女所有需求的幻想。因此，除了食物，母親更須以「女性的」(相對於父權話語的)語言滋育女兒，使母女間能彼此傾聽、說話。這個語言的禮物將取代被食物所強加的窒悶與靜寂，獲得食物永遠得不到的回報：女兒將以新發現的能力和母親說話，加倍回報母親(125)。「這種母女關係的轉型意味著女性活力的再煥發，也意味重新發現母女共享的女性認同。這一發現使得女兒／母親能抗拒將她們視為交易客體的父權循環」(124)，開拓一個多元且具性別差異，沒有虧欠、匱乏、罪惡，女人無須放棄自我的存在空間(126)。

古典學者海瑞森(Jane Ellen Harrison)根據大量從歐亞大陸挖掘出的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女神雕像，大膽推測在希臘奧林匹亞男神中心神話系統底下，應存在一層更為原始而古老的女神神話系統。另有學者指出，遠在西元二萬五千年前早已出現女神像；希臘島上早就有女神崇拜儀式與神話流傳，但北方蠻族入侵希臘島後，帶來父權社會崇拜的宙斯(Zeus)，原先的女神神話遭到竄改，被吸納進男神中心神話系統(張小虹 106-07)，銘刻上男權中心思想，逐漸失去原有的樣貌，女神的神話與女性歷史在族群傾軋與信仰消長間，成為襯托男神英雄的背景，塵封於黑暗的地底。伊瑞葛來認為即使神話在傳遞過程已遭改寫，仍存留許多文化根源的遺跡，我們仍能對其重新詮釋(Grosz 163)，從中挖掘潛藏其下的女性欲望與言說方式。

相對於佛洛伊德將焦點放在伊底帕斯神話中的男性，伊瑞葛來則從古希臘神話中尋找失落的女性史前史與女性系譜。她舉希臘神話兩位女神雅典娜(Athena)與珀瑟芬(Persephone)作為女性言說方式的代表；擁有智慧的梅蒂思(Metis)女神經常對天神宙斯提出忠告，使宙斯感到十分厭煩；為了躲避梅蒂思的干涉同時也為佔有她的智慧，便將已懷孕的梅蒂思吞進肚子。有一天，宙斯突然頭痛不已，不得不召來鐵匠劈開頭顱，身披戰甲、手持長矛盾牌，象徵智慧與正義的女神雅典娜從宙斯頭上一躍而出。因此，雅典娜有父無母，僅是父親的女兒，與母親沒有聯繫，正顯示男人對女人生殖力的嫉妒與篡奪，對母親的壓抑與吞噬。雅典娜一出生便全身上下披胄戴甲，隱藏她的女性肉體與女性特質，僅露出冷面無私的理性臉孔，隱藏她的匱缺、肉體、性別，卻使其更具誘惑力。她說父親的語言，為維護理性與父的律法、價值體系而戰，是男性想像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Grosz 163-64)。

與此相對，珀瑟芬則是身陷父權文化中心受男性箝制，但卻母女同心，憑藉母女強烈聯繫回到母親身邊的原型。她是大地女神狄蜜特(Demeter)與宙斯的女兒。宙斯為了保持自身的地位，默許冥神哈得斯(Hades)強擄她至陰間當新娘，成為男人間交易的商品。強烈思念母親的珀瑟芬在地府哀傷哭泣，卻不放棄回到母親身邊的渴望。失去女兒的狄蜜特，憤怒的以史蒂克斯(Styx)河之名詛咒大地，讓萬物停止生長，變成荒蕪之地，除非女兒回到她身邊。最後，冥神不得不同意讓珀瑟芬每年都能從陰間回到大地，僅有冬天一季留在地獄。此時她是一種凍結的存在，從自身被割離，是冰/鏡子、玻璃，也代表父權僅能擄獲部分的女性特質。春天時她回歸大地，與母親在一起讓大地生機盎然五穀豐收。與母親的聯繫及母親的力量，使她能既是母親的女兒又是丈夫的妻子，生存在兩個世界、兩種愛、兩個地方，她從未單獨生存與行動，超越她命定的位置與角色(Grosz 165)。

伊瑞葛來對希臘神話的解讀是隱喻式的，著重這些隱喻在文化深層結構的運作方式或顛覆的潛能，其目的在指出重建前伊底帕斯期緊密的母女關係與重尋女

性系譜，對女性建立自我言說與再現場域的重要性（唐荷 149）。佛洛伊德假設遠古人類社群的形成源於弑殺大父（primal father）。伊瑞葛來援引奧瑞提斯（Orestes）弑母的故事，強調在弑父之前早已存在弑母之舉。為使父親的名與律法佔據人倫關係的中心，主導社會文明的發展，佔有支配女人與兒子的位置，他必須斬斷母子間的臍帶關係，遺忘或否定對母親身體、生命、資源的虧欠：

當伊底帕斯的母親在孩子的成長階段，身體的每個部分被援用又被拋棄時，她不是已經被伊底帕斯的憎恨撕裂成碎片了嗎？當佛洛伊德說到伊底帕斯的父親被原始部落的兒子們支解時，難道佛洛伊德完全否認、忘記她已在兒子與父親之間、在兒子們之間被撕裂了嗎？（轉引自 Grosz 163）

因此，回顧西方的思想史，實為一部男人以構建自我成就，自我創造的意象，替代虧欠母親的歷史（Grosz 120）。然而，女人的存在不應只是父權社會的獻祭品，以母性功能支撐社會的豎立。伊瑞葛來提醒女性思考另一種可能；在遠古時代，女（神）性是以其個體的特殊性而非母親的身分得以高舉：

在歷史中——慣稱為史前——……女人被再現為女神，不僅是母神——這是後人唯一接受的女神——也是女人神。女神很美麗纖瘦……她們的神性並非取決於她們是母親，而是取決於她們女性的身分，正如（代表女神的圖像中的）那半啟的兩片陰唇所顯示的。（*Je, Tu,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110-11）

隨著女性系譜被抹除，遠古女神及女神的預言為父權文化的男神取而代之；不再被再現為女神，令女人被棄於荒野。因為感官知覺的再現是我們譬喻和溝通的基本方法，女人卻失去有互相指名和表達女人之間的憑藉，也就失去女性和女性之間關於「女人」的連結，遺落女性認同的關係之鍊。根據伊瑞葛來的觀點，女性系譜長久以來一直在宗教與民間神話中遭到忽視，特別是母女關係的再現，也被宗教與民間神話排除。她認為：

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瘋狂的欲望，因為這種欲望是極為「黑暗的大

陸」。這種瘋狂的欲望留存在我們文化的陰暗處，它是文化的黑暗時期與煉獄，而男人和女人一樣，都少不了這個欲望。所以，唯一能超越墮胎及避孕這兩極化問題的方法，是否就是避免去追問：在母親與女人——母親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想像與象徵的關係？在女性所擔負的社會角色與重要職務，如子孫的繁殖者、褓母以及勞動力的再製者之外，女性的角色又是什麼？（*The Irigaray Reader* 35）

因此，當艾瑞葛來在托契蘿島（Torcello）看見聖母馬瑪利亞被母親抱在懷中彼此愛戀的雕像，她歡快的說：「這對我產生重大的影響，一種歡欣鼓舞，心理上與身體上的。……瑪利亞和她母親安的雕像，觸動我的身體、情感、作為女人的歷史。在我眼前有了一具美學與倫理的形象，讓我不再輕視自身、母親與其他女人」（*Je, Tu,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25）。她當時所感到的寧靜喜悅與強烈的女性認同感，恰恰說明女性與女性系譜連結的感動與必要性。

綜上所論，以女性視角詮釋研究女神與母權歷史文化，創造女性藝術與文體，調整習俗和典章制度等再創女性歷史文明，建構使兩性文化都能得到表述的文明與社會秩序的工作實刻不容緩（劉毓秀 172），如此方能使女人不再只做父權社會中沈默的基石，而能發揮潛能做個快樂而自信的女性。然而在現今父權社會，期望建立女性系譜與新的語言模式、命名系統，無異於改變社會結構，重整社會秩序與文明，一個近乎不可能卻必要的工作。艾瑞葛來細數社會留予女性的難題：

對女人來說，採取策略罷工，跟男人分開一段時間以便學習如何捍衛她們的欲望，尤其要透過語言，藉以發現其他女人的愛，同時也謝絕男人專橫的揀選，以免讓她們陷入敵對商品的定位之中，互相較勁，並為女人自己打造廣受認可的社會地位，還得讓女人賺取她們自己的生活所需，以免墮入娼妓的處境……假使女人想要逃離在交易市場上淪為普羅化的命運，終將經歷上述各重要階段。（《此性非一》39）

換言之，倘若社會未發生勞動關係與核心家庭模式的重大變革，女人走向自

我發（實）現之旅，將可能永遠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第三章 男性凝視下的女性主體

伊瑞葛來在《此性非一》指出，男性根據他們的最佳利益，將女性拆解。女性要不是被視為沒有自我可言，就是有多重自我，被男性根據自身的需求、欲望來挪用或佔用。女性做為男性的反射鏡，反映出男性的自我與需求；女人忙於迎合他們的慾望，被男性所建構的形象、語詞、幻想、讚美、愛慕及所謂的「愛」癱瘓，而處在迷失狀態，終究迷失了自我（15）。然而這一切究竟是經由怎樣的論述與方法，使女性能如此心甘情願或不自覺的配合演出？女性又依照「他們」的哪些需求被形塑成何種樣貌、處於何種困境？女性主體如何被構建？研究者將在這一章裡探討文本中的女性以何種途徑、受哪些主體論述環繞，演繹女性主體的生成與破碎。

第一節 消失的女性容顏

在「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故事中，皇后最在意魔鏡是否說出她最美麗？為了成為世界上最美麗女人，不惜心狠手辣剷除白雪公主，以免她危及自己的地位。女人如此執著於美麗的原因究竟為何？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觀點看來，母權社會被父權社會取代後，控制生產工具的男性發展出財產觀念，女人成為財產之一，男人開始依他們喜歡的方式及標準來選擇及控制女人。躍升為選擇者的男性，選擇青春、美麗、健康、性感、豐臀的女性作為繁衍後代的對象，淪為被選擇者的女性，只得依男性標準美化自己，等待被揀選；因此，女人會變得愛美並非源於天性，而是女性在兩性競爭中退敗的結果（王溢嘉 189）。

即使在現代社會，許多女性已擁有經濟自主的能力，仍不輕易放棄美貌這項利器。Chapkis 在《美麗的秘密》（暫譯：*Beauty Secrets*）一書中指出，透過美貌，女性可能取得某些機會和認可，或以美貌交換男性所能提供的資源與權勢（95）。

史密斯將女性這種不純然為己，而是相信美貌得以換取資源而為之的裝扮，定義為「追求美貌 / 時尚的情結」(44)。這樣的情結普遍存在文化中，特別是對許多經濟狀況不佳的女性來說，美貌更是麻雀變鳳凰不可或缺的元素。

與史蒂芬離婚後，凱特在書店謀了一份助理的差事，花園谷分店開張後她也擢升為經理，頭銜響亮不少但薪水並沒有增加。她的老闆布萊德利先生總是敷衍的說：「親愛的，咱們試一試，看看你能做到什麼程度」(梅罕 44)。凱特非常用心工作，更去研讀書店經營的課程；一旦業績下滑，就開始想著該不該變換賣場陳列，或者在地方報上刊登一點廣告。一年過去了，他們還杵在試一試、看一看的階段，凱特依然只有一份微薄的新水，而且她的位置隨時都很容易被男性取而代之(298)。再加上傑可與蘿拉的開支不少，史蒂芬卻常常逾期支付生活費，需要律師跟在他後面催繳；微薄的收入經常入不敷出，在在加深凱特經濟上的不安全感。

經濟上的拮据，使得蘿拉家只有「第一個進浴室的才有乾浴巾用」(梅罕 11)，而且負擔不起生病，凱特只得期望「每個人都得健健康康的」(57)。家中連電話費也付不起而被斷訊，「話筒卻一直掛在牆上，像一隻被嚇傻蟲子，蟄伏著等待嚴酷的帳單冬天快點過去，最後還是郵局派了人來把它拆走」(61)。即使家裡的車連著好幾個禮拜都發不動，「電瓶該充電了；搞不好根本就該換個新的」(17)，也因為沒有多餘的錢，只得每天早晨在街頭上演推車發動秀。因此，即使蘿拉非常不願母親結交男朋友分散對兒女的關注，在沈重的經濟壓力下，如果凱特非得交個男朋友，蘿拉「總忍不住希望那個人有錢一點」(83)。

相對於蘿拉家的貧窮，卡里斯利家族「世代居住在城市邊緣的一座農莊，當時整片花園谷河都是他們的」(梅罕 90)，他們家大業大，城裡到處有他們的投資，每隔一陣，家族裡就有人因為產業上的貢獻而受到表揚(196)。雖然後來賣掉原本牧馬放羊的土地，索倫森家還是留存了一片將樹木修剪成各式各樣動物造型的庭園(95)，及一座足以抵擋破城錘的大宅門(117)。當蘿拉進到踏進迴廊，穿過一座大型拱門進入屋內，入眼盡是驚奇，索倫森家中一件件精緻優雅的物

品，說明他們生活的富裕與悠閒，過日子的方式和蘿拉多麼地不相同：

一只雕花箱子，一張精美的的桌子嵌飾著象牙和珍珠做成的花紋；偌大一只花瓶裡插滿各式各樣的花，深紫粉紅的毛地黃，襯著雪白的牆壁，亭亭玉立；雙層玻璃面板上鎮著一口淺淺的碗，裡面盛著乾燥花，碗沿浮雕著寶藍翠綠的蜂鳥。(96)

想到有人能日日坐擁如此美好事物，不必承受經濟的壓力，蘿拉覺得「有一聲嘆息掙扎著想從脣間溢出」(梅罕 98)，她不禁這樣想：「為了財富而愛上囉嗦也許沒什麼不對吧，因為任誰都希望有機會變得優雅又美麗」(97)。

在經濟的壓力之下，無論是蘿拉或凱特都期望能藉由婚姻或結交男朋友，以解決生活的窘境。為了增加對男性的吸引力，在跟克里斯約會前，即使家中的經濟已捉襟見肘，凱特還是特意上「今日美髮沙龍」做頭髮(梅罕 69)，並穿上最好的洋裝，讓她看起來更美麗。由此可知，女性追求美貌的動機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女性將美麗的外貌視為贏得男性目光與讚賞，順利進入婚姻市場使自己成為搶手商品的利器，以成為嫁給王子的灰姑娘，得到穩定的經濟生活。在此心態下，以男性眼光出發，滿足男性需求、慾望為基準的審美觀，自然成為女性樂於遵從的準則，卻也使女性以「男性的凝視(male gaze)當作是自我凝視(self gaze)的角度」(陳玉玲 112)，形成美貌政治，使男性得以掌控女性的身體。

史密斯指出男朋友與社會眼光這兩面鏡子是女性評斷自身的重要依據；男朋友是女性裝扮的主要原因，社會眼光則確立難以達成的美貌標準(43)。諷刺的是，當女性耗費時間與精力以追求美貌時，她可能會被貶成愛慕虛榮；至於不想妝扮的，則可能被說成相貌平凡的女人。無論結果為何，女性照見自身的皆非那面屬於自己的鏡子，而是男性的(44)。

不常打扮自己的蘿拉，曾被同學妮琪這麼批評：「站遠點看，你其實長得還可以，不過近看就完了。造形太單調啦。跟你媽商量，讓你去剪個時髦的髮型，或者前面挑染一撮金色捲髮，做什麼改變都好」(梅罕 11)。當妮琪批評蘿拉不夠美麗，對蘿拉做美醜的評價判斷，鼓勵她對頭髮進行加工改變髮型及髮色，即

是從內在的男性審視者角度進行觀看，妮琪心中的「他」告訴「她」何種外貌對男人來說是美麗的、可以引起注目的，於是女人趨附這個美的標準以贏得男朋友或換取進入婚姻競技場的籌碼。妮琪接受美的標準，認同金髮是美麗的，人為處理過、染過色的頭髮比原來的髮色更美，做什麼改變都會使蘿拉比天生自然的樣子更好。妮琪依循社會「時髦」髮型的角度來審視蘿拉，告訴蘿拉她原來的髮型是單調缺乏魅力的，否定蘿拉本來髮色與髮型的美感。巴特基（Bartky）指出這種美貌／時尚的情結，提供美的單一標準，也讓女性養成持續使用美容用品的習慣，其背後正隱含對女性自然身體的輕視！此一邏輯首先暗示女體的原貌不夠美並有所欠缺，因而必須藉由工業生產的美容用品加以改變增色，以達到完美的狀態（史密斯 44）。又如傑可的保母范恩波納太太，即便結婚十年，也「從來不讓自己鬆懈下來」（梅罕 31）。她那頭引以為傲的美麗棕髮，每星期固定要上花園谷的「今日美髮沙龍」做一次造型，加工染整以跟上流行。藉由美貌吸引男性並進入婚姻的女人，怎能不擔心色衰愛弛？因此內化男性凝視的她，自動將此凝視加諸本身，時時刻刻監視自己的外貌，維持在一種符合時尚的狀態，一種人為加工後美的狀態，才能使自己安心。她的臉一逕維持著精雕細琢過的形象，每天都得精心妝點，才能有信心翩然出現在眾人眼前，因此蘿拉「從來沒見過她不上口紅的模樣，自然也就沒見過她的素顏微笑」（31）。

經由女性之間相互評比女體，在家庭與社會中傳播與形構女體改造技術，產製身體美學的知識與標準，女性身體成為宣揚美體觀念的工具。美麗變成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女人必須努力變成美麗，以女性為主體的女性身體就此消失無形。浸潤在這樣的環境下，蘿拉看著周遭的人們時總先注意到頭髮；她自覺那頭遺傳自「流著波里尼西亞戰士血液」（梅罕 14）曾曾祖父羊毛一般的棕髮，比不上凱特和傑可如陽光般的金髮，看起來閃閃發亮；四年級的卡羅·布萊特「那一頭烏黑柔順又美麗的長髮，時不時就編個新髮型。今天則是紮個馬尾——上過許多小卷子的馬尾，像一股蜿蜒而下的黑絲綢水流，用學校的緞帶繫著，閃亮密實，讓

人忍不住想伸手撥弄一番」(65)，更是叫她嫉妒，不但吸引索倫森的目光還能親近的跟他說話。

對范恩波納太太、凱特與蘿拉、妮琪來說，美貌與愛情之間是緊密關連的。這種美貌情結驅使女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身體外貌上，尋求男性的凝視，將男性做為照見自身的魔鏡卻迷失自己。就如蘿拉所言，索倫森那一雙「狡獪的、披覆著水銀、鏡子一般的眼睛；裡頭藏著深不可測的隧道、階梯和迷宮，一步一步把人帶往陌生的地方」(27-8)。為獲取男性的眼光，蘿拉進行瑣碎的裝扮，卻使女體變成自我眼中的異鄉人：

蘿拉專注的看著鏡子，胡亂想著囉嗦在河堤上看見的自己，究竟是一張什麼樣的臉龐。……最後她決定穿上最好的衣服，說不定晚一點還會碰見囉嗦，反正讓他看見自己穿著得體也沒什麼不好，而且只是一件莎莉穿不下的洋裝罷了。雖然那頭羊毛般的小卷髮不大可能突然變得閃閃動人，她還是梳了又梳，直到它真的有一點點發亮。她穿上最好的一雙涼鞋……畫了眼線又塗睫毛膏，覺得自己看起來像外國影片的女主角。

(199)

蘿拉對著鏡子將自己塗抹妝點，遮掩原有的五官，將「原始事實予以蒙蔽或次級化，並束縛住流動的肉體……讓身體變得完美」(艾莉斯·馬利雍·楊 5-6)，以贏取索倫森的凝視認可，深切隱藏她調整自己，將自然樸實的身體改造成符合男性眼光、標準的過程，正標幟出女性身心世界的異化。雖然她安慰自己不過是穿著得體，但內心卻渴望捕捉索倫森的視線，獲得「他」的讚美，符合「他」心中美麗女孩的形象。由於對自己的外貌沒有信心，蘿拉期望藉著美麗的洋裝及化妝使自己看起來更漂亮，然而與此同時，蘿拉卻覺得自己看起來像個「外國」女人，與自己身體疏離，其實是對自我的否定，無法接納原有的樣貌，失去對自我外貌與身體的認同。

這種以滿足男性需求、慾望為基準的審美觀，藉由傳媒、廣告等工具，操控

日常生活中視覺意象的呈現，充斥在社會環境中。蘿拉家洗髮精瓶上的圖樣就是個極佳的例子：「洗髮精的標示牌上有著『巴黎』的字樣，瓶身上美麗裸身女郎身後就是艾菲爾鐵塔」(梅罕 9)。裸女及背後的艾菲爾鐵塔曾讓她夢想洗淨髮絲後，她非但美得無以復加，而且身在時尚中心巴黎，如同巴黎女子。廣告召喚女性進行「改變」的「自然」過程，幫助女性獲得他人眼中的美麗與自信(李納 208)。女性內化此價值觀後，進而改變自己的外貌，否定自我原來的形貌，不自覺成為自身的壓迫者。

受到家庭或生活周遭女性關於美貌論述與實踐的影響，蘿拉不自覺已用男性眼光凝視自己，使她不論「多麼努力都很難以驚喜的心態看待自己這張臉」(梅罕 10)，自我概念已受扭曲與損傷。她非但不能欣賞自己的面貌，為它感到喜悅，而且缺乏自信的給予自己負面評價，甚至不想看得太清楚(10)。蘿拉更在意這樣的一張臉在索倫森眼中的評價如何，究竟美或不美？能不能吸引他？女性的外貌「受到極大的社會壓力，而信心的來源卻需要男性的肯定」(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230)，女人只有等待男性評估的價值，沒有自身的價值。

陳明珠指出當女性以這種陽具中心的位置觀看、詮釋自身身體時，女性身體已然異化，女性自我看不見自己的身體，只能看見社會文化對女性身體的規範與檢視。換言之，透過鏡像反射出來的並非「她」的身體，而是被父權社會文化規範的身體，鏡像中沒有「她」的存在，只有被規範甚至自我監控的身體。女性端看鏡像，卻如同對「他者」一般來檢視自己(190)。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的方式》(*Way of Seeing*)也對女人內化男性凝視提出的精闢觀點：「男人注視女人。女人看自己被男人注視。這不僅決定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大部分關係，同時也影響了女人與自己的關係。女人內在的審視者是男性：被審視者是女性。她把自己轉變成對象——尤其是視覺的對象：一種景觀」(58)。

當一個女性處在經濟壓力下，卻無法依靠自身的能力解決經濟困境，而把幸福與進入婚姻或倚賴男性劃上等號時，美貌難免被視為提升自我資本的利器。然而此時女性必須承受被觀看與評價的壓力，以男性審視者的角度，接受男性標準

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使女性對原來的身體失去信心，與自己的身體疏離，終使女性身體的主體性喪失，成為被物化與切割成碎片的客體。



第二節 女體的困境

父權社會控制女性身體及心理的諸多方法中，對女性造成最嚴重傷害與影響的莫過於性暴力。畢恆達指出，性暴力無論在國內外，超過九成的性侵害加害者為男性，超過九成的受害者為女性，是男性以性的形勢展現對女性的暴力，因此性暴力其實就是男性暴力，其基礎奠立於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兩性不平等（《空間就是性別》9）。美國在一九九〇制訂的反對女性施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an Act）中即將強暴與性騷擾明訂為「以性別歧視為動機的暴力形式」（羅燦煥 65）及「父權體制中男性權控女性的外顯表徵」（63）。對於男性以性態（sexuality）掌控與宰制女性，始終是女性主義者深切關注的議題。女性主義者指出所有性騷擾行為皆具有強化男性自我及女性她者的功能；男性在性騷擾行為中將女性物化為「她者」及降格為「次者」，以凸顯男性同性之間的認同與凝固（male identity and male-bonding）。藉此，男性將女性排除於主流（男性）社會之外，阻絕女性平等且完整的參與各種社經活動的機會。在因果效應的循環下，男性得以持續鞏固在父權體制中的權力與優勢（85）。

長久以來，不論身處於任何時空背景的女性，或多或少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被男性騷擾的經驗。從較輕微的歧視語言、性騷擾，到最嚴重的身體暴力、強暴，男性藉諸多侮蔑、物化女性的形式，得以在身體及心理上宰制及掌控女人，使得任何年齡的女性在任何時間以及地點，都有可能淪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強暴對女性身心方面經常造成嚴重的永久傷害；在身體方面可能造成各部位短暫或終生的損傷；心理方面則引發情緒性衝擊，包括噁心、夢魘、震驚、絕望等「受暴創傷症候群」。美國人類學家溫格勒（Cathy Winkler）以其自身經驗為例，說明這種受暴創傷：「就像一顆炸彈的引爆，在我平靜獨處時，侵入我的內心，像火山爆發似地，令我不由得尖叫，使我恐懼震顫」（224）。對她而言強暴是社會性謀殺，一種社會死亡經驗，是施暴者從社會層面摧毀女性，使女性「失

去思考能力並且意識不到自我的存在，生命變得像徒具軀殼地毫無意義」(226)。誠如基進女性主義者所言：「人若被剝奪了他（她）自己身體的操控權力，那就如同被剝奪作為人的資格，喪失作為人的屬性」（佟恩 124）。

強暴在大部分狀況下，雖然經常是個別男性對個別女性所犯下的暴行，造成個別女性的傷害，然而經由此種暴行所傳播的恐怖氛圍，強烈的讓所有女性感到恐懼與脅迫，使女性淪為性極權統治下驚惶無助的小動物，視自身為弱者，無法保護自己。強暴所發揮的擴散效應，產生規範及控制之功能，擴及女性全體，因此布朗米勒（Brownmiller）直指「強暴是男性有意識的利用來控制全體女性的利器」（轉引自羅燦煥 85）。

當傑可的病況已發展到醫生束手無策，只能奄奄一息的坐以待斃時，深信傑可是被伯瑞丘吸取生命能量而逐漸耗弱的蘿拉，認為唯有向卡里斯利巫婆家族尋求協助，才能解救陷入絕境的弟弟。因此蘿拉鼓起勇氣克服恐懼，「打算在這危險的夜裡，穿過好幾條街，深入花園谷郊區，去找囉嗦·卡里斯利談一談。他是一位七年級的學長，同時也是個秘密巫婆」（梅罕 89）。雖然她對花園谷郊區相當熟悉，心中卻對必須在夜晚獨自穿過花園谷樹林充滿不安。

蘿拉的焦慮首先來自「兩個月前，有位老太太在自宅遭劫殺，她被人用電線網綁，扔在電視機前面。十天之前，一個平凡笨拙、名叫珍妮絲·寇羅的七年級女生，在花園谷保護區的樹林裡遭人強暴」（梅罕 92），這些就發生在生活周遭的事件，使蘿拉瞭解不分老少、無論美醜；不管是在家中或在鄉野林地，只要是女性都可能遭到性暴力。夜間外出處處充滿危機，如果不是情況危急，她根本不會離家。蘿拉原本以為「珍妮絲的平凡應該是一種優勢，足以讓自己免於這樣殘酷的攻擊。這件事讓蘿拉明白，自己也有可能被盯上。只要在那個時機遇上一個夠兇暴的傢伙，不幸就可能發生，黑暗當然是最佳時機」（93）。即便是在大家眼中並不算美麗的珍妮絲，沒有所謂使人垂涎的美色，也難逃被強暴的凌虐。更悲慘的是女人不僅被視為男人的所有物，可任其隨意宰割使用，受害的女性還得飽受冷嘲熱諷：「學校有人拿這件事開些讓人不自在的玩笑，說什麼強暴犯

也太飢不擇食之類的」(93)，再度貶低受暴女性的價值，身心二次受到凌虐，暴露出男性深度物化、蔑視女人的心理，使蘿拉「真的被這個世界的不公不義給嚇住了」(93)。

因此，當身材曲線越是曼妙，顯示出明顯的女性樣貌時，隨著成長的喜悅逐步增加，蘿拉對強暴的恐懼也漸漸提升：「最近她原本稚氣的身形有了變化，這樣嶄新，甚至有點肆無忌憚的女性曲線，著實令她不大自在」(梅罕 93)，唯恐女性的身形成為獵取的對象。懷著焦慮與不安全感，使得原本應該自在、平常無奇的夜行，蒙上層層詭異的陰影，深怕發生在珍妮絲的厄運降臨到自己身上。即便是一個陌生男人，一個不知道身份、面目、性格，隨處可見的普通男人從街道另一頭走近，都使蘿拉仿若驚弓之鳥，一聽見腳步聲「便轉進一戶人家的前院，躲在停放的轎車後面，等到那個看不清面目的男人走遠了才又出來」(92)。即使「這個重劃區住著許多年輕家庭」，她還是覺得「這兒到了晚上仍舊危險重重」(92)。蘿拉對強暴的深層恐懼，使她必須極力在危機四伏的黑暗中隱藏自己的行蹤，以免成為攻擊的目標，並對所有的男性心存警戒。對蘿拉來說，即使「被一頭火眼金睛的老虎生吃，總比被花園谷重劃區裡的壞蛋毆打強暴來得好」(94)。

蘿拉不確定自己是否被窺視，雖然沒有發現任何男人在觀看她，卻覺得無論在暗處或亮處都無法躲過男性的眼光。暗處可能已躲著藉黑暗掩蓋惡行，等待獵物送上門來的暴徒；亮處則使她暴露於任何一位因看見她肆無忌憚的女性曲線，而心生歹念者的目光之下。蘿拉恐懼來自想像中可能出現的任一男性的目光與傷害，而非某些特定男性，正體現男性凝視與權力的自動化與非個性化。性暴力存在的事實，使任何一個男性都能造成女性夜間外出的恐懼心理效果，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

關於強暴，一種普遍為人接受的論述是將強暴理解為「活躍的男性性慾在面對女性刺激時的一種自然的延伸」(維登 42)。它將男性施暴的原因解讀為雄性生物無可避免的本能，為男性的暴行尋找一個自然而正當的理由，從而將男性應

負的責任推諉給女性。在此觀點下，某些受暴女性被解讀為咎由自取，強調女性被強暴實應歸因於女性未約束自身的高風險行為，如穿著引人遐思、言行不端、夜間獨行或出入不正當場所而引致。也就是說男性的強暴行為被視為自然的本能且不易改變，因此，在預防強暴事件發生時，女性應擔負大部分的義務與責任。

蘿拉歷經「行走在門外大街上，那種叫人背脊發涼的焦慮感」（梅罕 94）後，進到卡里斯利家的老房子，所有的家族成員對於蘿拉竟於夜晚獨自來訪感到驚訝。初次在學校以外與蘿拉見面的索倫森·卡里斯利，其實並不太瞭解蘿拉家庭的狀況，在探詢蘿拉唐突前來的原因時：

他突然停了下來。「你怎麼來的？」

「當然是走路啊！」蘿拉答道。

「你是想自討苦吃，是吧？」他問：「也不想想珍妮絲·寇羅的遭遇。」

「我是想過，但是，」她說：「那種事又不是經常發生。」

「真叫你碰上，一次就夠瞧了」。（107）

在索倫森的觀點中，蘿拉夜間外出是「自討苦吃」、陷自己於危險、極為不智的行為，倘若遇上暴徒而被傷害是咎由自取。換言之，索倫森僅從單方面考量，認為女性應負擔起使自己免於強暴的義務與責任，並未譴責或懲罰施暴的惡徒。然而從上述對話可以看出無論是索倫森或蘿拉，都認同女人夜間獨行是不合宜的行為。蘿拉對夜行的辯駁與焦慮正呼應傅科的權力觀點，權力不僅是壓制，更重要的是權力能生產被宰制者的自動同意與服從。

畢恆達在〈性別與空間〉中指出女性對公共空間的焦慮與威脅感，經常來自一些細微而具體的行為。從輕微的語言層面如言語挑釁、冷嘲熱諷，到性騷擾與性暴力直接侵犯身體，都規範了女人的活動。他人凝視與自我審視同時監督女性是否具有「正當合宜」的行為舉止，凡是不符合刻板印象中好女人行為者，就可能遭受上述種種控制手段圍攻。這種刻板印象不獨為男人所擁有，也經常是女人監督女人的來源。女人內化性別規範下所謂合宜行為舉止的標準，在女人心中造就自我審視和檢查的機制，與外界的監督一起約制自己的言行（46）。

出於呵護與關愛，擔心蘿拉安全的索倫森替她做了決定，氣呼呼的要騎車載蘿拉回去（梅罕 109）。索倫森的外婆溫特也同樣擔心蘿拉的安危，吩咐索倫森「不能讓蘿拉一個人穿過大街小巷走回家」（110）。而蘿拉在經過這段驚恐歷程，又聽到索倫森的冷嘲熱諷及溫特的關懷，也深感夜間外出是自己的錯，欣然接受索倫森的提議，在她「累得要命，而且月亮已經深深倒臥在西北風雲的被褥裡」時；「她真高興有人載她回家」（115），不必再一次體驗那種恐怖氛圍，而能在一個男性的保護下平安回家。

畢恆達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不斷存在壞男人找機會騷擾、攻擊女人的情況時，自然就讓好男人理所當然的得到挺身而出保護女人的理由。壞男人使得女人不得不依賴好男人的幫助，間接讓好男人得到控制、規範女人行為舉止的最佳藉口。而一般男人控制女性與譴責女性受害者的態度，更助長壞男人去侵害女人的風氣（《空間就是性別》152）。換言之，縱容壞男人、譴責受害女性，使好男人與壞男人之間形成共謀關係，讓性別暴力成為女性揮之不去的陰影。女性必須以依賴男性或犧牲自由來換取安全，讓男性能以保護為名行監控與宰制之實，限制女性活動的能力與空間，使女人成為仰賴英雄保護的小紅帽，無法自由自在迎向外在世界。誠如羅燦煥所言，「性別暴力造成全體女性成高度的受害恐懼焦慮，而產生規範與控制全體女性的效果，間接剝奪女性享用各種資源與完整參與世界的機會，更利於男性的連結，鞏固全體男性的權力與優勢地位」（65）。女人可能遭受強暴的恐懼變成幽閉、限制她運用公共空間的機會；更殘酷的是，女人留在私領域心裡也不見得踏實：「這世界終歸是殘酷的，蘿拉心想，搞不好暴徒就藏在溫馨住家的窗簾後面」（梅罕 94），在暴力的陰影下，天地雖大卻處處充滿危機。

蘿拉一方面害怕被強暴，因而是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則接受父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女性應負起使自身言行免於引起男性欲望的義務，符合父權利益的觀點，從而成為父權意識形態的共謀者與行動者。這兩種情形皆是父權意識形態運作下產生的論述結果，女性這種游離在雙重主體位置之間的現象，即為女性主義者所指：存在於父權社會裡的女性所勢必產生的「雙重視野」

(double vision) 或是「分裂的意識」(bifurcated consciousness) (林芳玫《女性與媒體再現》135)，讓女性主體淪入無能與無力自主的地位，被迫進入私領域，依賴男性以尋求安全感，淪入「人盯人的個別化父權」¹⁰關係，在婚姻中從屬於特定男性，使女性繼續成為滿足單一男性欲望的工具，成為自身從屬處境的推動者，喪失對自身身體與性的自主權與決策權，從而維護了父權社會的價值觀與男性利益，也再生產並正當化佔主宰地位的男性與女性形式 (維登 42)。

女性除可能在社會或公領域遭逢性暴力的威脅，在私領域及親密關係中更易受到性別權力關係的箝制，這與兩性對性別主體的認同有極大的關聯。在《文化理論詞彙》一書中，布魯克 (Peter Brooker) 指出主體是在「語言或文本性或論述實踐裡建構，或者以其他說法，是被國族、性別、種族、族群、身體和性慾特質的控制性結構和意識形態塑造，而非僅由階級或心靈 (psyche) 所塑造」(369)。個人主體建構受既有的社會關係影響，性別化的主體亦為性別權力關係左右，性話語也成為建構性別主體認同的資源。羅曼史做為一種廣泛流傳的性話語，提供特定的性別主體位置，假定了兩性所具有的規範，並且依據這些規範試圖構成我們的兩性特質，界定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應有的行為、心理與情感的滿足模式 (維登 121)。史密斯關於羅曼史的研究指出，在父權意識的運作機制下，羅曼史不斷透過浪漫愛、性與美貌的符碼運作，建構出女性特質。羅曼史往往將男人與女人的性加以二元劃分，強化男性是主動積極且富侵略性，而女性的情慾是被動、消極的對立概念。因此男性往往扮演性 / 情慾的主動帶領者或需索者；女性則扮演接受、回應者的角色，使女性的從屬位置得以持續 (鍾佩怡 17-8)。因此羅曼史不但提供了女性情欲認同的資訊，也形構兩性互動的權力模式，創造了男性心中理想的女人世界。

為了掩飾陰柔的一面，也為了與養母維持聯繫，羅曼史意外成為索倫森學習做為一個男性主體的腳本：「我知道它們實在寫得不怎麼樣，但它們會如此受歡迎，一定是內容有什麼讓女人難以抗拒吧。就像貓薄荷之於貓。如果我能參得透，抓住那一點竅門，那麼我也會使人難以抗拒」(梅罕 325)。對索倫森來說，

羅曼史能廣受女性歡迎具有重要指標意義，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書中所描寫的兩性互動模式是受女性肯定甚至喜愛的，使他相信裡頭有值得學習的愛情與約會知識。羅曼史深深影響索倫森的性意識、性活動的模式與認同，他接受與內化其中的父權意識，對裡面隱含的性別偏見習而不察，進而複製不平等的兩性權力關係，成為「老式男人」，腦中滿是「十足男性沙文主義的想法」(141)。

在閱讀/認同羅曼史形構性別的過程中，索倫將自身鑲嵌在陽剛、支配的主體位置，吸收男人主動、侵略、優秀，而女人為被動、柔弱、較低劣客體的性意識。蘿拉及其他女孩則成為他男性認同與性實踐的操演場域，確立陽剛特質的物質基礎。索倫森一再藉由重複操演語言、肢體接觸、凝視等行為，展演父權文化支配式男子氣概與性話語，具體感受自身男性的存在，形構自身的性/別主體認同。如同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所言：

藉由重複風格化的身體行為、姿勢和運動，性別效應被以一種「社會暫時性」(social temporality) 的方式創造出來。我們並非依照我們的性別認同，而有特定的行為方式；我們其實藉由維持性別規範的行為模式，來達到這些認同。這種重複過程，是一種「對一套已經由社會建立的意識的即刻重演與再體驗；而且這種過程，是這些意義獲得正當性的世俗化與儀式化的形式」。(轉引自史帕哥 65)

與蘿拉第一次近距離相處時，索倫森的目光即落在蘿拉的腿上，當著米倫的面大膽稱讚她有雙性感美腿，使蘿拉心中駭異不已；他還聲稱比母親更懂得所謂「性感」這些事 (梅罕 102)，暗示他已頗有經驗。隔日索倫森到蘿拉家探望傑可，一得知凱特正好出門只有姊弟倆在家，索倫森即以言語戲弄蘿拉，表現他的霸權氣概：「我們先去看看那孩子吧，順便表演個脫衣舞讓你七年級的級長欣賞欣賞」(129)；除此之外，更多次凝視蘿拉的胸部直接展露他的欲望：「蘿拉於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卻發現囉唆的眼光不在自己臉上，而是落在隨著呼吸起伏的胸口。他嘆息著迎視她的目光，笑容裡混雜著不以為然和討好的意味」(134)；即便在蘿拉踏上變身之旅的危險當口，擔任守門人指引她上路的索倫

森，把披荊斬棘用的劍交給她時也不改本色，注意力還是放在蘿拉的胸脯：「蘿拉覺得他的視線停在自己胸口，於是用手遮蓋著」（226），甚至還加了一句「最後再親我一下」（226），完全主控兩人的情欲互動模式，蘿拉則被動的回應。

當蘿拉確定要暫住索倫森家時，索倫森更變本加厲展現他的強勢與掌控權：

「現在你可歸我管了！」囉嗦愉悅的說：「你等著發抖吧！」

「有什麼大不了！」蘿拉答道：「我在學校的時候早就習慣了。」

「是嗎，」囉嗦說道：「看來我得玩點新花樣了，是不是？等一回到家，我馬上去翻閱我那些羅曼史。《愛上翡麗芭》裡面可能有些不錯的點子。要不然，《偷歡時刻》也可以」。（138-39）

索倫森套用羅曼史中的兩性互動模式，操弄語言以形構男性支配的統治位置，以充滿暗示意味的性談話，貶抑蘿拉為柔弱受其宰制或需要援助的客體，除了強調他的男性主控地位也證明自己的霸權陽剛特質。在「來吧，灰姑娘，讓萬人迷王子來為你戴上。親愛的，你這顆腦袋之小下恐怕是世界之最了」（115）這句話中，明顯表達索倫森如何看待及想像他與蘿拉的關係，以及羅曼史裡兩性特質、性別角色、男尊女卑的話語如何暗暗影響他，並助長了性別歧視的傳播。

蘿拉對索倫森總想把她嚇得發抖的沙文想法感到厭煩，但此時她並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直到索倫森轉換話題才鬆了一口氣（梅罕 139）。然而索倫森卻更進一步以肢體上的接觸，具體感受自身男性的存在：「他看著她，笑容絲毫不減，卻伸出左手搭在她的胸部上。蘿拉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半脅迫式的撫觸更得寸進尺起來」（155）。他對蘿拉坦承滿腦子只想跟她上床：「我對你是有些遐想，錢特，看著你在學校操場裡晃蕩……蒼鷺一樣的女孩，瘦巴巴的頗有點骨感，不過體態挺美的」（189），他與其他女孩的交往，也以完成單一目標導向的性行為來確證自身為陽剛主體。

在兩人最初的親密關係互動中，蘿拉對女性情欲是抱持著一種被動、等待的保守認知。因此，她看到凱特絲毫不掩飾對克里斯的情感，主動積極示愛的舉動，蘿拉替母親感到臉紅（梅罕 82）；而她自己雖然渴望親吻，但只在索倫森採取

主動攻勢時準備回應（155），對索倫森專橫且壓迫感十足的氣焰，毫無招架之力。蘿拉並未將自己定位為情欲主體，直到自身的性覺醒才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索倫森房間的牆上有一張裸女海報上，那裸女「似乎是在獨自赤著身子，陷入冥想的時候被人拍照，……反正這是一張特意為男人拍攝的照片」（103-04）。他在海報上釘了一張蘿拉的快照；是索倫森假裝聚焦拍學校圖書館，實則拍她的結果：「照片裡是她本人——因為放大的關係，畫面有點糊掉——好像是選定某張照片的背景並加以定格放大，卻受限本身的條件，無法清晰顯影」（梅罕 153）。蘿拉面目模糊的照片與清晰裸女疊置的意象，相當深刻的隱喻了蘿拉（女人）在索倫森（男人）心中所顯現的圖像，及女性在父權社會淪為男性欲望客體的困境；圖書館收錄所有（男）人類文化成果，可視為文明的象徵，蘿拉做為圖書館的背景，正如女人做為父權文化的背景，只有一張模糊的面目，她的真貌從不是焦點，女人生理的條件成了她的限制，使她無法清晰再現。對父權社會 / 男人來說，清晰可見、重要的是如裸女海報所傳達出的「特意為男人存在的女體」。

第三節 母職的枷鎖

維登在析論主體性與語言的關係時指出，話語對主體的形塑力量不但決定我們如何思考與感受，提供我們存在與行為的方式、心理與情感的滿足模式，也影響我們對特定主體位置的認同：

當我們習得語言之時，同時也學習聲音、意義所給與我們的經驗，並依據思考的特定方式、依據那在我們進入語言之前便存在的特定話語，來理解我們的經驗。這些思考方式構成了我們的意識，而我們由以認同的位置則結構了我們對自身的感知、我們的主體性。(39)

早在女性呱呱墜地之前，便已存在廣為大眾所接受的關於母親的主流話語，框架兩性對母親這個角色的認知。然而，當女性進入「母親」這個主體位置時，所依據的並不是依照女人真實的為母經驗及感受所發展出來的話語，而是從父權體系的角度，基於男性的需求、利益，依他們對母親的想像與定義方式所產生的母職論述，來理解及經驗母職。因此，父權社會所建構出的母職神話，總是頌揚母親犧牲奉獻、無我無慾的精神。在《性意識史》中傅科曾指出，從十八世紀開始，在權力與知識相互滲透勾結下，關於女性身體的論述早將女體連結至家庭及子女，使女性成為背負生養及教育後代，讓整個家庭基本功能得以運作，教養的功能得以彰顯的重要角色（89）。在權力與話語緊密的結合下，母職話語形塑了女性的主體，使女性認同做為母親應當一手滿足孩子的所有需求，關心兒女身心和情感的發展，並以做為一個母親而感到無比滿足（維登 40）。

母職話語以家庭為根基，藉由社會文化與社會實踐，再經母女間的傳承複製，使女兒從「父系」的角度思考母親與她自己，影響女性對家庭、兒女及自身的情感與意識。女性不僅從懂事開始即不斷從母親處接收關於母職的話語，也內化普遍存在社會對母親的審視目光，成為評斷自己的標準。扮演「好母親」的壓力，不斷經由母女間的複製，或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社區的父權之眼、監視中心，

父權文化的代理人來貫徹父的意志，在彼此之間執行對女性的壓迫，文本中的范恩波納太太可謂典型的代表。

「你們兩個一定不好過吧，」她又說了，「媽媽每個星期四都得值班，不過呢，我個人覺得這樣比較好。城裡有不少星期五值班的傢伙，收了工就到這附近打轉，惹出多少麻煩來。對了，等你媽下班，你倆恐怕餓壞了吧。」她就是會這樣話中有話的批評凱特把家務丟給蘿拉。(梅罕 33)

凱特一方面進入職場工作，一方面卻仍在家中專司母職，成為兩頭燒的蠟燭，但是社會對於她的母職檢驗與標準依然如同對全職母親一般嚴苛，並未因她的獨力負荷經濟與親職而稍有減少。即使范恩波納太太再明白不過身為單親媽媽的凱特，是因為經濟壓力不得不值班，仍經常旁敲側擊探問凱特晚上是否在家，拐彎抹角的指責凱特在危險的夜晚讓孩子們獨自留在家中，安全堪虞，沒有盡到保護兒女的責任；也批評凱特沒能及時準備營養的食物，使他們得餓著肚子，或是給孩子吃太多油膩的東西。在范恩波納太太眼中，凱特無法給予兒女基本的照料，滿足他們食物與安全的需求，即有失母親的職責。

事實上，凱特從未怠忽職守，一直努力扮演著「好」母親的角色。除了承受來自社會與女人間檢視母親盡責與否的眼光，她的心中永恆存在一把度量母親的尺，即便在她面臨恐懼時，這把尺也如影隨形，影響她的情緒與思維。當凱特驚訝的發現「傑可躺在那裡，兩條腿猛蹬，把床震得嘎嘎作響。他兩眼翻白，身體弓縮，繃得死緊，然後一下字癱軟，跟著又蜷成一團。有一滴血突然從他鼻孔裡順著臉頰滑落，身體裡好像有什麼被扭著撐著，生命的汁液硬是被擠出來」(梅罕 119)，驚恐慌亂的聯絡完醫生，處理好醫療事務後，她心中首先考慮的竟是傑可的睡衣！「有沒有商店是星期六早上營業的？他至少得有一套新睡衣。這時候想到這種事未免有點瘋狂，但他的衣服不是太小就是洗了。我不想讓他看起來一副乏人照顧的樣子」(124)。

即使身為職業婦女的凱特已盡其可能在家庭中無微不至照顧兒女的身心狀況，但若不能在外表上看起來也得到妥善照料，依然難逃失職之罪名，未必能符

合社會上好母親的標準。因此「他們家一向把錢花在打點個人門面上，重視外出服甚於家居服。傑可當然不是沒人照顧的孩子，但他的睡衣還真是破舊」（梅罕 125）。從「好」母親的標準看來，破舊的睡衣無疑是母親沒有妥善照顧孩子的鐵證，因此即使覺得在這種令人憂慮的時刻，待在家中陪伴傑可最為恰當；即使睡衣或新或破到頭來沒什麼差別，傑可說不定是穿醫院的袍子，為了可能存在的批判眼光，凱特還是決定在心慌意亂的情況下出去一趟，為傑可買一套新睡衣，以杜眾人悠悠之口。「我看，花十五分鐘趕到那裡，用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幫他買東西，然後再花個十五分鐘回家。一個小時就這麼分配。其實我最好待在家裡別亂跑。這時候真希望你年紀夠大，能開車出去」（124）。

一個內心焦急萬分的母親立即考慮到孩子的門面，為一件對病情無關緊要的睡衣感到憂慮，甚至花上一小時的時間去買睡衣，似乎令人不解。這個乍看之下極為瘋狂而突兀的想法，恰恰顯現單身母親的辛酸，及母職對女性在心理上的壓迫。與其說是在意傑可是否乏人照顧，不如說是考慮到她做為母親的社會形象，因為在母職上的失責，彷彿宣告她人生最大的挫敗，扣上最嚴重的罪名，即使她在其他角色上有再大的成就，也不足以彌補母職上的失敗。自古以來，女人被圈囿在生兒育女的範圍裡，不論是在社會、父母或兒女的眼中，她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角色就是母親，此一功能也成為左右她思維模式與行動的準則，同時制約她的自我發展與情感。最可悲的是，女人接受好母親的論述，內化父權社會好母親的標準，自動執行對自我的監督，使自身幾乎被「好母親」的大帽子所窒息。

在傑可的病情尚未嚴重之前，凱特早已興沖沖的計畫要跟情人克里斯一起去聽音樂會。她好久沒有約會了，想要好好欣賞一場演奏，沈醉在美妙的音樂裡。為此，凱特特意去做了頭髮，換上最好的洋裝。然而傑可的狀況確實讓她掛心，雖然醫生認為他休息一晚就會好些，但她「此刻真是進退兩難，猶豫極了。她好想去聽音樂會，但她也想帶傑可去看醫生，留在家裡照顧他，但她已經答應跟克里斯·荷利約會了，即使他們才一起吃過中飯」（梅罕 71）。到了最後一刻，凱特改變主意不去了。因為傑可生病，就算自己赴約，也會因為心裡牽掛傑可，而

沒辦法盡情欣賞，更重要的是凱特一直想著蘿拉不滿的情緒（75）。傑可的病況、蘿拉的態度，影響凱特從母親角色的向度思考，孩子們需要母親，希望她留在家中，最終她決定放棄使自己喘息的機會，改變心意留在家裡。

在這裡我們明顯的看出兒童的需要與女性欲望衝突時，女性因母職與傳統情感，傾向滿足兒童的需求，而壓抑自身的欲望。在母性與女性，兒女與自己的拉鋸中，她選擇犧牲自己，將家庭、兒女擺在最重要的位置，她的欲望理應擺在最後，隨時準備為了家庭成員放棄，成為無關緊要的。在母性天成的理想神話，認定成為母親即能從兒女身上得到滿足，即使疲累也沒有怨言、樂在其中；母親的生理結構使她對子女的重要性無可取代，因此旁人無法分擔母職，母親也不能片刻離開崗位。芮曲認為母職做為一種體制，期望女人在任何時刻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母親，而不容許摻雜一絲一毫的女性自我，帶給女人精神上強烈的壓力。母親對自己於母職上的倦怠、痛苦等真實母職經驗充滿罪惡感，認為是個人而非社會結構的問題，使女性就此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被母職制度「隔離在自己的身體和心之外」（〈憤怒與溫柔〉150）。

由於父母離異的關係，家中只有凱特、蘿拉及年僅三歲的傑可三人，蘿拉從小就必須承擔母職的工作，幫助母親照顧幼小的弟弟，在成長過程中耳濡目染，認同母親及女性為照顧者的角色。就在每日替代母親照顧傑可，為他料理晚餐，陪他遊戲，讀床邊故事，哄他入眠的過程中，心中已然與傑可建立起如母子般深切的情感。兩人之間緊密的聯繫，在傑可看到蘿拉來接他的瞬間一表無遺：

與其說用跑的，不如說他像橡皮人一樣彈跳著穿過草皮，愉悅的朝她衝來。他一把撲上來抱著她，咆哮著作勢要咬她。然後他抬頭望著她，嘻嘻哈哈笑開了。蘿拉覺得喉嚨一緊，一陣鼻酸直沖上兩眼之間，她得閉上眼睛才能不讓眼淚往下掉。這是愛的襲擊，她知道該怎麼應付……

只要閉上雙眼，把淚水往肚子裡嚥，直到它化成了血。（梅罕 32）

對蘿拉來說，她和傑可親密的情感早已使她在心理上成為一個母親：「有時候她幾乎覺得傑可不是兄弟而是自己的孩子，一個她未來將會擁有的孩子，既已出世

成長，卻又尚未呱呱落地」(32)。從家庭日常生活實踐中，蘿拉學習到成為一個母親所應當具備的觀念與行為——負責照料弟弟的衣、食、住、行，滿足他各方面的需求，即使自己的需求對她而言十分重要，也得擱置一旁；做為母親／女性，犧牲自己的需求以滿足家中成員的慾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在父親因外遇而離開家庭的那個週末，蘿拉曾事先得到內心超自然的警告，一種讓她有所準備，好堅強面對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聲音。這種警告幾年後又在「巫婆」索倫森·卡里斯利轉學到學校的那天出現。警告的次數雖然不多卻靈驗得很，出現之後總會接著發生教人永生難忘的事件，因此蘿拉對此相當警覺。當她再次聽見來自內心的聲音告訴她：「就快發生了」(梅罕 12)，立刻覺得不對勁，恐怕出門會有危險，所以想待在家中老老實實的避難，要母親幫她請假。聽見此事，凱特以不可置信的語調大叫「你瘋啦，蘿拉！星期四是我最需要你幫忙的一天。我今天值晚班，誰去接傑可回家，幫他料理晚餐，讀床邊故事？星期四不准請假，就這樣，沒得商量」(15)。在代理母職照顧家中幼子這個無法逃避的重責大任下，即使她直覺感到危險逼近，也不能堅持自己的想法考慮自身，必須以弟弟為優先考量。因此，蘿拉一放學就懷著憂慮，「小心翼翼的走著，提防著哪輛車會突然失控衝上人行道，追撞求救無門的路人」(31)，到保母家接傑可。對於自己真實而古怪的感受，她只能逆來順受，直到恐懼感漸漸消失，一切恢復正常步調。做為一個「母親／女兒」，相較於傑可／兒子，她的感受與需求也跟凱特一樣顯得無關緊要，僅能被否定或淡化處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蘿拉的好朋友妮琪一直想替她和帥哥貝利·漢彌頓配對，力邀蘿拉放學後一起去約會。蘿拉雖然喜歡貝利，對約會的提議也頗心動，但由於那天凱特值晚班，也沒有其他人能幫忙，蘿拉很清楚凱特不可能在那一天放行，她必須做所有母親該做的工作，操持家務及照看弟弟，無論如何都「沒空追求未來的幸福」(梅罕 30)，只能憑空想像和貝利約會的滋味，收起約會的念頭。若將弟弟與自己放在天平上，弟弟永遠是較具份量的一方，蘿拉總是願意為傑可犧牲，犧牲她的時間、金錢、感受、慾望，甚至她的生命。

當蘿拉觀察到傑可的生命力已逐漸被伯瑞丘吸乾耗盡：

傑可一動不動的躺著，呼吸微弱得幾乎察覺不到。他的金髮失去光澤，嘴唇就像工藝課捏陶用的陶土，灰白黯淡。他的樣子就像水果盆裡殘留的一枚蘋果，乾癟枯黃。他的皮膚起了細細的皺紋，彷彿逐漸變得鬆垮，掛在身上都有點嫌大，而血肉之軀正一點一點的萎縮。她從來沒見過有人這麼死氣沈沈，生之意願隱藏在緊閉的眼皮底下，看不見的細繩密密縫逢，那雙眼睛似乎再也無法睜開。(梅罕 126)

索倫森又告訴她傑可在這種被附身、精力不斷遭消耗，撐不了多久就會死，蘿拉決定賭上她的人生——變身為女巫之後將阻隔她「和原來世界的關聯」(168)，事後也不能再變回來——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變身為一個女巫，換取解救傑可的一線生機。

對於傑可的狀況，蘿拉與凱特的理解不同，採取的反應與行動也不相同。能敏銳感受超自然力量的蘿拉本能的知道，傑可是被伯瑞丘邪惡的印記所傷害，那印記「已經深入肌膚裡，簡直成了一朵刺青——像是一種寄生圖案，直往骨肉深處鑽，一路鑽啊鑽，把自己餵得飽飽的」(梅罕 53)，加上傑可又與平常精力充沛的樣子截然不同，蘿拉非常希望母親能在身邊分擔照顧傑可的責任。因此當莎莉帶來凱特的口信說會晚一點回家時，蘿拉「憂心忡忡，對凱特的遲歸有些耿耿於懷」(54)。所以即使莎莉邀請蘿拉到她家看電視時勸說：「就算傑可醒了哭鬧起來，反正一鄰之隔，多半也聽得見」(54)，蘿拉仍以傑可為重，一點兒也不想去，毫無掙扎的決定留在家中陪伴他。

對於蘿拉所說傑可的病是伯瑞丘造成的，凱特認為造成根本是無稽之談，她更相信醫生的看法，傑可的「問題不會太嚴重，好好睡上一覺應該有幫助」(梅罕 72)。大為安心的凱特，決定維持原訂與克里斯約會的計畫。在憂慮傑可的心態下，蘿拉無法諒解凱特在這種時候離開他們，冷眼看著凱特安排各種事宜好跟克里斯去聽音樂會，即使她的理由聽起來十分正當：

我是在知道傑可身體不舒服之前就安排約會的，況且醫生也說沒什麼大

問題；而且你在家啊，莎莉的媽媽就在隔壁，我會把市政堂的電話留下來——反正電話簿裡也找得到——還有，如果克里斯預定了座位，我也會把座次號碼留給你。有什麼緊急狀況，我在二十分鐘之內就能趕回來。(74)

雖然平時凱特也常因值班而離家，但對蘿拉而言，凱特上班晚歸是為了家庭經濟，是為了姐弟倆而不得不在母親角色上所做的犧牲，她很能體諒，可以接受母親暫時的缺席，心甘情願的接手家務。同樣是不在家，蘿拉就難以接受凱特為了男人，為她自己而離開。也就是說凱特的活動範圍及行動，只有在母親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蘿拉的認可。

從母親處承繼「好母親」角色的蘿拉，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願意為傑可犧牲奉獻，也反過來用同樣的標準要求凱特，期望她全心全意作個母親，以兒女為滿足。蘿拉操弄凱特身為母親對兒女的責任及情感，將生病的傑可做為束縛母親的枷鎖：「『但是你看看傑可！』蘿拉一把將弟弟往前推，對自己聲音裡某種程度的勝利意味感到不安，卻又樂得在這場私密難解的競技裡，把傑可的困境當成籌碼。反正本來也沒什麼規則可言」(梅罕 70)，期望以此方法將凱特留在家中，扮演全心全意樂於為子女犧牲的稱職母親，放棄做為一位女人的欲望。蘿拉對母親的不諒解，表面上看來是由於她敏銳的察覺到傑可狀況特殊，實際上則體現出芮曲所說的，父權社會對「母親」這個角色的期望與迷思：

首先，一個「天生」的母親是一個沒有其他身分的人，很可以滿足於整天和小孩相處、依他們的步調而活；其次，母子在家中與世隔絕的狀態是理所當然的；母愛是、而且應該是，名符其實的無私無我；母子分別是造成彼此受苦的「原因」。(〈憤怒與溫柔〉135)

一言以蔽之，母親的社會價值和存在意義，在於她如何體現「母性」；她的行動能力，除了照顧家庭、兒女之外，找不到其他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展現形式。然而正是在這種母職話語的浸潤下，女人全神貫注於家庭與兒女的需求，陷入永無止盡的疲累，母親的角色全面吞噬她的私我空間，個人時間、空間、情緒

遭到幽禁與剝奪，人性的需求備受壓抑。

原本在母親全心的照顧下，母女感情相當融洽，蘿拉對凱特有著深切的戀母情懷。在蘿拉眼中，母親就是美麗的化身，蘿拉「欣賞她那副不讓鬚眉的模樣。即便是在推車，她還是有辦法讓自己看起來既優雅又漂亮，一頭金髮閃閃發亮，笑逐顏開，自得其樂」（梅罕 17）。蘿拉記得多年前父母還相愛時，凱特的眼睛是如何迷迷濛濛盈著笑意，爸爸又是「怎麼瞅著身披藍色睡袍的凱特，擁她入懷，撥弄著她的一頭金髮」，讓蘿拉以為母親能使「所有的爭執都有快樂的結局，一切都會沒事」（121）。父親離家後，晚上和凱特一起做功課，母女獨處的甜蜜成為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時光。在她心中母親是個美麗又善良的人，她很難相信爸爸會想和另一個比較年輕，但不像凱特那麼好的人生活（45）。

然而美好的母女關係，卻從母親愛戀克里斯開始逐漸出現裂痕。對蘿拉來說，這個臉色陰沈沈，前面頭髮有點禿，後面留得頗長的圖書館員，不僅分享了他們最愛吃的炸魚薯條，也偷走了母親陪伴他們的時間和對他們全然的愛，奪取他們在母親心中的地位。平時凱特不會為了姊弟倆而離開工作崗位，也從來不提早打烊，「就算整座購物中心已經沒人在逛了也一樣，她擔心萬一布莱德利先生來電，卻發現她提早走了」（梅罕 54）。但是為了和克里斯約會，她不惜溜班，甚至透支也要到「今日髮廊」做頭髮，讓蘿拉十分不以為然。

蘿拉敏銳的觀察到，在克里斯·荷利面前，母親和平日極為不同。同樣在辛勤的工作後，凱特一反平常下班後回家當一位「母親」的疲憊，在克里斯面前煥發出一位「女人」的特殊光彩，呈現一種迥異於母親的神態：

蘿拉盯著她，跟以往例行值班後的模樣比起來，她未免太輕鬆太有活力了，看起來還有點淘氣。她沒有一把踢掉鞋子，癱進椅子裡，也沒有兩手枕在桌子上，大吃炸魚薯條。她以一種餐廳侍者介紹本日特餐的姿態，拆開索柏魚店用來包炸魚薯條的報紙。（梅罕 55）

這種特殊光彩使蘿拉倍感壓力。當克里斯·荷利問蘿拉是否介意他來吃晚餐時，嘴裡回答不會的蘿拉，心裡其實介意得要命，因為她回想起從前母親心有旁騖的

不愉快經驗：

爸爸剛離家的那段時間，凱特跟好幾位男士約會過，去年家裡氣氛之所以那麼和樂，有一部份原因就是她沒再跟人約會，而且似乎相當安於把時間花在蘿拉和傑可身上。想到要和一個陌生人分享他們的「炸魚薯條之夜」，蘿拉就滿心的不樂意……。(57)

克里斯這個掠奪者，改變了母親，奪走了母親全然的關愛。母親越是在意他，蘿拉就越憎惡克里斯，「一股恨意在她心中熊熊燃燒起來。那是因為她察覺到這個人與凱特之間存在一種情誼，它或許來得突然，也有些衝撞，但它似乎宣告著：『凱特、蘿拉和傑可相依相存的快樂時光已經結束，從此不復可見』」（梅罕79）。蘿拉覺得母親和她的距離，隨著凱特與克里斯的親密而愈來愈遠。母親陶醉在與克里斯的兩人世界，不再那麼關注她。當她藉故說去莎莉家看一會兒電視，而實際上是到卡里斯利巫婆家尋求協助時，離開的時間比她原來告訴凱特的要長很多，「但他們似乎沒有發現……。或者，他們根本心有旁騖，想著其他事情……她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段時間裡，他們一點也不曾掛念她」（117）。這種被母親排除在外的感覺，在蘿拉看到克里斯和凱特一起將傑可送往醫院，而自己被母親託付給索倫森時更為強烈：「克里斯、凱特和傑可看起來真像一家人。對於克里斯居然能跟著去醫院，而自己卻被留下來，不禁讓她感到一種被孤立的憤怒（138），母親對克里斯這個外人的重視與信賴勝過自己，讓蘿拉更感到覺得母女間的裂縫日益增長。

對母親的不滿與痛心，在傑可住院的隔日清晨達到頂點。借住卡里斯利家的蘿拉回家後，詫異的發現克里斯的車停在門口，更叫她驚訝的是克里斯竟然穿著凱特的長袍，光著腳丫子出來拿牛奶！這證明昨晚凱特並非如原先所言留在醫院陪傑可，而是在家中與克里斯共度良宵。對蘿拉來說，這顯示克里斯在凱特心中的份量遠超過自己，也代表母親將自身的情欲擺在兒女之前，徹底棄守母親的本份，是她無法原諒的背叛。她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翻身爬上索倫森的偉士牌機車立即離去（175），象徵與母親徹底的決裂。

母親乃具有自主性的欲望主體此一事實，在父權社會的利益考量之下，藉由母親神話的建構，被掩藏於黑暗之中。在《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裡，伍華德(Kathryn Woodward)直指西方母職論述中所隱含關於母親的矛盾本質：「理想的母親既是一位母親又是一位處女，也就是說，這樣母親被理想化地形容成無性慾的(asexual)人。人們對於聖母瑪莉亞的崇拜，斷言了母職應該是未被性慾特質(sexuality)所玷污的，所以，母親們不應該與性行為有關」(455)。聖母/理想母親所隱含的矛盾，正洩露父權社會對母親具有情欲的恐懼，顯現男性為自身利益而壓抑女性的深層欲望，唯恐女性忘了她犧牲的美德，動搖他由以建築成就與幸福的基石。

在蘿拉心中，「母親的情欲」始終是破壞家庭幸福的原因，是違反「自然」而不該存在的欲望，母親應該如同聖母般無我無慾。「母性必須與她的性、她的欲望分離。她不能在其母職中擁有性欲望，因為若是如此，這就是一種需要、一種希求，而如果她有所希求或並非無私，就無法全然地給出」(楊 150)。蘿拉認同的母親，實為遵從父的律法——符合菲勒斯中心主義期望與規範的陽具母親。因此她總是從母性功能來評斷凱特，至於母親所具有的女性角色，一個有自主性的欲望主體，從未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現身，成為她女性認同的對象。

然而，將凱特化約為母親，對母女雙方都是種嚴重的傷害。「對母親來說，這限制了她的自我認同及擁有自主權的可能性，意味著她臣屬於父親的律法及父之名，放棄對自身是女性和性欲主體的認同」(Groze 121)。蘿拉在以菲勒斯為基礎建立的象徵秩序內尋求認同時，只能認同母性卻無法觸及「母性/女性」中的女性，也斷絕自身成為女性的潛能，使母女皆只能作母親，不能作女性。

誠如伊瑞葛來言，母親如果繼續將父權價值複製到女兒身上，母女傳承同樣的信念，將使女兒僅認同母親身分而無法認同女性身分，女兒的個體性將同樣遭到抹煞，使女兒繼續走上父權代理人之路，否定她成為獨立自主女性的基本權利(《此性非一》269)。在《變身》中，凱特不自覺已將父權價值複製給蘿拉，教

育蘿拉成為一位母親，要求她承擔母親的角色與責任，從事做為母親應有的行為，甚至為家庭犧牲的思想。凱特輕忽女兒的需求，規訓她的時間及情感，讓她以傑可為重，心甘情願犧牲自己的欲望、時間，將蘿拉的個體性吸納至母性中，成為另一位父權代言人，反過來以同樣的話語壓制凱特，要求凱特放棄性愛身分，使母女皆成為無法獨立自主的女人。

就此一角度來看，母女兩人似乎都無力對抗伯瑞丘與性別角色規範。不同的是，蘿拉敏銳的察覺她們慣處、堅守的母親、客體位置對於挽救傑可、對抗壓迫全然派不上用場，開始試圖徹底改變現狀。早在文本一開始，即預告她的覺醒與看穿女性鏡像虛假的潛能：

有些細微的轉變比大幅的變化更令人警覺。如果有人問蘿拉怎麼知道鏡中人影不是她自己，她也說不上來。那頭髮分明是她的，眼睛也是，而那兩排黑沈沈的睫毛更是她引以為傲的。即使如此，鏡子裡卻分明不是她的臉，因為那張臉知道一些事情，她卻一無所知。它不知道從什麼神秘的地方冒出來，活靈活現的回盯著蘿拉，神情顯得既恐懼又愉悅。(梅道罕 13)

顯而易見的，鏡中所反映的並非蘿拉的女性自我。雖然眼睛、頭髮、睫毛真實實都屬於蘿拉，卻「分明不是她的臉」，而是一張為「愉悅」與「誘惑」男性而存在的臉。這張依男性系統需求量身打造的臉，是女性在漫長的歲月裡被「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一些「女性」事情的男性，藉著自然與科學之名，創造出各種型塑與定義女性的話語，再經由社會機構、社會實踐，精心捏塑以滿足父權社會的臉。男人縝密的從生物學、心理學等科學角度來研究分析女人，權威十足的告訴女人關於她的責任及秘密：她的天職是母親，她樂於犧牲自己以照顧好每一個家庭成員；她的任務是裝扮自己成為嫵媚的性感可人兒以取悅男性；在社會上行走時，男性期望她是守護自身貞節、避免引起其他男性慾望，需要被英雄保護的小紅帽；但她面對個別男性慾望時，她得配合男性欲望演出被動的睡美人；她被告知擁有如黑暗大陸般的特質……。男人對她的秘密瞭如指掌，而僅能使用陽

性語言思考，從未能根據自身的需求與情感來陳述自己，也沒能在歷史留下隻言片語的女人，當然對於自身的本來面目「一無所知」！因為「女人的身體向來不屬於女人自己的，它像是一件潛力無窮的寶物，由資本主義市場、父系父權家庭、國家這三大體系將它的潛能開發出來、依據各自特定的目的加以運用」（林芳玫《權力與美麗》134）。女人的心靈與情感同樣也不屬於女人自己，家庭與男人的需要挪用了她自我的空間，使她的心理活動被束縛在母性的範圍。

圈禁在陽性理體中心體制下的女性，長久以來做為滿足男性各種欲望的存在，支撐他們的靈魂、幻想，反映男性自我的曼妙鏡子，從未按照自身形體與需求來定義自己，又怎能奢望她從平面鏡中清晰看見「女性的」臉，獲知屬於她的秘密？對於女人配合男性的想像與欲望，扮演各種矛盾衝突的角色，終陷入與自身身體疏離、認不清自己的悲慘境況，伊瑞葛來一針見血的說道：「我們已脫離自己：我們即將變成傳遞話語的機器，或說話的機器」（《此性非一》269）。

如果說女性主體位置限制女人了解自己和解讀社會經驗的可能性，女性又如何可能從既有的位置出走？女人挑戰主流話語意義與權力的可行之法又在哪裡？維登指出在不同主體位置與個人利益間的矛盾，終將激發對主體位置的抵抗（133），發展出新的論述、建構新的主體。在下一章中，研究者將探究文本中的女性，如何重構關於女/母性的論述，以脫出父權定義的囹圄，再造自主的女性新主體？改變的契機究竟何在？改變後的女性又呈現怎樣的新面貌？締造何種新的兩性及母女關係？

第四章 女性主體的重建

伊瑞葛來認為「女性」是父權社會話語霸權下的產物；女性在象徵秩序裡沒有詮釋自身的發言權，所謂性感尤物、溫柔美人、偉大母親、賢妻良母、惡毒女巫，皆是男性恐懼 / 欲望的投射（周華山 228）；接受父權論述主體位置的女性，被囚禁在封閉的空間之中，無法以真面目行動、生活（《此性非一》278）。因此，女人必須發明屬於自己身體的語言，訴說女人的故事，母女之間「學著跟彼此說話，以便我們從遙不可及之地互相擁抱」（282）。換言之，女人必須改變思想，從陽性思考轉換到女性想像，說出自身真正的感受與需求，重回母女 / 女女相愛的心靈結構，才能有機會以創新的角度構想自己，產製新論述創造新主體；而母親 / 女兒則是推動改變之輪的關鍵角色。

第一節 她們的故事

芮曲認為那些具有創造性的、獨立、自信且掌控自我生育權的女人，最有能力創造出外於父權統攝世界的女性新疆土（張佩珍 36），因此她提出「勇敢做母親」（*courageous mothering*）的主張。芮曲與伊瑞葛來同樣認為唯有透過母女、女人與女人之間充滿愛的聯結，堅定的表達母女之間的愛與肯定彼此，才能停止女人在荒野上的流浪；唯有母親期望自己是富想像力、勇敢的，才可能打開女兒的沈重腳鐐。只有當母親堅定的站出來拒做父權體系的犧牲品，掙脫社會對女人的萬般鉗制，爭取自己的主體性，提供女兒一種勇敢的典範，女兒才能在母親的前導下得到解放（*Of Woman Born* 246）。

米倫·卡里斯利就是芮曲所謂的勇敢母親，她述說了另一種截然不同於男性版本的女性 / 母性故事，標幟出女性獨特個體性與多元社會位置的可能，顯示女

性所蘊含的強大潛力。

卡里斯利女巫在現代社會的境遇，一如遠古女神時代沒落後的女性，在父權取代母權後逐漸喪失原本生存的環境，被逼至歷史、城市的邊緣。她們世代居住在城市邊緣的一座大農莊，擁有整片花園谷，那是個有著森林、河流與平原的世界，女巫們遠離人群悠然生活其中，與自然融為一體，她們是「月亮的女兒」(梅罕 142)，一種行事不合乎父權社會情理的女人。在世人眼底「她們有一股瘋狂的特質，自成一格」(24)，她們做母親的能力遭到懷疑：「無法想像這兩個人能帶大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24)；因為他們沒看到想看的——看見女人盡母親的責任，料理家務、照顧兒子，因此給兩個將視線移向家庭之外，魂不守「舍」、不務「正業」的女人的評價為「溫特是越老越瘋狂，米倫成天晃蕩，沒事瞧著天空看，一副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模樣」(24-5)。對米倫與溫特的貶抑，正反映出父系社會對父權無法掌控的那些女人：不願成為男人稱頌的家中天使，拒絕臣服於男性編派位置，而堅持自身自主權、勇於實現夢想的女人，最深沈的恐懼。

巴斯托 (Anne Llewellyn Barstow) 對中古世紀獵殺女巫的研究數據指出，被指控且遭極刑的女巫，極大比例要不是擁有令男人瞠呼其後的特殊才能，就是堅持自身的主體性，期望獨立自主的女人。在醫療資訊缺乏、民智未開的年代，當時的許多人們相信某些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一個好女巫 (這些有魔力的女巫也常被稱為女智者) 能施展或正或邪的魔法，她能用符咒或藥劑使人健康，也能用詛咒傷害人或動物 (42)。這些女智者多從事產婆、占卜、心理諮商、草藥採集者等工作。相較於男人，她們對與性相關的事物瞭解更多，能運用從母親及其他女性代代相傳的技能，協助其他女性控制生育力，如懷孕、促進胎兒健康，也能「用符咒或藥劑為人治療、接生、墮胎、預卜未來、給失戀的人提供建議、詛咒、消除詛咒、為鄰居排解紛爭」(161)。她們在社群中擔任身體與心靈的治療師，工作範圍涵蓋生理與心理，魔法及醫療等範圍，許多窮人仰賴她們的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困境。由於擔任產婆的女性擁有豐富的生活智慧，也懂得醫學知識，擅長調製草藥協助產婦調養身體，對生育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又比神職人員早一

步接觸到新生兒，更易被懷疑藉機以惡魔之名為嬰孩施洗，因而成為教會的假想敵，慘遭宗教法庭的迫害（166-67）。

巴斯托指出另一種易被指控的女人是寡婦，特別是富裕、無成年繼承人的寡婦更易成為指控的目標，因為她雖富有卻沒有男性可以保護她。寡婦試圖自己管理經濟，又不隸屬某個特定男性，明顯違反父權體制的秩序；若能成功指控其為女巫，更能佔有她的財產，使得這種女性極易成為攻擊標的（151-55）。

由於女巫魔法的雙刃性，加上人們對女性性慾特質的恐懼，她們的處境隨著教會與國家機器的力量逐漸介入人民生活而雪上加霜（巴斯托 186）。米歇萊（Jules Michelet）認為女巫們對自然、肉體與醫學方面知識瞭解之深與廣，可謂「現代科學之母」（轉引自薛爾曼 127），但非常不幸且危險的是女巫的工作與教士職責多所重疊，使教會將女巫視為眼中釘，女巫在自然科學及醫學上的卓越表現，竟成為她們受迫害的源由。這些受到指控的女巫，實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中「遭受教會迫害而奮起反抗的婦女原型」（127），是女性抵抗象徵秩序的宰制而遭到懲罰與壓迫的象徵（維登 84）。

承襲女巫的反抗精神，米倫不僅不婚生子，而且富有、通靈，精通草藥、心靈及帶領女性覺醒重生的各項知識，父權社會最欲掌控的女性身體、欲望、母職，完全操控在她的自由意志選擇範圍內，成為蘿拉勇於追尋自我的典範。長久以來，這個特別的女巫族人都是一舉得女，從來沒聽說生兒子的。母女間的聯繫十分緊密，母親總能與腹中的女嬰交換夢境，傳承屬於女性的力量。溫特的丈夫是她們家族的異類，雖然不是法力高強的魔法師，也不是巫師，但卻是天生敏銳易感的「月之男」。不過他的幾個兄弟都是城裡的生意人，事業做得很大卻沒有這類特質。女巫們深愛農莊，但隨著工業發展，農莊土地漸被蠶食鯨吞，城市大軍從鄉間小路逐步逼近，靜謐的日子岌岌可危，美好的生活眼見不保。憶起從前的幸福，溫特嘆息道：「我們還用石頭造了一座水壩，大夥在裡頭裸泳。有時候想到這輩子再也不能和水如此親近，真是教人感傷——哪裡還找得到隱密的場所啊。當然啦，我們隨時都可以施展魔法，但這種事在過去是那樣輕而易舉」（梅

罕 143)。

卡里斯利家族的其他男人並不在乎農莊，對它沒有太多的感情，他們在城裡累積財富，到處都有投資。米倫的父親過世後，雖然米倫和溫特仍生活在農莊，但叔叔伯父們逼著她賣掉（梅罕 149）。在父權社會，男性向來是財產理所當然的繼承者，無論女巫們再怎麼珍愛這塊土地，期望保留農莊的意願也未必能得到男人的尊重，更不可能倚靠男人捍衛。有了這般的覺悟，米倫與溫特都認為應該不擇手段，挽回她們的山谷，所以決定結合三代女性觀照的力量，營造一股錐形凝聚力，讓整座城市對她們的存在視而不見以保護農莊（143）。這種情境極難營造，想要維持就更不容易，她們需要第三個巫婆，因為她們「一旦三人成組，就能發揮最大戰力」（145）。為達此目的，米倫決定在此時成為母親，生下第三個巫婆。如此一來，溫特將是老字輩，米倫為中生代母親，她的女兒則代表新生代的純潔處女。期望藉由女性神秘力量的傳承，老中青三代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團結起來，堅持同樣的理想，捍衛屬於女性的烏托邦，力拒家族中男性的強大壓力，抵抗城市發展對農莊的威脅。

米倫並未依循父權社會傳統價值與慣例，期望生下男性繼承人來遏止叔伯的逼迫，而是根據女巫傳統，以為自己一旦懷孕，肯定會生個女兒。米倫完全掌控自己的生育權，主動挑選不知名的男性，「她刻意如此安排，連自己都永遠不必得知」（梅罕 181）。以此方式斷絕孩子與父親的關聯，排除任何產出「父之女」的可能，生下純粹屬於母親的繼承人。如同嘲諷男性將女性視為「兩隻腳的子宮」，男性對米倫而言亦不過是提供精子、協助她生產母系繼承者，成為對抗父權宰制的工具，完全蔑視父權社會對於保持父親血統及再生產男人的重要性。懷孕期間，米倫將肚子裡的寶寶當成女生一樣，和她說話，答應要留給她整座山谷（145）。顯而易見的，米倫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女巫力量，以保衛女性的理想社會與生活方式才成為母親，與父權思維下「母性天成」、「做母親是女人的天職」等男性建立的論述完全背道而馳。

從上所述很清楚的看到米倫為完成自身理想，以父權社會所不齒與不容的方

式——不婚生子——成為母親。她未遵照男性設定的版本演出社會期望中的女性角色，主動揀選男性而非被動的等待；她沒有成為某位男性的妻子，不在婚姻體制內成為母親，而養出私生子。米倫是個獨立自由的女性，將自身的個體性置於母親的角色之上，是身體、欲望的主人，種種離經叛道的行徑，使她成為男人眼中十足的「壞胚子」（梅罕 182），社會嗤之以鼻的異類。

凡此種種早已超乎蘿拉的想像，更讓她感到衝擊的或許是當索倫森誕生，他的性別出乎意料不是她們期望的女性時，卡里斯利巫婆們竟都不想要他！因為女兒方能擁有與母親、外婆三代共同凝聚守護的力量，而兒子卻將「形同末路」，完全顛覆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根據女巫家族傳統，男孩「不可能」成為巫婆，自然無法協助她們，甚至可能如同那些叔伯一般將農莊賣掉。米倫說：

我不是賢妻良母型的女人，當我想到自己的兒子，我只覺得受到束縛。看著他長大成人卻終將形同末路（當時我是這麼認為），這對我要保護家園、對抗軍隊，一點幫助也沒有。城市大軍步步逼近，併吞了蔬果市場……我受不了這個。於是決定找人收養索倫森。（梅罕 147）

伊瑞葛來曾批判父權論述將女性吸納進母性，輕忽母親的女性個體性，使她失去社會位置與性愛身分（sexual being）。在這樣的體制下，女人唯一的價值與出路就是成為母親，她的存在僅能依附在兒女身上，因此哺育兒女的能力是她唯一被認可的能力。她無法給予孩子語言、法律、陽具，只能給食物與愛（Grosz 121）。然而米倫卻堅持保有她的個體性，做為母親僅是她維持獨特生活方式。即使孩子已然出生，看著他並無法升起心中「天生」的母愛，也激不起為他放棄理想的熱情。當索倫森無法協助她捍衛家園時，米倫毫不猶疑的拒絕當母親，她並不認為當個賢妻良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反而是種束縛；父權社會向來重視的哺育能力，在她眼中也沒能成為值得奮力爭取的神聖光環。對當時的她來說，能夠留下一片自然的淨土，比做母親更有意義。

重視自己個體性，不願被母性收編的米倫雖然不想照顧、哺餵索倫森，但仍然愛著他，慎重考慮索倫森的未來，希望他能得到妥善照料過著幸福快樂的日

子。在索倫森僅一個月大的時候，米倫為他找了一個寄養家庭，讓另一個喜歡哺育嬰兒的女人做他的母親：

那幾乎是個故事書裡才會存在的家庭……有個賢慧的母親，家裡的瓶罐裡裝滿了手工自製的糕餅，一個和善值得信賴的父親，還有四個兄弟……就是那種星期天早上會結伴上教堂的家庭，然後下午一家子開車出去野餐。他們喜歡小孩——只是不想再生了——於是決定領養一個。

（梅罕 147-48）

這是米倫考慮自身與孩子的最佳利益，試圖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讓母子「兩邊都得到最好的安排」（147）。因為她瞭解自己不願受母職的綑綁，明白她不可能成為為兒子犧牲奉獻的良母，勉強為之將使母子雙方陷於痛苦深淵；她認為一個具有「賢慧的母親、和善值得信賴的父親」又喜歡孩子的家庭，可以把撫育索倫森的工作做得比她更好，更能確保孩子的幸福。不親自撫養索倫森不代表她不愛孩子，她關心索倫森：「我希望能隨時看見他。我就是這麼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我也沒打算掩飾……我的確不想照顧他，但我仍舊希望能不時聽到他的消息，最好還能掌控他的一切」（147）。她認為「藝術和學習是這個世界賦予我們的最深沈的慰藉」（148），因此告訴收養索倫森的家庭，她屬意他「上哪一所學校，並且要求他們鼓勵他看書聽音樂」（148），並承諾絕不直接與他聯絡。米倫選擇以此特殊的方式做為一個母親來關心與愛護索倫森，遠遠的看著他成長，其實兼顧母子雙方的需要。然而這樣的安排在父權社會眼中，米倫無疑是個自私寡愛的壞母親。

米倫也顛覆母親僅能以食物滋養下一代而不能給予他們語言的傳統。她沒看出索倫森是她期待擁有的孩子，因而不願親自撫育索倫森，卻看出蘿拉的敏感特質而餵她蕃茄、鹽與麵包（梅罕 115），讓她如同吃下冥府食物的泊瑟芬，埋下必定會再度回到農莊的契機，開啟她回復自然本性的大門。米倫為蘿拉講述的女巫故事，更傳承迥異於父權價值的母權歷史，一段尊崇女性能力、地位與思維方式的黃金時期，將被埋沒在父系歷史下的女人歷史重新帶進象徵秩序，接續女性

／女巫系譜的空白。「早在最簡單的社會成型之前就有巫婆了，那時候人們餐風宿露，月亮底下倒頭就睡。月光悄悄溜進了他們沈睡的思緒，架構他們的夢境」（219）。藉由女巫系譜的傳承，改寫母親臣服於象徵世界的故事，從而叛離父權秩序，還給女兒屬於她的女性身分，協助蘿拉超越象徵秩序進入女性想像之域，解開所有的父權束縛，引導她得到另一種超乎象徵秩序的語言、法律，獲得不同於男性、不受陽性理體系統認同卻強大無比的女性力量，不但釋放了自己，同時也釋放了凱特與索倫森。至於索倫森，米倫更不惜一切引導索倫森重拾人性，並教導關於他想像界的一切，成為協助他人變身為巫婆時不可或缺的守門員。

由於米倫的家境不錯，經濟上的豐裕成為獨立自主的堅強後盾；她選擇每六個月一期資助寄養家庭，付出比照顧索倫森所需更豐厚的金錢，甚至在他們情況最不好的時候足以解決他們的困難。不幸的，天不從人願，由於索倫森從血裡帶來的巫婆／陰柔特質，讓他能游走虛實兩界，而其他人不能。就好像他身邊的事物都附著另一片形貌，除他之外沒有人看得出來，也不知道該拿它們如何是好。他可以讓花樹盛開，讓包心菜茁長，讓雨雲飄走，也能找回一切失物，什麼書拿起來就能讀。「事實上這並不是巫術，或者這些從來都是巫人幻術也說不定」（梅罕 180）。然而對照家中四兄弟的正常、陽剛，索倫森陰柔的超自然體質所散發的陰性氣質，使寄養家庭很不自在、甚至反感。特別是在哥哥們相繼離家後，養父又因失業怨憤無處可洩，經濟壓力加上對索倫森陰性特質的偏見，他成了養父酗酒後的出氣桶。最後，養父甚至給他一頓前所未有的好打，又將他推進地下室，關在一座小壁櫥裡，只能坐著，連站直都沒有空間（182-84）。最終，索倫森逃出壁櫥，倚靠與母親的緊密聯結，「在他必須出走的時候，他便來到珍雅·塞利，就好像蜘蛛順著肉眼看不見的細絲，慢慢退回自己的網」（149）。

即使索倫森的童年因養父的暴力相向而蒙上重重陰影，索倫森仍肯定米倫送他到寄養家庭的抉擇：「她這麼做是對的。後來沒能善了，也不是她的錯」（梅罕 179）。索倫森無疑有個疼愛他的好養母，即使離開多年，他依然非常想念她，常常希望能夠再見到她。離開養母的這三年，索倫森經常閱讀羅曼史，只因為以前

養母每星期總要讀個一兩本，以此方式與她保持關聯（325）。

雖有一個這樣愛他的母親，全心全意的將時間精力用於教養兒女，仍無法讓索倫森過著幸福的生活。由於父親把失敗的怒氣發洩在索倫森身上，索倫森身心深受創、人性岌岌可危，最後如同一輛千瘡百孔的車，「看起來挺聰明，卻不是很能替人著想」（梅罕 150）。索倫森所受的傷害讓米倫深感內疚，決定捨棄一切帶著他遠行療傷。

「這樣一個故事終究還是造成影響」（梅罕 188），米倫與索倫森的生命敘事帶來關於母性的強烈衝擊，建立蘿拉對母親的不同認知：女性能夠自主決定自己為何、如何及何時成為母親；也讓蘿拉瞭解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當母親，母親亦不見得願為兒女無止境的犧牲奉獻；換言之，「母性非天性」；母親並非決定兒女幸福的唯一因素，照顧兒女亦非女性不可取代的天職，女人除了母親還有其他想扮演的角色，徹底改寫蘿拉心中根深蒂固的母職論述，重修破裂的母女關係。蘿拉的憤怒情緒轉化、幾乎消失，再加上蘿拉本身「性的覺醒」，她終能從自身同時是欲望著索倫森的「女人」也是關愛「傑可」的母親的狀態，領悟母親也是女人，存有情欲的事實，拋棄父權想像的禁錮，而以女人的身份、女人的想像來理解女人、與女人說話，打破原有的傳承，母女間不再以同樣的語言說話，複製同樣被宰制的歷史。她開始能從女性而非男性、母性的角度理解凱特：

在一種奇怪微妙的轉變下，蘿拉發現自己終於再次渴望親近凱特，似乎在幾近自辱的提出獻身之後，她反而得以瞭解母親的想法，或者說能夠體會她的心情。她一下子覺得輕鬆多了，怯怯笑著任由囉嗦將她一把拉起來。她覺得自在多了，不再任由憤怒折磨啃噬。（190）

蘿拉從米倫捍衛家園、對母職的掙扎與索倫森被虐的生命故事，終於明白影響兒女幸福、對兒女有責任的，除了母親之外還有其他的人與因素。與其說索倫森的不幸源自米倫有失母職，不如說經濟壓力與父親的失職使索倫森成為替罪羊。蘿拉同時更瞭解女人做為一個母親所要背負的沈重心理負擔；即便是特立獨行，不受世俗規範的女巫成了母親，也或多或少在「一切似乎很順利」（梅罕 148）

的時候，「一天裡總有那麼一會兒，我對自己所作所為是否合情理感到懷疑」（148），更在多年後得知索倫森遭到養父虐待，為自己當初的抉擇感到內疚不已。女人一生的情感、行動與思維方式，如何強烈受到身為母親的主體位置影響，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女性的欲望在父權社會定義的「合宜」規範下，被框限在繁衍父系接班人，同時以頌揚母親的無欲無我，建構母親以家庭兒女為滿足的母職神話，及譴責其他動機性行為的兩面手法壓抑女性的欲望。但實際上，女性的情欲與需求無法完全收編進做母親的滿足感之內。凱特對留宿克里斯的辯護清楚揭開母職無法填補的缺憾：

我那麼做並不是不關心傑可，實在是連心都揪起來了。我覺得好慌好怕，我需要一點慰藉，需要逃離這一切。……你一直是我的慰藉，但你永遠不可能成為我想逃避時投奔的對象，因為我對你有責任，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得保護你、照顧你。（梅罕 193）

凱特不僅說出女人在母親這個位置上身心所承受的沉重負擔，更坦然走下母親聖潔無欲的神壇，呈現她的主動積極，即使這麼做會讓蘿拉難過，她也要捍衛女性情欲的正當性，因為她並不引以為恥或悔不當初：

有的時候，為了你和傑可，我不得不打起精神負起為人母的責任，扮演好『我』的角色。有的時候呢，人們做愛是為了想在扮演自己這件事上頭得到休息。在那片刻之間，他們什麼也不必是，那才真的叫做放鬆。這就是我所謂的逃避。長久以來我都很盡本分，不曾鬆懈，而我也喜歡這樣，我喜歡有你和傑可在身邊，我甚至喜歡這份工作呢，雖然我老是抱怨一大堆。但我還會想要逃避。昨天晚上克里斯沒開口——是我要他來的。（194）

凱特意識到母親與女人主體性之間的矛盾，引發不同選擇的契機，使主體性產生變動，進而調整原有的主體位置，宣告自己要成為兼具母性與女性的個體，既是母親又是情欲自主不受壓抑的女性；在勇敢母親情欲自主宣言下，蘿拉終於

接觸與接納消失在父權話語下的真實，與母性並存的女性，開始能以女人的身分愛女人，欣然接納母親身心的自主，成為母親的支持者，認同母親同時也是女人／性欲主體。

女性的生涯被凝固在父權家庭體系中的母親角色。母親這個角色表面上看似偉大，常被父權文化加以頌揚，然而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完全奠基在她能生育男性後代，使其成為父系傳承接班人的特定基礎之上（林芳玫《權力與美麗》136）。換言之，女人成為一個母親的動機與穩固她在男性心中的地位有極大的關聯。凱特對蘿拉坦承：「我懷傑可只是想說不定這麼一來，你爸爸就會留下來——那時他已經和茱莉亞鬧婚外情，而我知道他這次是玩真的，所以我就懷了傑可！為了想綁住某個人而讓自己懷孕，真是差勁的理由，是不是？」（梅罕 197）。米倫與凱特生下兒子的理由都非基於母性、愛孩子的父權理想說法，而是根據女人自身的利益，也漸漸瓦解蘿拉對母親角色僅存的幻想。緊接著，凱特又讓蘿拉知道她憂慮自己有一天不再以母親的身分被需要，而需獨自承受失去生活重心的孤寂。因此，凱特盤算自己的未來，也設想彼此的獨立與幸福：「我能遇上克里斯這樣的人，跟他交往，你應該感到高興才對。有一天你會離開我，自己過日子，如果我……如果我不是孤零零一個人，你也會輕鬆許多」（199）。

在女人的生命史中，母親其實是一短暫的身分，但女性被等同為母性的結果導致女人僅能以母親的角色生存。表面上看來，母親的功能是滿足孩子的需求，為兒女所依賴。但是，當孩子長大不再需要母親的照顧，或試圖擺脫與母親之間令人窒息的親密關係時，母親會絕望地意識到，其實是她依賴照顧孩子來獲取自己存在價值。因此，母親角色一旦遭到拒斥，而她早已被否定或壓制的女性角色既陌生又遙遠，她將無法重新自我定位，深深陷入無助、空虛的絕望感中（楊鴻雁 8）。

米倫與凱特的故事充滿勇於自主的氣息，她們打破傳統不願當父權律法底下噤聲的女人，從被囑咐沈默的社會、情欲的主體位置說出自身的感受，建立倒置性的女性／母性新論述，要求做為（女）人應有的權利，顛覆父權思維，重新詮

釋女人此一空洞能指的新義。伊瑞葛來理想中的女性系譜特別強調超乎母職的女性部分，當母親能傳承女兒超乎母職的社會與欲望主體，女兒才能認同她的女性主體（劉亮雅 165）；在兩個珍視女性社會性位置及女性欲望正當性，叛離父權秩序的母親引導下：凱特捍衛她超乎母職的女性欲望，與米倫做為女巫協助其他女性成長、超乎母職的社會身分，終使長久以來收編在「母性」下的「女性」浮出黑暗地表，讓蘿拉以女性看女性的方式理解母親，理解女性的情欲與母性並存不悖，提供蘿拉勇敢做女性的典範，孕育蘿拉的想像力與對抗父權的勇氣，也掙脫令母女彼此窒息的糾葛關係。



第二節 女性意識的覺醒

伊瑞葛來認為放棄前伊底帕斯期對母親原初同性之愛的女兒，將永遠地漂出母性世界在象徵域中流浪：「女性若無法恢復她與愛的對象最原初的關係，以保留早期對母親的愛慾依附，那麼女性注定永遠從自身之中流放」（轉引自林松燕 31）；一旦回復母女融合卻獨立的關係，女兒將能重新定位自己，跳脫男人交換商品的宿命，尋回被壓抑的女性自我。那麼，女人又如何回復與母親的原初之愛？

在認識卡里斯利巫婆之前，接受傳統女人主體位置的蘿拉無力改變她所面臨的一切，直到接觸女巫的系譜，異於父權社會定義的另一種女人話語，證明女人能以其自身特殊性而存在，能發展生殖以外的各種優異能力，使她得以拒斥父權社會提供的優勢主體位置，建立了新認知。女人的工作不再僅是守護父系名字的傳承，更能守護兩性身、心、靈的健康與成長，例如索倫森景仰的雪梨女巫：

米倫帶我去看雪梨的一位巫醫——真正的巫醫——但她也是個心理治療師。我是說她是個巫婆，就像溫特、米倫還有我一樣，同時還有大學學位那類資格。她真是厲害——她將自己的能力運用在其他用途，而不只是製造特效而已。如果我能長大成人——這事有時候還挺叫人懷疑的——反正我希望能像她一樣。（梅罕 186）

「女巫」這個極具反抗精神的女性族群，不但擁有才能更具備勇氣，即使面對伯瑞丘這個「很老而且行事小心的惡魔」也毫無懼色，因為她們是「月亮的女兒」，「不是好惹的」（梅罕 142）。卡里斯利巫婆們「能逆天行事，隨自己的意思操馭自然力量……憑藉想像自由揮灑」（165），三人成組時更能發揮最大戰力。見識過且信賴女巫能力的蘿拉，勇敢的決定接受老中青三代巫婆的協助與鼓勵，即使此一決定必須冒著生命危險：「一旦你走過索倫森指給你看到的那道門，你只准成功。你這是把一生給賭上了」（221），也要放手一搏轉變為巫婆，喚醒沈睡中的特質，釋放深埋於潛意識的女性能量來對抗吞噬母女（子）的父權力量。

卡里斯利女巫擁有協助他人意識覺醒的能力；在蘿拉變身為女巫的過程中米倫擔任「開球人」。她幫助蘿拉「盡可能擺脫世上所有的束縛」（梅罕 214）。蘿拉解下她「最好的衣服」——原來打算用以吸引索倫森目光的洋裝——改套上一件令人無拘無束的緞面罩衫，象徵擺脫父權社會加諸於女性的價值觀與性別角色規範。接著，米倫以傳承自遠古以來，女巫在心理與藥草方面的特殊知識、能力，營造出一種奇異的氛圍：「角落裡的鐵盤上擱著一只黑貓形狀的小炭火盆。黑貓的眼睛濁濁閃著紅光，一股輕煙徐徐從它嘴裡噴了出來。聞起來不像草藥那麼甜，有一點像新割的稻草，卻還更濃一些，說不上來的味道令人困惑」（214），讓柔和迷離的燈光及藥草協助蘿拉身心兩方面都放鬆，再喝下一杯米倫以「小小的自然界魔法……一把肉桂，幾瓣柳橙，葡萄汁，加上少女的汁液」——從蘿拉手指頭上取得的一滴鮮血——所製成的深色酒液，走上變身之路成為「月之女」，跟隨那滴血「一路回溯，找到自我」（217）。

這滴傳承自母親的血極具重要意義，「每次出現岔路，真正該選擇的路上總會有一滴自己的血作為記號」（梅罕 230），讓蘿拉有所依循。這一滴血將帶領蘿拉進入被象徵秩序壓抑的女性想像世界，如同被冥王黑底斯攜進冥府，做為父權社會利益交換客體的泊瑟芬，倚靠與母親的神秘聯繫，重新與母親交流，回到女女相愛的境地。

然而，對於習為「父之女」的蘿拉來說，回歸母性世界的路途艱辛而孤獨，是純粹內在自我的對立抗爭，新舊女性意識的廝殺衝突。「往深裡走，石南尖叫著應聲倒下，痛苦的滿地打滾，蘿拉隱隱覺得那是自己的聲音。同時，每一刀似乎都砍在她的腦袋裡面，突如其來的疼痛使她震驚，接著是渾身一陣不舒服。但仍然知道自己應該披荊斬棘往前走」（梅罕 231）。為了解開母女間種種愛恨糾葛，拆卸隔絕母女的層層父權論述，她必須繼續忍受被撕裂的痛苦，追問自己的主體位置，是如何被構建成犧牲奉獻的母親；又如何成為無法接納母親自主性的女兒？「『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她問道，就在四下環顧的時候，突然覺得渾身不自在，並且感到一陣顫動，好像是從花園谷重劃區的地底傳上來的——而她這

份突如其來的不自在也就是整個世界的不自在了」（226-27）。守門「巫婆」索倫森立刻氣急敗壞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手勁大得讓她作痛，要蘿拉「不要問了！」因這一問會引發「哲學思辯」，陷入陽具式質疑¹¹，然而這個女性想像國度只靠直覺運轉，一點懷疑的壓力都承受不了。但這一問卻使蘿拉回溯接受父權話語使自身成為犧牲品的童年記憶：

她看見侏儒、迷途的王子們、為了解救變成天鵝或者烏鴉的兄長們而承諾永不開口的美麗女孩、白天英姿煥發、夜晚卻委頓不振的年輕人、為了失去銀手臂而哭泣的殘廢女子，接著是傻裡傻氣的人們、三隻小豬、披著紅斗篷的女孩、迷了路又找著來時路的孩子們，以及那些屍體由知更鳥銜來葉子遮埋的迷途的孩子。（230）

童話是傳遞父權價值觀的有力論述，描繪出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幻影，形塑女性美麗、被動等候英勇男性救援，帶來幸福快樂生活的夢想。童話中「為了解救變成天鵝或者烏鴉的兄長們而承諾永不開口的美麗女孩」，正是女性為男性犧牲自我，即使遭受生命危險也不能訴說她的痛苦，被迫喪失話語權的最佳寫照；〈漢賽爾和格雷特爾〉（Hansel and Gretel）這兩個「迷了路又找著來時路的孩子們」的故事結尾，嚴懲自我中心且不盡母職照顧孩子的母親（齊普斯 88）；小紅帽的故事更灌輸女性合乎時代架構的性道德觀（奧蘭絲姐 25），告訴女人要仰賴好男人的拯救，以免於愚蠢之災（26）。蘿拉察覺她從小浸潤在這些鼓勵女孩美麗、犧牲、奉獻，包裹著幸福快樂甜美糖衣的童話，裡頭男尊女卑的觀念形塑她成為支撐男性社會沈默底層，不自覺接受家中天使的定位。

一逕以男性鏡像身分立足於社會的女性，幡然意識到在現實中女性主體位置的矛盾，察覺自身的女性特質如何經由種種將女性視為客體的話語而建構，必定渴望回到生命的原點，尋回被深埋的自我。在識別自我的強烈衝動下，蘿拉再次踰越男性（索倫森）的禁制，大膽理性的反思：「還得走多遠啊？……我走了多遠才走到這兒？」（梅罕 231），為探究竟，她轉身檢視來時路，不意開啟女性意識覺醒的重要契機，回溯成長過程無處不在的父權影響，與母親及其他女性的

愛恨情仇，深具女性意識覺醒的意味：

她身後的道路分出數不清的岔路來。凱特和史蒂芬一起站在教堂舉行婚禮；她看見自己呱呱墜地，上學的第一天，看見如此年輕柔和的溫特在餵雞，看見范恩波納太太用著少有的、自得其樂的表情正在欣賞她那株天竺牡丹，看見米倫飽受打擊的抱著小寶寶，應該是囉嗦，而囉嗦本人則縮成一團忍受著雨點般的拳打腳踢，但她看不見施暴者的嘴臉。她看見克里斯在另一國個家，拿著一封信猶豫著該不該投遞，她也看見自己正在照鏡子，看見各式各樣，她自己以及別人的人生可能發生的進展，點點滴滴，造就她此時此景。(梅罕 232)

不同時空交織的場景，更顯現形塑女性客體的原型，讓蘿拉有了重大的體悟。蘿拉明白她的女性自我，遠在出生前即被眾多已然就位的社會實踐所建構及定位；通過覺察自身曾經是什麼，以及自己是如何不自覺被父權論述形塑主體性與情感，心靈的束縛逐步崩解，得到真正的自由。

然而一如索倫森的警示，蘿拉的理性思考嚴重違反想像世界的規則，使得「一大片的森林消失了。森林之外裊裊升高的既不是煙也不是蒸氣。所有東西都開始輕輕顫動起來，在天空，斗大而色彩極淡的字跡綿延數百里，寫著『浴室踏墊』。字跡逐漸清晰可辨」(梅罕 232)。理性思考正是以父的律法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考量利害關係，以男性想像角度看待萬事萬物，無異再度回到舊有的父權社會模式，正足以威脅與崩解女性想像空間。

當蘿拉明白她的變身因理性思考而即將失敗，當機立斷告訴自己「我溺水了，我溺水了，」(梅罕 232)，運用想像力強迫臨場的真實感受重新出現，突然間「她的肺積滿了冷冰冰的水。她又是咳又是胡亂拍打，卻發現水越湧越多，她得掙扎著尋找水面，卻看不清該往哪裡去。終於，水的重量漸漸減輕，她將手伸出水面」(232)，索倫森一把將她拉上岸，終讓情勢大逆轉，再度回到超自然空間。

女性的想像無庸置疑極具潛力，但生活在陽具理體中心的女性不可能放棄解

決問題的重要方法：理性思考。女性重建自我的方法或許首先得理性思考女人如何在男性想像中被想像，造成女人今日的處境；再以女性想像重新出發，創建屬於女性的話語。蘿拉同時運用陽式質疑與女性想像力，反而讓她既瞭解男性想像如何束縛了凱特與她的母女關係，同時以想像力抄了捷徑回到飽受菲勒斯中心理性世界壓抑的前伊底帕斯時空，重拾母女間緊密的聯繫：

蘿拉回頭看著身後那片無言的山丘，空曠曠的向天際起伏，落入一座海洋的懷抱。不知怎麼回事，她打心裡對這片海洋覺得熟悉。這可玄了，因為她從來沒看過這個地方。「但是我來過這裡，我來過！……甚至在
我有記憶之前就來過這兒了。這是起始之地。」……「空曠無一物，但真美」。（梅罕 234-35）

蘿拉一路回溯到母親的子宮，生命的源出之地、萬物共有卻遺忘的空間，進入父的律法尚未介入母女共生關係之前的「前伊底帕斯」期，母女關係未被壓抑、充滿想像力與生命力的心靈結構。她看見母親的愛造就她的生命力為「林木參差的綠色森林」（234），也看見索倫森因失卻母親的愛，生命之林「枯死敗壞只剩下骨幹的樹木，枝極錯綜有至，形成一片繩網」（234），與自己那座綠意盎然的森林形成強烈對比。母女間被壓抑與排除在象徵域之外的流體性能量，那豐沛卻失落的愛，以躍動、漫流等多種水的形式環繞森林、進入蘿拉，形成女性想像的力量：

轉向鏡子，在燭光搖曳中，她清楚的看見自己竟然變了個樣，體內原本沈睡的部分似乎被注入生命，森林的精神也延展進她的頭腦。她的生命不僅僅從彼此相看相厭的史蒂芬與凱特而來，更得到想像力的滋養，來自她與其他人的想像力量，造就她的新生命。（239）

在這奇異的超自然時空，女性想像誠如 Herbert Marcuse 所言：「解放了各種可能，因為它顛覆、攪亂了世界那可敬的功能理性秩序，而宰制正是靠此理性支撐。透過這種想像湧出的非實在，永遠創造著拒絕實然的空間，並因此開啟新的可能」（轉引自楊 126），使蘿拉改變了原本固著的父權價值觀，擁有無限重新定義自

我的可能。就如索倫森感覺：「你的內在變了，你知道嗎？我可永遠都不會忘記——我抱著你，感覺你的頭，頭骨的部分在移動，你再造了自己」（梅罕 252）。女性真正的解放與自由，不可能來自於父權體系的「男性」想像，而必須是能穿透她身體與靈魂的「女性」想像，使整個思想重生，方能崩解緊錮的桎梏。唯有如此女性方得掙脫「父權」的壓迫，不再以「父親的女兒」、「兒女的母親」等既定角色定位自我。換句話說，她將擁抱自己，是愛戀母親的女兒，不再是不斷回應男性召喚的平面鏡。因為臣服在父的律法下，女性無法真正認同母親，母親也無法了解她。

然而女性的重生之途並非能大步前進的康莊大道，步步皆以血淚築成。蘿拉回歸現實世界的景象暗示了她未來也將遇到重重阻礙：蘿拉「雙膝著地，當真爬了起來。這時，她的膝蓋有很大一部份是墊著藥棉與橡皮，但還是會流血就是了。剛開始，魔杖點到之處，石塊鬆垮下來，但越往前行，它們貼得越近，靠得越緊，到最後她只得硬擠著鑽過石縫」（梅罕 236）。帶著新思想再度跨進父權銅牆鐵壁世界的新女性，單單倚靠女性想像這根點石成路的魔杖，能有多大力量面對父權體系錯綜複雜的性別問題，衝破「一段窄過一段、叫人灰心透了」（237）的父權石縫？「她就像夢遊仙境的愛麗絲，始終不認為自己能夠縮小到進入美麗的花園。『就算我的腦袋擠過去了，』她喃喃自語著，聽見從旁邊石塊傳出回音，『身體過不去又有什麼用』」（237）。在這一段女性重生的精彩敘述裡，顯現若非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僅有女性思想上的改變並不足以撼動整個陽具價值系統，阻礙仍將如同堅硬的岩石，悍然阻擋女性的未來。就如同時經歷她的歷險旅程，而且也受到影響的索倫森，即便感覺到蘿拉「腦袋裡的骨頭在移動」（238），一時之間也沒能改變他對蘿拉的沙文心態：「睡美人總是會愛上喚醒子自己的王子。這下你也有一個啦，錢特……恐怕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238）。雖然蘿拉立刻宣告自己的獨立：「我是自己醒過來的」（238），他的焦點也並未投向蘿拉「那對明顯盛滿改變的眸子，而是有點心不在焉的停在她的胸部」（239）。

蘿拉成為女巫，象徵與母系神秘的潛能聯結，再次尋回女性豐沛的力量，重

新命名新身分與新指稱，再建女性本質，拾回被遺忘的女性主體。此一決心在蘿拉為印章命名的過程中表露無遺。「印章，你的名字就叫蘿拉，我將與你分享這個名字。我將賦予你力量，而你必須為我所用。除我之外不得聽從他人使喚」(梅罕 242)。在以父為名的象徵秩序中，處於父權社會交易體制下客體位置的女人，在家從父(姓)出嫁從夫(姓)，沒有屬於女人自己的姓氏傳承歷史，使女人的歷史「如同水面下黑暗而深邃的潛流，靜默而痛苦地流淌了數千年。當我們試圖發覺母輩的歷史時，才發現它是那樣古老，但卻如此匱乏」(黃華 200)，彷彿未曾存在。

蘿拉將印章微妙的命名為「蘿拉」，而非標示著父之名的再生產工具「錢特·蘿拉」；不冠上父親的姓氏，唯以女性之名命名自我的微妙差別，強烈象徵蘿拉的女性認同不再建立於她與父權社會的關係基礎上，棄卻附屬在父親律法底下的父之女身分，以女人的名字重新理解、定位自己，並且肯定生為女人本身已深具力量，而非男性論述下無力、被閹割的弱者。女性的潛能終能回歸自身，為己所用，轉變女人在父權交易系統所處的客體位置。蘿拉對新形成的女性印記宣告：「你將是我制服敵人的武器。你會貫穿他的體內，留下洞口，讓他精氣流失終至乾涸。當他的黑暗本質流失殆盡，我在外，你在內，我們將同時微笑以對。我們……我們的笑容可以讓他灰飛煙滅」(242)，象徵覺醒後的女性，將以重新自我命名所形成的女性新話語及新主體位置，對抗奴役性父權、捍衛自身的權力，進而破壞父權社會隱藏的鄙視、交易、奴役女人等黑暗本質的堅定決心。

伊瑞葛來在《此性非一》中提出，女性若要嘗試穿越「男性」想像，嘗試從我們既定的文化想像中撤出，改以「女人的身分與其相對，不但置身其內，同時還踰越其極限」(210)，讓性別差異的關係得以發生，而非僅僅反轉陽具式的權力，第一個反應便是大笑。笑聲意味著「從世俗的壓迫得著解放的第一種形式」(210)。由於男性把女性的欲望、快感，將置放在「嚴肅性」中，充分而無異議的說出「真相」，就此使女性這個能指「無法轉譯、無法再現、無法再重新掌握其意」(210)。而女性的笑聲正代表對陽具理體中心思考系統下嚴肅女性論

述的超越，使意識與心靈皆不再被束縛於男性欲望的位置，扮演編派給女人的角色。

在整個變身過程中，索倫森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是一個兼具陰陽特質，能游走虛實兩界的男「巫婆」，曖昧的天性「打血裡帶來，代代相傳」(梅罕 113)，雖長了一副男兒身，卻擁有非常陰柔的法術，他的存在即是對性別角色分類的一種嘲弄。索倫森在現實世界是個「守門員」，身為七年級級長的他，嚴密掩蓋他的陰性特質，完美的偽裝成「一則電視廣告——完全符合人們心中理想男孩的形象」(25)，每日在校門口檢查所有人的服裝、到校時間是否合乎規定，維護學校的規範，規訓學弟妹們的言行舉止，是父權理性思考文化的捍衛者。當蘿拉第一次到農莊，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蘿拉來訪的時間不合時宜：「這個時間到男生家登門拜訪有點嫌晚」(100)；更注意到蘿拉的裙子太短，不符合學生手冊裡女生坐下時裙子需蓋住膝蓋的規定(101)。有趣的是，在蘿拉變身過程中，索倫森也以「巫婆」的身分擔任蘿拉的「守門員」，扮演規範、禁止理性思考的角色。而索倫森指給蘿拉的門，恰恰豎立在傳播父權論述的學校大門邊的小門(227)，正是通往想像世界的入口，是否暗示女性得在父權體制外另闢蹊徑，方能到達女性解放之境？

打從旅程一開始，索倫森便一再叮嚀蘿拉：「順著黃磚路走，記住，千萬不要回頭張望。只管走就是了」(梅罕 227)，更以激烈的肢體反應提醒她不要質問。奇妙的是，索倫森的禁令反而出乎意料的在下意識的層面上，激發蘿拉徹底顛覆秩序的決心，促使她在時光之旅中三次違背回頭、思考的禁令，艱辛卻巧妙的利用陽性壓迫為助力完成變身。索倫森能穿梭陰陽兩界的媒介者身分(254)，使他既是蘿拉現實與想像界的壓迫者，亦是協助者。

當蘿拉初踏想像界，看到凱特以很低的折扣賣了一本詩集給克里斯，禁不住心中的嫉妒想跑過去提醒凱特時，索倫森化身為一頭「條紋錯綜複雜，看起來黑色多、金色少」(梅罕 229)的老虎，目光灼灼的盯著她，發出隆隆雷聲，提醒蘿拉不要耽溺於凱特與克里斯的世界，執著於反對母親的情慾自主，被女女相怨

的情結困擾，繼續往前走。表面上看來，索倫森似乎在蘿拉變身過程中扮演指引她路途的關鍵角色，間接促進蘿拉對父權話語形塑自身的質疑；實際上真正引導蘿拉變身的解放者卻是米倫與溫特，直接引領她重回女性想像之境，再建母女關係。米倫肯定女人的力量「的確隨著想像力源源而出」，女性想像是造就女人「成為魔法師的能力」(213)，鼓舞蘿拉前進的信心。米倫告訴蘿拉在想像界最重要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該怎麼做就怎麼做」(223)毫無限制，解開她身心的束縛。米倫教她肯定做為女人的美好，引導她看著自己「鏡中倒影」的眼睛，意即從女性的想像、角度，以富創造力的方式觀看自身，轉換在男性眼中尋求肯定的陽性模式，深入的看見「自己的另一面」(241)，找回消失在父權話語下，從未被教導或允許得以多元表達的女性本質。溫特則是直接建議蘿拉成為巫婆的終結者，睿智的一手籌畫制伏伯瑞丘的巧計。更重要的是，米倫與溫特本身即是在父權價值體系下追求女性獨立自主的最佳典範，標幟出女性從陽性經濟模式解放自我的可能，鼓舞女兒勇敢邁向追尋自我的旅程。

第三節 變身與對抗

蘿拉的變身雖是「一趟內在的探索之旅，但反應與影響卻是外露的」（梅罕 220），站在一個更高、更富女性意識的主體位置，不但全然改變她對自身的看法，也有重修母女關係的能力，更有對抗父權壓迫的智慧與勇氣。

在對自身的看法方面，脫下所有的父權束縛之後，蘿拉覺得自己渾身充滿活力，「每片指甲，每根頭髮似乎都欣然自在的享受著什麼」（梅罕 270），對女性的存在已有全然不同以往的認知，她不再以客體化的凝視評價自己，重新審視自己的軀體，「看見了自己，影影綽綽，纖細精緻，她的手腕腳踝都烏骨頭般不盈一握，好像隨時都可以抗拒地心引力往上升去。她羊毛般的鬢髮蓬成一輪黑色光圈，撒了金粉似的閃閃發亮」（218），不需任何的妝點即自然美好，即使是棕髮也與母親的金髮一般耀眼。她認清了父權社會對於女體的撥弄與操作，終能從自己的眼睛而非男性魔鏡認同自我，擁有抗拒男性凝視的力量。從重新定義心靈與肉體的內在旅程歸來，蘿拉察覺自己的身體是美麗的，而非以往由鏡中的舊自我所看見的異鄉人，她愛自己的身體，從以往「常常嫉妒凱特的美貌，渴望擁有那份雍容」（275）的陰影解脫，不再是古老父權定義下嫉妒、依賴母親的女兒。

跳出父權社會客體位置的蘿拉，更能捍衛自己的主體性，拒絕扮演沈默的女體成為男性欲望消費的對象。她堅定地對索倫森提出要求：「把你房間那張海報拿下來。你可以留著我的照片，但千萬不要把它釘在那張海報上」（梅罕 271）。她不願讓自己的臉孔與裸女的身體疊置在一起，讓索倫森每次看她的照片時，也同時將裸女攝入眼簾，如此一來自己也彷彿化身勾魂裸女笑望著索倫森，日日夜夜成為他性幻想的對象。她刻意戲擬男性賦予女性的物化意義，暴露出父系話語對女性的鄙視，讓索倫森體會自身被視為欲望客體的感受：「如果我有一張裸男海報，還在上頭釘了一張你的照片，你做何感想？」（271），聽完蘿拉的話，

他似乎覺得好玩，臉上出現些羞愧的表情。她不再接受男性物化／凝視的決心，逐漸轉化索倫森的心態，第二天他把海報拿掉了，象徵他與蘿拉之間開始從主體對客體轉換成主體對主體的關係，。

康乃爾 (R. W. Connell) 認為女性力量對建構男性特質相當具有影響力：「在許多建構男性特質的過程中女人位居中心的地位——例如母親、同學、女朋友、性伴侶與妻子、性別勞動分工中的員工等。而性別階層也受女性認同與實踐的新組態所影響」 (Connell, Messerschmidt 848)。陰柔特質不見容於養父的慘痛經驗，使索倫森謹慎隱藏真正的本質，避免顯露出陰柔的部分。「在房間裡我非常權威，非常性感，但每走出房門一步，我就變得更畏縮一點。至於到學校，我幾乎不存在」 (梅罕 160)。唯有在接納與肯定他本質的原生巫婆家庭，索倫森才能肆無忌憚的顯現陰柔的一面，得以發揮他的能力。一踏進崇尚兩性特質涇渭分明的社會，索倫森不得不戴著陽剛特質的假面具生活，失去所有的力量恍若不存在，「出了自己的房間就換了個人似的」 (160)。這使得索倫森

有時候很厭惡這一點。雖說是生而如此，但他並不喜歡被人稱作巫婆。有時候他覺得自己既不全然是人，也不全然是個巫婆，倒像個混血品種，他掙扎得太厲害，反而無法徹底向任何一邊靠攏。其實兩邊都是他無法棄絕的天性啊。我們一直試著讓他接受現實，截至目前為止，反應非常激烈。(113-14)

伊瑞葛來認為 (男) 嬰孩在歷經伊底帕斯情結的壓抑後，被壓抑的總是女性——陰性。男性必須經由對陰性特質的壓抑方能成為具有男性氣概，具侵略性的陽性積極主體 (林松燕 26)。索倫森離開養父家之後，從羅曼史中學習兩性相處模式，為壓抑其陰性特質而不斷藉由主動征服女性身體、矮化與物化女性的過程，建立自身的優勢來展現男性陽剛形象。即使在蘿拉為凱特之事沮喪傷心時，滿腦子只想跟她上床的索倫森也只以沒有太多同情的語氣說：「別哭啦！我開始覺得跟你在一起真是百害而無一利，一點便宜也占不到」 (梅罕 188)。在索倫森的心中，蘿拉始終被定在欲望對象的位置，被動的等待親吻，害羞的承受愛撫。

直到蘿拉女性意識覺醒，肯定自身為欲望主體，扭轉操控者的角色：她主動貼到索倫森背上，「一動也不動，被人施咒似的。隔著自己的上衣與他的襯衫，蘿拉感覺得到彼此肌膚緊貼的溫度。……囉嗦終於開口道：『是我媽該擔心，而不是你媽吧。我力圖維持君子風度，你卻不讓我好過，錢特』」（316-17）。兩人關係的置換，揭示傳統女性特質的內向被動，正如范銘如所說：「並非女性的本質，而是位置。……女性的欲望不再是根據男性自我仿製的欲望呈現，而是不可知、不可定義的，也因此是男性的威脅。當女性主體性不再是男性可想像固定時，男性的主體性也跟著動搖」（65）。最後，索倫森拋棄他對男／女、強／弱、主動／被動二元對立的舊觀念，看著那些被自己拍下的（蘿拉）形象，神奇的自過去溯游而回，蘿拉的新女性形象漸漸清楚顯影，與之前模糊的影像成為強烈對比，更一語雙關的稱讚「錢特，你的樣子都出來了」（梅罕 337），肯定她的成長與進步。

在現實與想像界以其優越的能力得以成為「守門員」的索倫森，不斷提醒蘿拉要遵守禁令，也強迫自己遵循性別角色規則，內在因此不斷矛盾拉扯，成為被囚禁在黑暗高塔中的王子，直到蘿拉看出「他」是個巫「婆」，「看出他的本質這件事，就已經讓某些束縛鬆綁了」（梅罕 151），他開始接近「完整」的人。變身後的蘿拉更以無比的智慧與勇氣，以其自身女性認同與實踐的新組態，如同一條導地線將極度自絕於人的索倫森——這股不受控制的電流——導回正軌（318），放棄對父權話語男強女弱的認同，承擔自己所壓抑的陰性特質，不再依賴女性身體為陽剛特質的守護者。

在重修母女關係這部分，恢復與母親原初之愛的蘿拉，終於超越女兒從母親叛離的古老經濟結構（Wilkie-Stibbs 111），再度回到母親身邊。在母女同時關注傑可時，她們的心靈緊密聯結一起；當伯瑞丘到蘿拉腦海中叫囂、干擾她拯救傑可的思緒時，她感受到凱特的愛：「一束冷靜的光從黑暗中透出來，讓她得以想其他的事。這多虧了凱特下意識對她的支持與相伴」（梅罕 276-77）。蘿拉的心靈與凱特融為一體的經驗，也母女帶往一種新的、意想不到的母性領域

(Wilkie-Stibbs 112)，以母／女的雙重身份分享彼此。蘿拉分享潛藏在凱特心靈深處的歡樂回憶，當凱特陷入沈思，憶起「第一次抱起傑可，第一次餵他喝奶，回想起他的鼻子緊緊貼著自己的乳房」(梅罕 277)，蘿拉的思緒「和凱特的思緒如此夾纏不清，那回憶彷彿完全就是她自己的」(277)。這一幕觸動了蘿拉，她學著跟凱特一樣，懷抱著奇異的力量向傑可伸出援手，傳輸愛的滋養給他，彷彿自己是黑暗中的光：

在她兄弟逐漸強壯起來的身體城堡裡與敵人短兵相接，而敵人在她面前棄甲逃亡。她吞嚥並且化解了他的印記，溫言軟語的答應傑可要為他說故事，她提到炸魚薯條等等的家常菜色，以及所有日常生活裡快樂的瑣事細節。當她如此撫慰著傑可的時候，她感覺那些因為印記而造成的肉體傷痕痊癒了，並且知道傑可已經永遠的脫離了卡莫狄·伯瑞丘的魔掌。(279-80)

與此同時，蘿拉也將關懷分享給母親，使她不僅是依賴母親照顧的「女兒」，也是照顧凱特的「母親」。在凱特為傑可的好轉而狂野激動的時候，她承擔了母親的角色而凱特成了女兒，「她上前擁住凱特，好像她才是守護者」(梅罕 284)。當凱特像個被愛沖昏頭的少女和克里斯在客廳隨音樂起舞時，蘿拉則扮演媽媽的角色照顧傑可(Wilkie-Stibbs 112)。

母女關係及角色的逆轉也表現在凱特嫉妒蘿拉與索倫森的愛戀關係(Wilkie-Stibbs 112)，一如蘿拉曾經嫉妒克里斯搶走凱特，現在則是凱特抱怨索倫森闖進她與蘿拉的家庭生活，分享星期四的炸魚薯條之夜；從前是凱特毫不忌諱在蘿拉面前表達她對克里斯的好感，如今換蘿拉刻意在凱特進門前雙手環抱索倫森，宣示她對自身情欲的自主性。當凱特看見這一幕時，她的笑容變得不太自在。她承認：

你和索倫森·卡里斯利的交往的確令我擔心。他太懂事，太……太嚴肅。他應該結交一個同年齡的女朋友——反正是別人的女兒就好。……對別人的孩子，我可是很看得開，最多是說上一句『唉，女孩子終究是

女孩子』，不過小拉——我這輩子是不可能對你的事那麼輕鬆自在的。
何況你真的還太年輕了。……提防著他一點，小拉，如此而已。……提防著他一點！（梅罕 331）

凱特擔憂蘿拉太早與索倫森交往，在不對的時間與不對的人做不對的事，正揭露女人將自身置於男性交換客體位置所產生的心態。凱特希望蘿拉保持處女之身，保持未來交易的價值；女人的性只能保留、獻給真愛，她的丈夫。但是，變身後的蘿拉站在從父權宰制中解放的新位置，對壓迫有著更敏銳的感知，她觀察到母親對真愛的定義，是一種從屬於父權價值、讓女人持續被奴役的愛（Wilkie-Stibbs 112）：「凱特相信真愛，並且認為蘿拉應該等時候到了再與真愛身心合一。但真愛卻給凱特帶來不愉快，她轉向認識才兩天的男人尋求慰藉與逃避」（梅罕 299）。蘿拉早已跳脫男人間交換經濟的客體位置，堅持情欲自主，也將獲自女性想像世界的語言與能力做為禮物，從一個女人對一個女人的主體位置對母親說話，回報、滋育母親：

「你結婚的時候年紀不大，對不對？」蘿拉隨口問道。凱特的眼睛轉了過來望向她。

「我那時候十八歲，你早知道的。」她說：「你別想打什麼主意。我絕對不會讓你重蹈覆轍。」

「反正我總有自己的錯可以犯嘛，不是嗎？」蘿拉答道。

「油嘴滑舌！」凱特叫道：「非常聰明！真不知道打哪兒學來的？」

「我一直都挺聰明的。」蘿拉說：「媽，十八歲結婚也不盡然都是災難。你有傑可和我啊。」（330）

蘿拉以一種迂迴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暗示她有信心解決自己的情欲問題，同時引導母親覺察自身的矛盾。凱特這種把女人的身體與欲望束縛於異性戀關係，以及女人必須等待與從屬於某一特定男性的父權話語，對女性彼此之間，特別是母女關係造成分離與傷害。艾瑞葛來將它視為阻礙女人話語的交流，將女人從自身排除的根源：

妳／我成雙，爾後，為了他們的快感。但是，一旦二分開來，一在外，一在內，你便不再擁抱你自己或我。在外，你試著屈從異化的秩序。從你自身放逐而去，無論遇到什麼，你便與之融合。你開始模仿任何靠近你的事物，你變成任何碰觸你的事物。……從這個模式換到下一個，從這個主人過渡到下一個，隨著每一個主宰你的新權威而改變面貌、形式、語言。妳／我們被迫分開。（《此性非一》276）

蘿拉尊重母親，放棄將母親視為她與傑可的避風港，而將母親視為一個女人，欣然接納她與克里斯結婚：「我不介意你有這種想法」（梅罕 331）。這和諧的一幕證明至少在蘿拉這方面，女兒能視母親與自身皆為主體而又能相愛相需，已臻至與母親交融卻不被其吸納的化境，達成伊瑞葛來理想中的母女關係。

在對抗父權方面，獲得印記同時也獲得智慧與力量的蘿拉，接受溫特與索倫森的建議，以「讓自己看起來既誘人，又像光是想到他就嚇得不得了」（梅罕 251）的方法，意即以瓦解性的「擬仿」策略引伯瑞丘上鉤，如同歇斯底里症顯出最溫柔順從的媚惑形象，卻以最極端的方式，將女性的「被動轉為積極的主動，接受父權所給予的屬性與要求，其所產生的效果是與父權所要求的完全相反，它的結果就是鬆動了父權體系，將父權運作無法接受的東西反丟回去」（林松燕 17）。帶著新印記的蘿拉以極為謙卑的姿態說：「求求你，伯瑞丘先生，放了我的小兄弟吧。換別人來代替他」（梅罕 256）。面對老謀深算的伯瑞丘，她害怕得渾身發抖開始冒汗，訥訥的跟他交涉：「我想，或者你會想要拿我代替，你可以放了傑可，我任憑處置」（259），蘿拉一再強調自己願意犧牲隨時準備聽令，看似怯懦順從的形象，成為掩護她反擊的最佳偽裝。索倫森也在一邊敲邊鼓，鼓動伯瑞丘喜歡有人對他懷有恐懼又隨時準備聽令的自大心態。蘿拉看出卡莫狄·伯瑞丘是很自我陶醉的人，如同擁有秘密寶藏且樂於向一個永遠不會說出的人展示、吹噓一番。「在這樣自信與膨脹的心情下，他可能會對她伸出手——他可能會對她提出某種邀約」（258）。

在他倆一搭一唱的精心策劃下，伯瑞丘心動了，想品鑑自動送上門來的犧牲

品，他像對著蠢小孩說話似的告訴蘿拉：「我一定得知道，你的生命究竟是多麼有希望？你究竟值不值得？」……「到我這裡來！」（梅罕 261）。在伯瑞丘親口提出邀請，同時伸手想將她拉近一點，好掂清楚她的斤兩再決定是否接受或棄之如敝屣時，蘿拉的手「好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從口袋裡一躍而出。一起一落間，蘿拉已經在卡莫狄·伯瑞丘的手掌上蓋下自己的印記；動作既堅定又細膩，彷彿是送了一朵花給他」（261），隨著伯瑞丘「緊張反應的化學電流一路直上，搗入他的腦子裡，並立刻取得支配權」（262）。

蘿拉以女性特有的弱者姿態來偽裝，巧妙操弄犧牲、體貼他人的女性特質，成為自己對抗父權吞噬性力量的籌碼，極為慧黠的將之轉換成一種因地制宜的生存技巧，來與伯瑞丘斡旋。她刻意迎合伯瑞丘輕視她的心理，一方面利用伯瑞丘心中女性弱者屬性做為反制工具；一方面偽裝身處他的掌控之中，等候伯瑞丘邀請她到身邊。在這一段看似強權男性與弱勢女性，權力懸殊彷彿天壤之別的較勁歷程中，表面上看來盛氣凌人的父權代表伯瑞丘握有絕對宰制權，蘿拉則被動、怯懦，實際上蘿拉以退為進等待時機主動出擊，終將她的印記反蓋在伯瑞丘手上，翻轉成主客易位的狀況，產生他無法置信的反制效果，精彩的瓦解伯瑞丘的陽性經濟體制。

西蘇認為陽性特質或陽性價值系統係根據佔有經濟（economy of the proper）而構成。佔有（Proper）、佔有物（property）、據為己有（appropriate）等字眼正恰如其份表達出佔有的邏輯，強調自我身分認同、自我膨脹與自我指定主宰的地位，強調佔有及佔有的回報，致使陽性沈迷於分類系統化和階層化（莫 131）。

在《變身》中，印記代表力量，影響持有者與受印者的關係，持有者能攫取受印者的能量，也能傳輸滋養的力量給受印者。卡莫狄·伯瑞丘的印記「是一個佔有的印記，它成為一道通往你弟弟體內的門戶，伯瑞丘可以由此隨意進出。他也可藉此門戶傳送能量，但他選擇掠奪」（梅罕 162）。一旦向伯瑞丘提出邀請，蓋上他的印記即成為他的佔有物，他就名正言順的要求回報，成為上級階層命名被印者為其犧牲品，奪取他們的利益以滿足自己。當初傑可在圖書館懇求湯普生

太太為他蓋唐老鴨章的舉動，或許正表現小男孩希望獲得成人肯定，認同他是個能遵守圖書館規定、服從秩序的好孩子，足以進入公共領域。想要得到認同／印章的心態給了伯瑞丘可乘之機，「你右手是不是蓋了個章啊？要不要給左手也來一個？把手伸出來啊，小老虎，快把渾身弄閃亮，走進暗夜森林不害怕」（40）。受到伯瑞丘語言的操弄，想證明自己是勇敢小老虎的傑可，在毫無自覺的狀況下將他的手伸向伯瑞丘，為自身指定了主宰，以生命能量付出要求自我認同的代價，使得瀕臨燈盡油枯的伯瑞丘能倚賴施印者／被印者的階層分化繼續苟延殘喘。

依附他人而存活數千年的伯瑞丘，可謂父權階層體制代表；女人及小孩為此一體系的構成基礎及私有財產，用以滿足男性的需求，做為建立父系文明最底層的砥石，成就、再造自己的犧牲品：

一路尋找宿主下來，我也算閱人無數了，自然挑剔得很。像你這樣的女孩也許更有活力，肌膚更光滑，或者更年輕一點……不過——我想，八歲是個吸引人的年齡，十歲就嫌老了……話說回來，永遠別把規則定得太死。我就挺喜歡天真無邪，縮在媽媽胸前吸奶的小寶寶。天哪，這事沒人說的準呢。醫學再先進，所知仍然極其有限！有時候我索性對那些母親們下手，就在她們最最快樂的時刻出擊。……還有那些子女長大了的女人，花開一般的迎向人生的各種機會……噢，你們給了我怎樣一場精緻盛宴哪，充滿著各種可能性！（梅罕 257）

伯瑞丘理所當然的引用女人的身體、生命及資源來成就自身無限可能的生命模式，正如伊瑞葛來所指，男性中心文化乃建立於對女人此一群體的虧欠（debt）：

為了成為男人，他們繼續消費……（母親），引用她的資源，而同時在認同於、從屬於男性世界時，拒絕她或否定她。他們對她們的存在、身體、生命有所虧欠，為使自己成為強而有力的男人、忙碌於公共事務的成年人，他們遺忘或沒有體認到這個虧欠。（Grosz 121）

在父權體制下，握有權力的年長男性不僅宰制女人，也掌控年輕男人，利用

表面上看起來理所當然的國家機器運作，使此一體制得以循環不息，其內在本質實為：

貪得無厭的東西。一旦讓她認出這東西，陽光立時衰微；那玫瑰，那修剪合宜的草皮，那寬闊的房舍便開始變了樣。有一陣子，它們只不過是一片著了色的屏風，後頭有一臺可怕的機器運轉著。不僅如此，這臺機器肆無忌憚的以各種形式在各個地方運轉，有很多處都處在半報廢或幾近報廢的狀態，有時候則很不幸的誤用。（梅罕 255）

然而，於此體制中女性固然深蒙其害：「在『陽具獨裁的』權力中，男人也失去了某些東西；尤其是他自己身體的快感」（伊瑞葛來《此性非一》187）。違抗老化及死亡的自然力量，伯瑞丘同時失去最基本的感官歡愉，必須不斷竊取他人的生命能量，以重新擁有感受：

你根本無法想像我的心情，你視它為理所當然——這是你天生擁有的，所以你永遠不會去想觸摸和品嚐的歡愉。單就你的肌膚來說吧——你的肌膚能帶來如此的狂喜！……吃顆桃子，一顆剛從樹上摘下來、被秋陽晒得暖烘烘的桃子，咬一口清脆的蘋果——那第一口汁液——美味極了——或者感受陽光照在肌膚上。鹽！啊！鹽！……讓我感受——讓我繼續保有感覺……。（梅罕 302-03）

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伯瑞丘不斷犧牲他人，造成無限的痛苦。蘿拉成功反制伯瑞丘後，打算傾一生憤怒的力量放手報復伯瑞丘的邪惡，百無禁忌且永無止盡，蘿拉知道她可以「卸下苦痛的包袱，痛擊黑暗的力量；而且沒有人會知道」（梅罕 290）。但是深受壓抑自身本質之苦的索倫森，了解伯瑞丘是因壓抑他的真實人性而造成別人與自己的痛苦；他提點蘿拉不要成為另一個伯瑞丘：「殘忍這種事通常得有兩個人牽扯在內，對不對？一方無情打壓，另一方飽受折磨！為了擺脫，嗯——外在的邪惡力量，卻讓它一點一滴重新回到你的內在，這又有什麼用呢？」（293）。誠如伊瑞葛來所指，女性不應該期望以一個女性真理去對抗男性真理（《此性非一》39）；女人握有權力卻反過來以同樣的方式壓迫男人，無

異重演陽具統治的歷史。

最後，在深思過如何處理伯瑞丘，蘿拉拒絕索倫森隨行的提議。從前那個在伯瑞丘的威脅下徬徨無助、任人宰割，需要英勇獵人保護援救的小紅帽，已轉變成智勇雙全的女巫，有智慧與能力能夠獨當一面對抗男性暴力，獨自面對老狐狸伯瑞丘。在空曠安靜的保護區，她識破伯瑞丘壓迫的父權本質並拒絕再受宰制，宣告他為風中殘燭，否定他的力量，使語言成為女性的利器，向父權討回女性的公道：「你已經死了。你就承認吧。你只是生命的殘餘，而且還不是最好的部分，只是生命的殘餘」（梅罕 301）。她的話「好像有一股強制的力量，夾帶崩解的震撼，在這具勉強湊合著的軀體中流動。長久以來靠著卑鄙手段苟活至今的軀體已經形銷骨毀，卡莫狄·伯瑞丘的身上開始出現可怕的變化」（302），「千百年來被他所盜取的生命不斷的在他臉上交替出現，最後他的衣服癱垮下來，靜靜躺在一堆爛巴巴的玩意上頭，再一細看，原來是殘枝敗葉」（304）。

蘿拉的力量來自與凱特在女性想像世界重修母女之愛，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這種母女關係的轉型使女性重新自我定義，使其能有力量對抗父權的宰制，抗拒將她們視為交易客體的父權循環。正如伊瑞葛來所言，「在我們的社會中重新思考與改變母女關係將極具爆炸性，足以鬆動整個父權秩序」（Whitford 77）。為了「深化維持男性單一性別的主宰」（《此性非一》223），將母女之愛、女人的同性之愛從社會秩序中排除，使性別壓迫得以不斷循環。當母女關係從此一想像中解放出來，女人從走出「溫柔偉大的母親」及「美麗待援的公主」等性別位置，才能恢復她的女性主體（周華山 229）；一旦母女關係得以在象徵秩序重新詮釋與正面再現，女人和女人之間將不再重演母／女為求丈夫／父親的愛與肯定而相互吞噬、怨恨；以及女人與女人為爭奪象徵世界中唯一合法尊崇的空間——母親的位置而彼此妒嫉的劇碼，而能散發出新的活力，堅毅面對來自父權社會的種種性別壓迫與挑戰。

第五章 結論

根據傅科的觀點，主體是論述的產物，經由權力關係網絡下的社會機構與社會實踐，建構個體的身體與心理。然而權力與抵抗實為一體之兩面，當論述意欲生產某種主體位置的同時，即蘊藏另一種顛覆性主體的可能（《性意識史》87）。一旦女性察覺不同主體性之間的矛盾或接觸倒置性論述，意識到父權論述對自身的掌控與規訓，便引發不同政治選擇的契機，使主體性產生變動，進而調整原有的主體位置，發展出抗拒父權論述與拒絕男性凝視的力量，重構多元自主的女性主體。

第一節 女性的客體化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認為母權社會為父權社會推翻造成女性世界性、歷史性的挫敗，嚴重衝擊女性的社會地位。由於男性掌握經濟大權，因此能順理成章地取得家庭、擇偶的控制權；在經濟上必須仰賴男性的女性，被貶為他肉體欲望的奴隸及後代的製造機器（佟恩 83）。對許多缺乏經濟自主能力的女性來說，美麗的容顏成為她贏取男性資源、與其他女性競爭飛上枝頭當鳳凰的有利籌碼，或是交換浪漫愛情與權力的商品。

為尋求男性的凝視，女性競相將精力花費在追求更美麗的外貌，接受以男性眼光及社會標準為照見自身的魔鏡，趨附流行、時髦的美貌神話。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美貌論述，傳播及形構女體美學的知識及標準，讓女性無法相信自己即使不打扮也很美，而養成持續使用美容用品的習慣，無意識中否定原本自然樸實的女體，失去對身體的認同。

受到生活周遭女性美貌論述、實踐行動的影響，如蘿拉的母親、保母范恩波納太太、同學妮琪、卡羅·布萊特等都以更出色的髮型、服裝或化妝成功吸引男

性的目光；再加上妮琪對蘿拉禁不起近看，髮型單調，需要改變染成金色的批評與建議，蘿拉漸漸內化美麗不可能是自然生成，女人必須努力變成美麗的話語，對自己的容貌失去信心，而難以用驚喜的心態看待鏡中毫無妝點的自己。

蘿拉在意索倫森對她外貌的評價，渴望得到他的凝視認可，期待出現在索倫森面前時看起來更完美，而對著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與涼鞋，精心搽上口紅、眼線、睫毛膏，彩妝、蒙蔽原有的五官，卻覺得自己像外國影片的女主角，正標示出女性身心為尋求男性認可的異化過程。

誠如陳明珠所言，當女性從陽具中心位置凝視女體時，鏡像中反射的其實並非「她」的身體而是被父權文化規範與監控的客體，女體已與自身疏離（190）；女性不但須承受被觀看及評價的壓力，在以男性審視者角度凝視自己身體每一部份的同時，既成為被物化、零碎的客體，也失去身體的主體性。

然而，父權文化宰制女性身心的諸多論述中，對女人造成最大傷害的莫過於性暴力與性意識的制約，從輕微的語言、眼光性騷擾到最嚴重的強暴，皆強化男性自我並將女性物化、貶為次等他者。在大部分狀況下，強暴雖然由個別男性施加於個別女性身上，卻不獨使受害女性身心嚴重受創，更形成擴散效應使全體女性同感恐怖焦慮，產生規範與控制女性行為的效果。

父權社會廣泛存在一種極度不平等的性意識形態，認為男性性欲受到女性刺激而活躍與難以控制是極為自然的，因此女性必須負起避免引起男性興奮的責任，被迫約束自己表現出所謂合宜的行為舉止，犧牲享用空間與時間的自由換取安全感。從珍妮絲的不幸事件，蘿拉認知到世界對女性的不公不義，男性不但蹂躪女性的身體，更引此為笑談再度凌虐女性的心靈；更令她恐懼的是，無論何種年齡、外貌的女性，在任何時間、地點都有遭到性暴力侵犯的可能。在不得不現身於夜晚世界時，蘿拉的女性曲線，使她心中飽受強暴恐懼的煎熬。她如同全景敞視監獄中的囚犯，覺得無論隱藏行踪於陰影或暴露在光亮處，都逃不過男性的觀看，而不斷自動執行自我審查的機制，即使不確定存在的男性都對她造成心理威脅。

索倫森對她夜間獨行的冷嘲熱諷與溫特的關懷，更加深蘿拉對夜晚公共空間的焦慮感，使她欣然服從索倫森的保護提議，如同小紅帽在英雄的保護下避免大野狼迫害，對犧牲行動自由來換取安全甘之如飴。如此一來，女性既是被父權社會欲望、物化的受害者，同時亦是接受父權論述，認同女人應負起避免引起男性欲望的父權利益維護者，使女性游離於雙重主體之間產生分裂意識（林芳玫 135），淪入無能自主的地位轉向依賴男性保護，卻進入人盯人的父權關係。

除了在社會或公領域受到性別壓迫，女性在私領域及親密關係中更易遭逢不平等性別權力關係的箝制。索倫森認同羅曼史中男人主動、積極、侵略，女人被動、消極、柔弱的性別意識，將羅曼史裡的兩性互動模式搬到現實生活中按表操課。在與蘿拉的親密關係中，索倫森不斷以凝視、肢體接觸、語言騷擾來展演男子氣概，確立自身霸權式的陽剛主體。蘿拉的身體在此過程中成為索倫森用以隱藏陰柔特質的物質基礎，構築男性陽剛主體及性話語實踐的場域，一再飽受壓制與驚擾。

除了女性的身體與特質被挪用為建構男性主體的客體，女性的心理與情感也受到社會嚴密的監控，母親的主流話語框架兩性對母親這個角色的認知，侷限女人的發展。母職的話語以家庭為礎石，經由母女傳承及社會文化與實踐，代代相傳制約女人的身心，建構女人為家庭兒女犧牲奉獻的思考、行動與情感模式。女人更內化社會對母親的審視目光，在家庭內外時時自動檢視自身與「她」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好母親的標準。

母職帶給女人的沈重壓力可從社會、自我與家庭三種向度來談。凱特與史蒂芬離婚後，獨自擔負照顧一雙兒女的責任，在家庭工作兩頭燒的狀況下仍盡可能扮演好母親的角色，滿足姊弟倆的身心需求，使一家三口甜蜜和樂。但按照社會眼光來看，凱特將家務丟給蘿拉，顯然有失母職。例如范恩波納太太即以嚴苛的標準，不時窺探、批評凱特在時間、空間、食物方面對孩子的照料不足。在自我方面，為了通過社會無處不在檢視母親的眼光，凱特一向注重孩子們的門面，從外表上建立兒女得到妥善照顧的形象。因此在傑可病情危急之際心中念念不忘先

去給他買套新睡衣，不想讓破舊的睡衣讓傑可看起來像是乏人照顧。范恩波納太太及凱特自我監督的舉動，正突顯社會對母職的全面包圍，造成女人心理深層壓迫。

在家庭內，女人更須時時面對來自她一手調教出的父權代言人——女兒的監督。已然離婚的凱特表面上看來是「一家之主」，但她的生命仍掙脫不出父權文化的宰制，更扮演父權制度的代理人馴化女兒。在經濟的壓力下，凱特輕忽蘿拉的需求、規訓她的時間，並要求蘿拉負起照顧傑可的責任，將父權性別思想傳承給女兒，使蘿拉認同父系價值、喪失個人主體性，接受自身溫柔母性的角色，成為另一塊父系歷史中成就他人的基石，使母女同受母親角色的限制，左右自身思維模式與情感，影響她們的行動與抉擇。

凱特背負母職的重擔，企望從克里斯身上尋求身體與情感的安慰，但傑可的需要及蘿拉不滿她結交新歡的態度，框限凱特自我發展與情感需求，即使她對自己暫時外出做了完備的計畫，卻放不下孩子，最終仍在母性 / 女性、兒女 / 自我的拉鋸矛盾中一度放棄了後者，「好母親」這個冠冕堂皇的緊箍咒，以愛及責任為名壓縮她尋求自我的空間。

蘿拉觀察到凱特與克里斯的戀情使她散發出輕鬆活力的光彩，也改變她以往信念；以前凱特從不為孩子提早打烊，現在為了克里斯不但溜班、透支去做頭髮，甚至能夠放下生病的傑可去聽音樂會，母親似乎不再全然的為兒女付出，引起蘿拉對克里斯強烈的嫉妒。因此蘿拉以承繼自凱特的母性思維反制凱特，用傑可生病做為籌碼引起凱特的內疚，將凱特束縛於家中。完美母親的形象驅使女人無盡的付出，以達成不可能的神話，導致母女間的衝突，使母女關係出現裂痕。

當蘿拉發現凱特沒有留在醫院照顧傑可，而是與克里斯在家中一同過夜時，她完全無法接受母親在此時仍有性行為的事實，拒絕承認母親性愛主體的身分。對蘿拉來說這強烈象徵凱特不再僅屬於她和傑可，母子三人相依相存的圓滿狀態因克里斯與母親的欲望而破裂，也顯示她在母親心中的份量不如克里斯，致使蘿拉懷著憤恨離家。

艾莉斯·馬利雍·楊 (Iris Marion Young) 指出女人在本質上兼具兩種角色，既是男性欲望掌控的對象，又是滋育他生命及自我的根源。此二者皆為支持男性自我不可或缺的功能，卻無法同時並存。因此父權邏輯在母性與性之間設下互斥的分界，將其物化為好 / 壞、純潔 / 淫猥的階層對立，讓女人要不認同純潔、無私無慾的聖潔母親，要不就是激情縱欲的魅人蕩婦，讓女人與自身的生活、欲望分離，然而「這樣的分離往往是對母親撕裂，就在我們的身體中，這種犧牲一再被執行，從而創造並維繫父權」(151)。

父權社會剝奪母親自身對女性及欲望主體的認同，不但削減母親做為女人的行動力也截斷女兒成為女性的潛力 (Groze 122)，使女人的自我空間為家庭所挪用，心靈被侷限在母性的範圍，不斷陷入淪為父權制下再生產工具的循環。女性主體在陽具中心主義話語的建構下，外貌、身體、心靈、性意識皆被物化成為支撐男性自我的客體，失去對生命的自主權。

第二節 回歸女性自我

長久以來，父權社會以同一邏輯形塑女人的身體、心靈，做為豎立父權社會的沈默基石；用母職話語排除母親做為社會女性及欲望主體的機會，更讓女人無意識內化父權社會的男性凝視為自我審視的目光而不自知，如傅科所言生活在一個「全景敞視機器中，受到其權力效應的干預」（《規訓與懲罰》216），無時不刻承受社會性別規範的凝視與約束，框架女性的心靈、身體與主體性，難以逃脫父權的宰制。然而話語雖然握有建構與規訓主體的力量，限制個體認同和與理解生命經驗的向度，但是「論述並不是單一或全面的，而是充滿曖昧和矛盾的，它是一個衝突和戰鬥的場域。而且性別論述也並不是人類認同的唯一面向。人類其實是被他／她們所參與的不同的社會實踐和論述所建構」（佐尼 47）。主流的女性話語所產製的優勢女性主體位置並非完全壓制而是充滿矛盾，也提供顛覆或抗拒的著力點。

米倫及凱特在母親位置上所感受的無力與掙扎，讓她們嘗試突破困境，從被綑綁的母親主體位置發出抗拒的聲音，要求獲得女人應有的合法權利。米倫在思想與行動上都是不願受父權思想捆手綁腳，獨外於賢妻良母之列的荒野女巫，拒絕父權語言的規訓，寧可做女人而不願作母親。她為了保護農莊而生下孩子，成為母親的動機原本就是為了維護個體的自主性，對自身社會主體的重視遠勝於做為母親。正因為認知到母職對她的束縛，為使母子雙方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她選擇為索倫森找個愛孩子、有如童話般的寄養家庭，不只顛覆母親犧牲奉獻的形象，偏離為人母親慣循的軌道，更說明女人雖有生育的功能，但母性並非女人的本質，打破母性天生的神話。

相反的，凱特一方面相當肯定做為母親所帶來的意義與快樂，但另一方面也承認「照顧與教養小孩其實也是一種充滿挫折與煩擾的經驗，孤單、罪惡感、負荷太重與焦慮不安」仍是做為母親的真實感受（聖格 377），她還是有想逃避的

時候，也需要一個逃避母職時投奔的對象，更坦承做愛能使她在「扮演自己這件事上頭得到休息」（梅罕 194），要求被母親主體位置排除的情欲自主權。同時，單身的凱特也意識到做為母親將只是她生命的一部份，而非永久的身分，她需要規劃兒女離開後的日子，有個相知相惜可以倚靠的人；凱特的心聲既說明女人無法因作母親而得到滿足，也說明母親實為性別化而非無欲望的主體。

米倫與凱特這兩個勇敢的母親，建構出一種迥異於父權價值的母親話語，不但提供蘿拉做為女性的社會與情欲主體認同基礎，她們追尋自我的勇氣也鼓舞蘿拉以變身拯救傑可的信心。米倫除了以自身的故事賦予蘿拉語言的力量，讓蘿拉認同女巫／女人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及強大的潛力能扭轉劣勢，更以女巫獨具的草藥、心理方面的知識能力，協助蘿拉進行超時空的內在探索旅程。

在一路回溯、尋找的歷程，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使蘿拉不斷追問自身的主體位置如何被構建；從歷歷出現的往事與童話場景，她了解自身的主體性實受眾多父權論述及實踐所定位與規範。這種對女性存在處境的探詢不僅涉及女性自我的認同，也是對男尊女卑社會的抗拒。更重要的是，回到起始之地讓蘿拉被壓抑的流體性能量與對母親的原初之愛能夠重返象徵域，形成富涵生命力與女性想像的心靈結構，開始以全新的女性想像視角看世界與解放自己。蘿拉重新凝視她的身體，不必經由男性眼光肯定，也無須妝點即散發熠熠光彩；她感到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充滿活力，欣然享受整個世界與成長的喜悅，相信自己有能力獨自面對伯瑞丘。在兩性互動方面，蘿拉開始能自然流露她的情感，翻轉以往被動、柔弱、等待的客體狀態，成為自身情欲積極、主動的掌控者；也明確的用語言拒絕扮演男性欲望消費的沈默對象，告訴索倫森可以留下自己的照片，但堅定的要求不要把照片釘在裸女海報上；最重要的是她接納與肯定索倫森的陰柔特質，轉化他將自身性能量侷限於單一目標的性器官導向，以積極、侵略性的陽性主體達成男性認同的沙文思想，放棄對女性的宰制，不再視女性為他支配式陽剛主體的支撐者，使兩人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逐漸趨於平等。

從內在旅程歸來，蘿拉除了不僅獲得新的主體性，更獲得對抗父權宰制的智

慧與勇氣。首先，她命名印章為「蘿拉」而非「錢特·蘿拉」，象徵拋棄以往「父之女」的身分，女性認同不再建立於父權關係的基礎上，而是以女人的名字重新定位自我，女性身心回歸自身為己所用，成為對抗父權黑暗本質的利器。爾後，接受溫特與索倫森的建議，迎合伯瑞丘視女性為弱者心理，極為巧妙的以自身為餌，敏銳的掌握時機成功將印章蓋在他手上，取得選擇傳輸或攫取力量的控制權。

支配權的移轉讓蘿拉能百無禁忌、放手報復伯瑞丘的邪惡，且無人知曉，就如父權體制以種種看似自然的論述，心安理得的宰制女人。然而蘿拉握有權力後反過來以同樣的方式壓迫伯瑞丘，無異重蹈陽性佔有經濟覆轍與陽具統治歷史。索倫森以他壓抑自身真實人性的慘痛經驗提醒蘿拉，莫為擺脫外在邪惡力量，卻讓它一點一滴重新回到內在。聰慧的蘿拉歷經一番深思熟慮，放下心中的報復念頭，選擇獨力對抗伯瑞丘。她識破伯瑞丘壓迫的父權本質並拒絕再受宰制，宣告他為風中殘燭，否定他的力量，使語言成為女性的利器，向父權討回女性的公道，終使幾千年來違抗自然力量，靠竊取他人能量延續自己生命以保有感官感覺的伯瑞丘，化成殘枝敗葉再不能危害他人。

母女關係的改變是蘿拉變成女巫後最大的獲益，母女間豐沛的愛在兩人同時關注傑可時，心靈融為一體。蘿拉從凱特哺育傑可的記憶獲得啟發，傳輸滋養的能量給傑可，終於協助傑可打開封印的心，脫離伯瑞丘的魔掌。蘿拉放棄視母親為滿足兒女所有需求的全能庇護者，放棄對母親的依賴與操控，接納凱特不僅是母親，也是有欲望的女性。母女之間因克里斯的介入而形成的二元對立狀態，也在蘿拉以積極的主體身分與母親對話，尊重凱特與克里斯結婚的選擇後消失；同時，她更以女性意識覺醒後獲得的新能力護育母親，使凱特既是母親又是女兒；用「女性」的新語言回報凱特，逐漸協調彼此「性」與「愛」觀念的差異，兩人之間既融合又各自獨立。

誠如伊瑞葛來所言，母女關係的重寫對顛覆父權秩序極具力量，因為女人再無需為爭奪男人的愛而彼此競爭；女人之間的愛喚醒沈睡的力量，讓女性肯定自身擁有無限的潛能，女性自我將「完滿與自給自足，不需要依賴外在第三者或是

他者，來證成自身的屬性，來滿足她的欲望，女性在自身就已包含了主體與客體、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林松燕 25)，女性主體能處於時時刻刻處於改變的狀態，沒有單一場域與身分，顯現陰性流體、多元形象。



第三節 女性多元新主體

《變身》同時關注女人與兒童的處境；從文本的諸多例證可以看出其推崇女性承擔母職，及女性力量用以護育、滋養兒女，對人類心靈及文明貢獻。首先是米倫為索倫森選擇寄養家庭的重要指標：一個把時間花在將「家裡的瓶罐裡裝滿了手工自製的糕餅」(147)的賢慧母親；米倫自己是不肯當賢妻良母的，但是她為孩子找寄養家庭時，家中得要有個好母親卻是她心中不二的標準。而這個賢慧養母的母愛正是支撐索倫森度過黑暗童年的點點星火；再者是蘿拉以母親溫暖的呼喚、傳輸滋育的力量，幫助傑可打開封印，從伯瑞丘的魔掌解放出來；第三是米倫捨棄一切，極力挽救索倫森岌岌可危人性，母性滋育的力量緩緩開啟他封印的內在，療癒創傷的心靈，使索倫森接納自我陰陽並存的本質；最終則是索倫森從蘿拉身上學會護育傑可，從以往封印自我漸漸轉向尋求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上述種種，皆顯示了對女人做為母親及母性力量的讚揚。與此同時，文本也特意凸顯女性（蘿拉）選擇將力量運用如同大地滋養自然萬物，對照男性（伯瑞丘）支配掠奪、犧牲他人成就自我的方式，其解構線性、征服性父權思維的意圖更是不言而喻。

不過，在刻劃母親的慈愛，讚頌母性力量之際，《變身》更強調母親做為欲望及社會主體的必要；理想化的、無欲的、只關心孩子而犧牲自我的偉大母親退出舞台；代之登場的是有情有欲，矛盾掙扎於關愛、照顧兒女與承認、滿足自身的欲望，尋求獨立自主與捍衛夢想的女性母親。正如艾莉斯·馬利雍·楊所言：

我們應該肯定養育的價值；這種關切他人的倫理，確實使得我們相信更多的人類正義終能出現，而這種倫理所引導的政治價值，也能改善公眾的品德。但我們也必須堅持養育者也有其需求，堅持愛有部分是自私的，堅持一個女人應擁有自己不可化約的快感。(154)

人類的幸福與文明不應繼續建築在女人的沈默與犧牲上，女人除了護育他人，也

應該得到護育，擁有追求自我發展的自主權。然而，這絕對不是條康莊大道，女人追求自主權的路途必然充滿各種險阻，特別是經濟對女性主體性的影響。米倫之所以能未婚生子又毅然決然的放棄母職，選擇另一個賢妻良母代替自己撫育索倫森以維護獨特生活方式，其關鍵因素在於她擁有豐厚的財力做為後盾。相對的，凱特雖能視自身為欲望主體，爭取情欲自主的權利，經濟上的沈重壓力卻讓她無法跳脫依附男性的心態，不過是要求選擇主人的權力，終究不是自身的主人。當她和克里斯在一起時，她開始與克里斯融合，接受他的觀念，克里斯成為話語、聲音的新權威來源，兩人結婚的理由便是出自克里斯的好建議，「他說」取代了「她說」：「『他說我們家裡需要一個清楚聰明的好腦袋。他說要不然我們會越來越離不開對方——你和我——說不定他說對了。』凱特說著笑了起來，兩手往上一揮，將四十二分錢銅板撒得滿屋子亂滾」（332）。凱特將家中僅存的財產仍進風裡的舉動，說明她倚賴克里斯的心態，這使得凱特雖再無須擔心經濟，但同時也將失去自主權。

除了經濟上的限制，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更綑綁女性自主的腳步。米倫經濟上的優勢雖解除母親角色對她的框限，也為索倫森找到一個賢慧的好母親，幸福並未降臨在母子二人身上。米倫選擇當「女性」而捨棄「母親」，卻種下母子疏離、兒子受虐，對自己當初的選擇內疚不已的苦果。探究索倫森受虐的根源，實源自養父的性別偏見：如索倫森是私生子；養父的經濟必須仰賴未婚生子的女人，以及索倫森的陰柔特質。而凱特對蘿拉強調「等待真愛，身心合一」的觀念，試圖繼續馴化蘿拉繼續扮演被動等待的客體，失去對自身情欲的自主性。即使她自身已遭遇過這種父權觀念的壓迫，卻依然披覆父的律法為父權服務，不自覺扮演壓制、規訓女兒情欲的幫兇。對女性而言，自身的性別意識雖已超越父權社會的侷限，但社會整體結構若不能改變，依舊將撫育兒女視為個別女人應盡的義務與天職，而非兩性共同肩負或是整個社會應分擔的責任，且未提供女性足夠支持系統，對女性來說，做母親與社會主體終究難以兩全，自由將永遠存於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

史密斯對羅曼史的研究指出，在父權意識的運作機制下，羅曼史透過浪漫愛、性、美貌等文化符碼的運作：描繪女人經由尋求異性浪漫愛而獲得成長與社會認同；形塑男主動／女被動的二元對立情欲模式；織就美貌神話，鼓勵女性從男性讚美她的美貌獲得愉悅及自我肯定，以獲得男性的浪漫愛而得到成長與認同，建構出所謂的女性特質，合理化女性的從屬位置（16-40）。做為一本「超自然」羅曼史，《變身》巧妙的以羅曼史的形式，透過浪漫愛、性、美貌三個面向引領讀者以批判、質疑的角度，檢視我們熟悉卻又不曾深慮的通俗文化小說，如何藉由浪漫愛、性、美貌等文化符碼的運作，影響女性主體的建構與性別角色的認同。

跟隨蘿拉的腳步，讀者也能從追求美麗與等待男性救援的睡美人夢中「自己醒來」，不再依戀男性強壯的臂彎，寧可自己昂然闊步向前走，肯定女人「就算不是男人也一樣有本事」（梅罕 307）。在打破男性目光的美貌魔鏡之後，女人更能擁抱與欣賞原本樸實自然的女體樣貌。最重要的是，蘿拉的成長不是通過浪漫愛追尋，而是源於蘿拉內在的勇氣與成長，及與生具來對壓迫的敏銳感知，例如在尚未見到伯瑞丘即從他所散發「腐敗的甜意，混雜著淡淡的薄荷糖漿味」（27），認出濃濃的父權壓迫氣息，也比索倫森更早確認伯瑞丘是個以吸取那他人生命力為生的惡靈。更可貴的是內在女性自我意識覺醒後，雖然瞭解往後將存在許多障礙，但依舊充滿面對困境的勇氣，才是跳脫從屬與依附男性的心理與位置的真正原因。

而索倫森逐漸放棄霸權陽剛特質，與蘿拉陽剛性格的浮現，也顯示兩性陰陽性欲特質的變動以及重塑自我認同的可能，解構社會對特定兩性特質的形塑。在文本最終，《變身》表面上符合羅曼史的老套結局，暗示蘿拉與索倫森將來可能結婚，但最後兩人的對話也顯示他們的未來具有無限的可能，埋下了耐人尋味的伏筆與想像空間。

藉由《變身》，我們發現女性主體的形構如同弗曼（Nelly Furman）所言：「儘管最終或許仍不可能逃脫父權結構的霸權，但通過揭示我們文化裡的偏見，我們

指控了男性所創造的模式所加於我們的普遍性，引來掙脫和顛覆其力量的可能性」(68)；更使讀者瞭解到「『女人』只是一個想像性的構造，而『女性』是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且，我們必須在我們自己內心和外在都摧毀這一神話」(引自瓊斯 80)，讓女性的力量「隨著想像力源源而出」(梅罕 213)，提供讀者創新與多元的女性主體位置與主體性。



註解

- ¹ 「discourse」在本研究中為尊重原作者及譯文，譯為論述或話語。
- ² 維登認為社會是父權結構的起點，「父權」一詞指涉的是女性利益屈從、附屬於男性利益的權力關係。參見《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女性主義》：2。
- ³ 見劉紀蕙，《恐怖的力量》：導讀 xiv。
- ⁴ 參見梅罕，《變身》：關於作者。
- ⁵ Victor Watson Eds. *The Cambridge Guide to Children's Book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60.
- ⁶ 英文原版尚有一副標題：*A Supernatural Romance*，但中文版並未將此一副標題譯出。
- ⁷ 見王德威，《知識的考掘》：導讀 15-6。
- ⁸ Phallus 原指男性生殖器官陰莖，同時也為男權文化的象徵。
- ⁹ 蓋洛普認為陽具形態學的邏輯並不是根據解剖學的實際狀況得出，相反的，是以它自身的形象重建了解剖學（147）。形構學並非生理決定論，而是對身體的想像與象徵再現的解釋。身體生理事實與形構學之間存在著落差與差異，成為身體政治得以運作的空間。陽具形構應從此角度來理解：父權社會關係的存在，有賴於透過形象再現的內化與意義化的過程，而進行男性性欲特定形象的（再）生產。換言之，男性並非根據自身形象而建構其父權論述，而是父權論述以自身的形象構成了男性性欲，兩者再進行相互再生產及再補充（林松燕 23）。
- ¹⁰ 張娟芬將出現在公領域，控制者是資本家、管理階級，被控制者是女工們；這種多對多的控制，稱之為「集體的父權」。但父權在異性戀關係裡規範著私

領域，控制者是丈夫、男友，被控制者是妻子、女友時；此類一種一對一的控制，稱之為「個別化的父權」。《女性主義經典》：51。

- ¹¹ 即使像「這是什麼」的問題，都被西蘇拒斥為陽性衝動，試圖尋找一個解答，象徵將現實囚禁在位階結構的欲望，其本質具壓迫性，是陽性情欲投注的結果。參見托洛·莫，《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132。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巴克 (Chris Barker)。《文化研究智典》。臺北：韋伯，2007。
- 巴特 (Roland Barthes)。《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臺北：時報，1991。
-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生智，1997。
- 王溢嘉。《說女人》。臺北：野鵝，1991。
- 史帕哥(Tamsin Spargo)。《傳科與酷兒理論》。林文源譯。台北：貓頭鷹，2002。
- 史都瑞 (John Storey)。《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李根芳、周素鳳譯。臺北：
 巨流，2003。
- 布魯克 (Peter Brooker)。《文化理論詞彙》。王志弘、李根芳譯。台北：巨流，2003。
- 弗曼 (Nelly Furman)。〈語言的策略：超越性別規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格
 林 (Gayle Greene)、庫恩(Coppelia Kahn)編。陳引馳譯。臺北：駱駝，1995。
 50-68。
- 米利特 (Kate Millett)。《性政治》。宋文偉、張慧芝譯。台北：桂冠，2003。
- 伊果頓 (Terry Eagleton)。《文學理論導讀》。吳新發譯。臺北：書林，1993。
- 伍華德 (Kathryn Woodward)編。《認同與差異》。林文琪譯。臺北：韋伯，2006。
- 伊瑞葛來 (Luce Irigaray)。《此性非一》。臺北：桂冠，2005。
- 西蘇 (Hélène Cixou)。〈美杜莎的笑聲〉。《女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編。
 臺北：女書，1999。87-97。
- 佐尼 (Liesbet van Zoonen)。《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張錦華、劉容玫譯。臺北：
 遠流，2001。
-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新論》。葉頌壽譯。臺北：
 志文，1997。
- 李納 (Harriet Goldhor Lerner)。《拒絕偽裝的女性》。臺北：遠流，1994。
- 伯格 (John Berger)。《觀看的方式》。吳莉君譯。台北：麥田，2005。

-
- 佟恩 (Rosemarie Tong)。《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譯。台北：時報文化，1996。
-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恐怖的力量》。彭仁郁譯。台北：桂冠，2003。
- 吳爾芙 (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臺北：天培文化，2000。
- 芮曲 (Adrienne Rich)。〈憤怒與溫柔〉。《女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主編。
臺北：女書，1999。133-152。
- 林芳玫。《女性與媒體再現》。臺北：巨流，1996。
- 。《權力與美麗》。臺北：九歌，2005。
- 林松燕。〈身體與流體經濟——依蕊格萊的女性形構學〉。《中外文學》。第 31 卷
第 2 期，2002。9-38。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1993。
- 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
- 范銘如。《眾裡尋她》。臺北：麥田，2008。
- 唐荷。《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臺北：揚智文化，2003。
- 高榮禧。〈凝視下的女性身體：從佛洛伊德到傅柯〉。《當代》。第 48 期，2001。
74-85。
- 莫 (Toril Moi)。《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王奕婷譯。臺北：巨流，
2005。
- 張小虹。〈當神還是女人的時候〉。《女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主編。臺北：
女書，1999。105-110。
- 張佩珍。《台灣當代女性文學中的母女關係探討》。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
- 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嘉義：南華管理學
院，1998。
- 陳明珠。《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臺北：五南，2006。
- 梅罕 (Margaret Mahy)。《變身》。蔡宜容譯。臺北：東方，2004。

-
- 康奈爾 (R.W. Connell)。《性/別：多元時代的性別角力》。劉泗翰譯。臺北：書林，2004。
- 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臺北：心靈工坊，2004。
- 張佩珍。《台灣當代女性文學中的母女關係探討》。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傅科 (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臺北：桂冠，1992。
- 。《性意識史》。尚衡譯。臺北：桂冠，1998。
- 。《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臺北：麥田，2007。
- 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北京：北京大學，2006。
- 黃靖芬。《走出想像界－幻想小說中的女巫形象研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楊 (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何定照譯。臺北：商周，2007。
- 溫格勒 (Cathy Winkler)。〈強暴是社會性謀殺——一名人類學家的自白〉。《女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主編。臺北：女書，1999。217-26。
- 聖格 (Lynne Segal)。〈女性主義的家庭觀點〉。《家庭社會學》。洪惠芬、胡志強、陳素秋譯。臺北：韋伯文化，2003。364-92。
- 楊鴻雁。〈女人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的烏托邦〉。《國外文學》。第 98 期，2005。3-9。
- 奧蘭絲姐 (Catherine Orenstein)。《百變小紅帽》。臺北：張老師，2003。
- 蓋洛普 (Jane Gallop)。《通過身體思考》。南京：江蘇人民，2005。
- 維登 (Chris Weedon)。《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白曉虹譯。臺北：桂冠，1994。
- 齊普斯 (Jack Zipes)。《童話·兒童·文化產業》。張子樟校譯。臺北：東方，2006。
- 劉亮雅。〈湯亭亭《女戰士》中的母女關係〉。《中外文學》。第 29 卷 8 期，2001。

158-75。

劉毓秀。〈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從佛洛伊德到依蕊格萊〉。《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臺北：女書，1996。139-178。

鍾佩怡。《我把羅曼史變教材了--中學生的性別平權教學素材》。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薛爾曼 (Jean Michel Sallmann)。《女巫：撒旦的情人》。馬振騁譯。臺北：時報，1998。

簡瑛瑛。《何處是女兒家》。臺北：聯合文學，1998。

羅燦焜。〈性別暴力與性別歧視〉。《性屬關係(上)》。臺北：心理，1999。57-100。

羅瓊安 (Joan Rosier-Jones)。《紐西蘭兒童文學的書與人》。石莉安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蘇永明。《主體的爭議與教育》。臺北：心理，2006。

瓊斯 (Ann Rosalind Jones)。〈銘刻女性：法國女性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格林 (Gayle Greene)、庫恩 (Coppelia Kahn) 編。陳引馳譯。臺北：駱駝，1995。69-98。

外文書目

Berkin, Adam. "‘I Woke Myself’: *The Changeover* as a Modern Adaptation of ‘Sleeping Beauty.’"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1. 4 (1990): 245-51.

Chapkis, Wendy. *Beauty Secret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6.

Cixou, Hélène.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Trans. Annette Kuhn. *Signs* 7. 1 (1981): 41-55.

Connell, R. W.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 (2005): 829-53.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 London: Routledge, 1974.
- Freud, Sigmund. *The Ego and the Id*. Trans. Joan Riviere. New York: Norton, 1989.
- .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 Eds. Rachel Adams and David Savran.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2. 14-20.
- Grosz, Elizabeth. *Sexual Subversions: three French Feminist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9.
- Hunt, Peter. *Children's literature*. Oxford, UK: Blackwell, 2001.
- Irigaray, Luce.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The Irigaray Reader*. Eds. Margaret Whitfo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 *Je, Tu, Nous: Towar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 Trans. Alison Mart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 *Key Writing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Rich, Adrienne.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 New York: Norton, 1980.
- .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1985*. New York: Norton, 1986.
- . *Of Woman Born*. New York: W.W. Norton, 1986.
- Smith, Christian. *Becoming a Woman through Ro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Waller, Alison. “‘Solid All the Way Through’: Margaret Mahy’s Ordinary Witches.” *Marvellous Codes: The Fiction of Margaret Mahy*. Eds. Elizabeth Hale & Sarah Fiona Winters.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2005. 21-43.
- Watson Victor. Eds. *The Cambridge Guide to Children's Book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hitford, Margaret. *Luce Irigaray: Philosophy in the Femin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Wilkie-Stibbs, Christine. *The Feminine Subject in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